

蘇聯 D. 洛森堡著  
張季蓀 劉亞生合譯

# 政治經濟學史

上卷

上海雜誌公司印行

社會科學名著大系

1.

# 政治經濟學史

蘇聯D.洛森堡原著  
張季蓀劉亞生合譯

系大著名學科會社

# 史學經濟政治

版權  
所有

中華民國廿七年十二月廿日(滬)初版

乙項：第四四號

發行額一〇〇〇冊

出版物第〇〇九六號

原著者

蘇聯·D.洛森堡

譯述者

張季蓀  
劉亞生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總店 桂林中北路新一九二號

支店 梧州大中路 南甯中山路

柳州慶雲路 宜昌二馬路

重慶武庫街 成都祠堂街

萬縣西山路 金華縣政府前

分店 西安南院門 漢中府街

蘭州道隆巷

每冊實價壹元

外埠另加郵費

# 政治經濟學史上卷

## 目次

第一章 經濟學史的一般特徵	一
經濟學史的對象	一
研究方法	八
經濟學史的任務	一四
第二章 重商主義的成立和發展	二九
作為資本主義產生之「前史」的商業資本	二九
商業資本時代經濟的及社會—政治的構造	三五
作為經濟政策之特殊體系的重商主義	四六
所謂重商主義的實踐是什麼？	四七
重商主義的文獻	六五



第三章 重商主義的解體和古典學派的成立……………七三

——近代經濟學的始祖威廉·培蒂……………七三

勞動價值論成立的社會——經濟基礎……………七四

威廉·培蒂的生平和事業……………八二

培蒂的方法……………八六

培蒂的價值論……………八八

培蒂的工資學說……………九五

培蒂的租金論——土地租金和貨幣租金……………九八

第四章 培蒂以後經濟學思想的發展……………一〇七

約翰·陸克(John Locke) (一六三二——一七〇四年)……………一〇八

都德里·挪爾斯(Dudley North) (一六四一——一六九二年)……………一一五

約翰·勞(John Law) (一六七一——一七二〇年)……………一二一

達衛德·休謨(Dau'b Hume) (一七一——一七七六年)……………一二四

傑姆斯·斯圖亞特 (James Stuart) (一七二二——一七八〇年) .....	一三六
總括 .....	一四六
<b>第五章 重商主義者</b> .....	<b>一六七</b>
一、十七世紀後半及十八世紀前半的法國西 .....	一六八
法國的經濟思想的發展 .....	一七三
二、重商主義的創始者 .....	一八七
蓋斯內的方法論 .....	一九三
蓋斯內的「純收入」(Product Net) .....	二〇一
蓋斯內的資本理論 .....	二〇七
蓋斯內關於社會及階級的學說 .....	二一二
蓋斯內的經濟表 .....	二一九
<b>第六章 重商主義者(續)</b> .....	<b>二二五</b>
三、重農學派 .....	二二五
四、杜爾開 (Anne Robert Jurgot) (一七二七——一七八一年) .....	二五一

## 第一章 經濟學史的一般特徵

當講經濟學史的時候，我以為首先要給這門學問以一般特徵就是首先要說明（一）它的對象是什麼，（二）它的方法如何，以及（三）它的任務是什麼。

### 經濟學史的對象

經濟學史的對象就是經濟學自身。「狹義」的經濟學，即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種學問的經濟學是隨着這種生產方式和它的現實諸矛盾以及階級鬥爭的發展相平行而生長發展起來的。被當做一種過程而考察其發展的經濟學是隨着布爾喬亞經濟的發展而發展的。經濟思想界的各種潮流、方向、學派的論爭，是諸階級鬥爭的一種形態，是在經濟的、政治的各種戰線上的鬥爭成爲一體的。而真正在這樣的姿態上的經濟學才是它的科學——經濟學史——的對象。

在種種不同的歷史階段上被構成的經濟學，作爲在其以前發展的既成結果，作爲多少完成了的體系而呈現出來。雖在今日，即經濟學發展的現階段，經濟學亦作爲一種既成的結果而出現。在既成的結果上過程消失，發展的各種逐次的階段不爲目所見，媒介的連環和推移變遷的痕跡隱蔽了它的姿態。價值論、貨幣論、剩餘價值論等等，各有其長年累月的歷史。祇要想起勞動價值論，以及其他理論的萌芽，已經被十七世紀的經濟學者威廉·培蒂（William Petty）所發現這件事，就夠了。古代的哲學者亞里士多德已經發現了商品交換之分析的萌芽，即發現了在商品交換中的同質性和平等性。但是在理論它的本身之中，它的歷史，即它的發生和逐次的發展並沒有被直接的指示出來。這個過程的闡明才是經濟學史的研究對象。

重商主義、重農主義、英國古典派經濟學等，雖然它們互相間有很大的不同，各有其固有的特殊性，可是却形成着布爾喬亞經濟思想的前進運動中逐次的階段。這種運動在李加圖的體系上達至最高點，在這裏它的前進運動停止了。

「布爾喬亞在法蘭西和英吉利獲得了政治的權力，自此以後，階級鬥爭無論在實際上，在理論上，都好似採取了愈益明瞭的，愈發威脅的各種姿態。他敲響了科學的布爾喬亞經濟學的葬鐘。」

替布爾喬亞經濟學所敲的葬鐘，同時是宣告普羅列塔利亞經濟學發展之開始的鐘聲。經濟學，由於卡爾天才的頭腦，從布爾喬亞視野的狹隘性裏解放了出來，因而相繼的奏着勝利的凱歌，次第解決了一切的謎。而最重要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發展的經濟學的基本任務被實現了。

如上所說，可知卡爾主義經濟學對於在它以前的布爾喬亞經濟學有一種承繼者的關係。伊里奇說：「哲學史及社會科學的歷史，最明白的指示着卡爾主義和從世界文明發展的大路分離而發生的什麼封鎖的、硬化的學說那種意味的『宗派主義』是不相同的。實在，卡爾的天才就在於他對於人類的進步思想所已經提出了的諸問題，給了解答這一點上。他的學說是作為哲學、經濟學、及社會主義最偉大的代表者們直接的繼續而發生的了。」●

自普羅列塔利亞和布爾喬亞的階級鬥爭到達了一定的發展階段，資產階級獲得了政治的權力以來，科學的布爾喬亞經濟學的葬鐘就響了。但是，不用說，這並沒有意味着布爾喬亞經濟學沒有存在或停止了在某意種味上的發展，這不外是說在俗流化和辯護論的方法及形態的交替一點上，發見了布爾喬亞經濟學的「發展」罷了。

俗流化的諸要素已經存在於古典經濟學之中。古典經濟學者和現代布爾喬亞經濟學者之間，

● 伊里奇：卡爾主義的三個源泉及三個構成部分。

正沿着這一條線而有一脈的關聯，「經濟學成就了顯著的發展——自亞丹·斯密以後——而且當它一經具有確固的形態，好似現象之重複的要素立刻就當做了它的表象，經濟學的俗流要素就當做了它的特殊的種類而從經濟學分離開來。」<sup>①</sup>經濟學的這種特殊種類的創始者，是斯密的獨特的「後繼者」——塞依 (Jean Baptiste Say)。在塞依看來，「在亞丹·斯密的學說中所發見的俗流的表象被分離開來，當做它的獨特的結晶物而被繼續着。」所以，現代的俗流經濟學和塞依之間互有關係這件事，雖然自其最初源泉的距離上有着很大的空隙，也完全沒有可懷疑的餘地。

卡爾主義經濟學採用了古典學派科學的諸要素，而布爾喬亞經濟學則利用了它的俗流諸要素。誠然，布爾喬亞經濟學者們雖然做過而且正在做着不少對於古典經濟學者冒瀆的嘗試，可是他們所冒瀆的是古典經濟學者體系中科學的諸要素，而決不是它的俗流的諸要素。反之，後者却被給與了更深一層的發展和深化。

卡爾的經濟學，也被考茨基 (Karl Kautsky)、希爾法丁 (Rudolf Hilferding) 及其後繼者的一派暴露了。在俗流化和歪曲的過程中。這種過程，根據我們所看到的，是已完成其向社會法西斯蒂經濟學之建設的成長。即向無非為布爾喬亞俗流經濟學之變種的社會法西斯蒂經濟學的建設完

① 卡爾剩餘價值學說史。

成了它的成長。無非爲布爾喬亞俗流經濟學之變種的社會法西斯蒂經濟學，當做「被矯正、被補足的」「卡爾主義」。經濟學而被提供於勞動者們的面前。而這提供於勞動者們一點正是這種經濟學的特殊性之所在。像現在這樣姿態的社會法西斯蒂的經濟學，可以說是新時代的，即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的產物；同時，它和科學的經濟學之俗流化及歪曲的歷史是深深的聯結着的。

卡爾主義經濟學不用說是像卡爾主義全體一樣發展着的，因爲經濟學和階級鬥爭是始終發展而無停止的。進入新階段，即帝國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提出了新的諸問題。這些問題被伊里奇在卡爾關於資本主義的一般理論之基礎上加以解決。然而卡爾主義的伊里奇階段，並不盡在於帝國主義的理論，伊里奇在資本主義的一般理論中亦貢獻了許多東西。卡爾伊里奇的理論在約瑟夫的諸工作上成就了更大的發展。

把經濟學從布爾喬亞視野之狹隘性中解放了的卡爾，又開創了「廣義經濟學」的端緒。恩格斯說：「爲了完全執行布爾喬亞經濟學的批判，祇知道生產、交換及分配的資本主義的形態是不夠的。在它以前已經存在的，或在未發展的國家中與其並存着的諸形態，至少必須要把它大體的輪廓加以研究和比較。直到現在，這樣的研究和比較，大體上只有卡爾着手過，關於前布爾喬亞的理論經濟學一向所認識的，差不多大部分歸功於卡爾的研究。」

研究前資本主義諸構成形態的古典經濟學者們，完全和研究基督以前之宗教的基督教神學者們一樣，（卡爾的比喻）孤立的在歷史之外考察了資本主義的確，其後經濟學派中的若干，特別是歷史學派熱心的開始了研究封建時代和古代世界等等；但是第一，他們缺乏理論；第二，在他們看來，歷史這東西是無定形的，時代和時代之間沒有境界——那即是經濟的諸構成形態交替的歷史。在卡爾看來，歷史和理論並非互相排斥的東西，而是互為條件的（不用說決非融合）。卡爾由於研究關於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和沒落……等，同時，亦指示着它的理論和歷史，即向前資本主義的諸構成形態及其以後的雙方放射着一種光芒。

資本主義的研究，脫出它本身生產方式的限界以外。卡爾由於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當做歷史的被制約了的，當做歷史過程的生產方式，當做人類史上的一個特定階段加以研究，遂對於前資本主義經濟的諸構成形態和替代資本主義經濟的構成形態雙方，投以燦爛的光輝。實在，當觀察作為人類史之一個階段的資本主義時，它和為其母胎的各個時代以及由此而準備着物質諸前提的時代是極密切的聯結着的。所以要把資本主義的研究，從它以前的諸生產方式或以後的生產方式孤立起來是不可能的。並且在現實上它不是孤立着的。



卡爾之論述關於其他經濟的諸構成形態是帶有兩重的性質的。第一是具有比較對照的意味（把資本主義的諸關係和以前及以後的諸關係加以比較）第二是直接提供若干篇幅作社會主義及前資本主義諸關係的研究。甚至有時全章都被提供於某一問題的研究（如關於前資本主義時代的商業資本，關於高利貸資本，以及關於前資本主義時代的土地關係各章。）

科學的社會主義的第二個創造者恩格斯，他是把「狹義經濟學」及「廣義經濟學」這兩個術語最初引用在經濟學中的一個人，但他對於資本主義以前的諸構成形態及以後的構成形態也投射了不少的光芒。特別是他的反杜林論及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和這個問題的關係非常之深。但是完成了廣義經濟學之全部發展的還是在展開了關於轉變期經濟學之理論的伊里奇和約瑟夫的諸著作上。從來立腳於經濟學這門學問之進步的基礎上，敘述社會主義這件事，現在在蘇聯已經轉變為立腳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上的真理。

我們已反覆的強調過，經濟學是隨着經濟自身及階級鬥爭的發展而發展的。同時，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哲學的發展，特別是一般的方法論的發展密切的關聯着的。重商主義者雖還是素樸的經驗主義者，但是重商主義崩潰期的經濟學者威廉·培蒂，却已努力把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導入於經濟學之中。承繼培蒂的事業的是重農主義者，特別是這一派的領袖，業醫的蓋斯

內(Francis Quesnay)重農主義的全部經濟思想，以一定的社會及哲學的思想——即自然法及自然秩序的思想——為前提。亞丹·斯密及李加圖雖然也是從自然秩序的思想出發，但是他們却使他們前輩們思想和方法，都更進一步的發展了。

如像大家所知道的，卡爾主義經濟學，是當做給與人們以整個世界觀之一般理論的卡爾主義的一部份。伊里奇說：「卡爾的學說，因為是真理的原故，所以是全能的。他是完全的，一絲不亂的給與人們以整個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和任何迷信，任何反動，以及對布爾喬亞壓迫的任何擁護是不相容的。他是人類在十九世紀所創造出來的最好的東西，即德意志的哲學，英吉利的經濟學，法蘭西的社會主義之正當的承繼者。」①

因為這種原故，所以經濟學非但不能離開經濟的政治的利害，並且也不能離開科學的及哲學的思想而研究。

## 研究方法

卡爾的方法是唯物辯證法的方法。這個方法，可以應用於一切知識領域，且被卡爾主義者應用

① 伊里奇：卡爾主義的三個源泉及三個構成部份。

着，但是研究的性質，一切學問上共同的方法在各種的學術上被適用的具體方式，却首先是由研究對象自身所決定的。

經濟學史家處理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和思想。他首先得基於他所有的文獻的資料而獲得關於那些文獻資料的知識。但是這不過是預備的工作。一個經濟學史家，他的真正任務，乃在闡明他正研究着的經濟學說所表現的經濟的、政治的利害。可是，經濟的、政治的利害，則又為生產諸力以及與之相應的生產諸關係所決定。

布亞喬亞經濟史家（特別是他們之中最真摯的人們）亦往往在研究經濟學的見解之前，先要替這種學說發生的時代給以特徵似的一個概觀。但是，第一，所謂時代特徵的概觀，在他們通常是全然的「雜亂」，即不過是將經濟、政治、哲學等雜亂在一起的東西。在這種雜亂的概觀中，最常講到的便是所謂時代「精神」——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精神。第二，布爾喬亞的歷史家離開唯物論，階級鬥爭，黨派性等而堅守着他們的科學。他們怕這些「惡魔」比怕火還要厲害。反之，卡爾主義者則理解這樣的事：「在工資勞動的社會中期待公平無私的科學這件事，和期待公平無私的工廠主減少資本的利潤以增加勞動者的工資是一樣的愚蠢啊！」

● 伊里奇上述書。

唯一科學的經濟學史，是由卡爾創立的。「工藝這東西，是闡明人類對於自然之能動的關係，即闡明人類生活之直接的生產過程，從而人類的社會生活諸關係，以及知識的諸觀念之直接的生產過程。從這種的物質的基礎上來從事抽象時，甚至連宗教史亦成爲無批判的東西。實際上，由分析來發現宗教之夢幻觀念的現世核心，比從各個場合上的現實生活諸關係來展開被天國化了的諸形態，要容易得多。可是後者才是唯一唯物論的科學方法。」<sup>①</sup>

卡爾自己把宗教史家所要求的，適用在經濟學史方面。他從「現實生活所給與的諸關係」中引出了與之對應的諸經濟學說。不消說，卡爾不僅用這樣的方法研究了重商主義，而且還用這樣的方法研究了重農主義，英國古典派經濟學，俗流的經濟學者，小布爾喬亞經濟學者以及當時社會主義者的經濟學說。然而同時卡爾研究着各種經濟學說中論理的構造，即論理的成就之程度。在發展的經濟理論和不發展的經濟理論之間，內部的首尾一貫性，論理的堅固和整齊是不相同的；研究者不消說是不能忽視這些的。但是他却不可陷於把從比較不發展的理論向比較發展的理論之推移，看做恰恰像思考自體之自己運動一樣的幻想中。

社會存在的發展，決定社會意識——在階級社會中則爲階級意識——的發展。這階級意識的

諸形態之一就是經濟科學，經濟科學的發展是現實生活諸關係發展的結果。

但是在另一方面，經濟科學不僅是階級諸關係的表現，他又是階級鬥爭的手段。古典經濟學是用它的劍頭向着當時還殘餘着的封建關係以及由商業資本支配時代而來的諸關係的。俗流經濟學則向普羅列塔利亞而揮其刀鋒。卡爾主義經濟學則又是企圖從資本的羈絆中掙脫出來的工人階級的鬥爭武器。所以經濟學不僅要當做階級諸關係的表現，而且必須當做對這些關係和作用的手段去研究。

雖然如此，但社會法西斯蒂們却並不這樣的來考察。他們認為經濟學也在其內，一般的科學是超階級的，是無黨派性的。在卡爾經濟學之歷史的準備①一文中，希爾法丁說：

「馬赫 (Ernst Mach) 把科學的發展當做對事實之思維的適應和思維相互間的適應來說。對事實之思維的適應，是生物學的必然，是人類生存的條件；而在人類生存上，科學也是生存競爭的一種手段……關於思維相互間的適應是怎樣呢？這是由我們思維的本性而來之論理的機能。那也是『思維節約』的結果，同時又是它的原因。思維打算盡可能假借少數概念的力量而用最節約的方法整理所有的現象，它努力打算假借少數法則的力量來理解複雜的整個現實。」②希爾法丁

① 這篇論文被收集在杜伏拉伊斯基和魯賓合編的經濟學的根本諸問題中。

「證明」經濟學的發展（它的歷史）回到思維和事實的適應及思維相互間的適應的樣子，甚至用實例來解說。

這裏所引的論文，是在一九一〇年即希爾法丁博得左翼社會民主主義者之聲譽的當時，在德意志社會民主黨理論的中央機關誌上用德文所發表的。強調這件事，並非徒然。因為在今日，徹頭徹尾社會法西斯蒂化了的這位「卡爾主義者」，似乎是在以馬赫的科學發展論來冒充卡爾的經濟學發展的理論。希爾法丁更靦顏無恥的說，在剩餘價值學說史中，經濟學的發展被卡爾馬赫式的研究着。自培蒂始，後來的經濟學者，便沿着思維相互間的適應及思維和事實的適應這條線訂正了他們的前輩。同樣，卡爾亦沿着這兩條線訂正了李加圖。關於剩餘價值學說史的方法，希爾法丁則作如次的「發現」：「自其方法來考察全部三卷（指剩餘價值學說史）時，首先諸君將感到非常的驚異罷？爲什麼呢？因爲那是黑格爾的方法！卡爾敘述的是經濟學的自己發展。即在那裏所論的是經濟學自從把勞動認爲商品及貨幣之一般性質的培蒂和佛蘭克林最初的正確的見解開始，在卡爾的體系中已經達到完結的樣子，」但是如果仔細來看一下，則這種「非常的驚異」便消失了，爲什麼呢？因爲「經濟學的自己發展」是依照馬赫所確立的法則而行的。即可以說卡爾是着了馬赫的先鞭的，

●同上。

但却不能說完全着了牠的先鞭！爲什麼呢？因爲卡爾敘述了「思維相互適應」的過程，即思維的「自己發展」，而把思維向事實的適應置之論外的原故。「唯物論的歷史應該在歷史的發生上來敘述罷！即立脚於所達到的經濟發展階段的基礎上，而應該指示舉凡一切問題是否對經濟的思維而提出的。」●但是，卡爾却没有做這件事。

而希爾法丁却馬赫式的敘述着他的所謂唯物論的歷史。而階級鬥爭則被希爾法丁從唯物史觀上割棄了，而後，僅僅經濟發展的各階段對經濟的思維所提出諸新的問題，即馬赫式的說來，祇剩下思維必須適應諸新的事實這件事了。而卡爾的「缺陷」則在於沒有指出諸新的事實和諸新的問題從那裏被提取出來這一點上。」

希爾法丁也有「階級鬥爭」說，（因爲他也是「卡爾主義者」）但是，其任務乃在於正確的理論產生出妨害其根據內在的論理而發展的一種錯誤的理論這一點上。「例如馬爾薩斯對於勞動價值說之論爭——希爾法丁說——同時對於自由主義的產業布爾喬亞的要求則代表貴族價值的利益的擁護。假如要包含這些使人從勞動價值說的發展上脫離的一切意見，則今日在剩餘價值學說史中所發見的整然的論理的發展姿態，將立刻被推翻了罷！尤其是卡爾之所以把那些意見

●同上。

置之論外，無論怎樣並非爲了想給敘述以整然的秩序；因爲事實上，那對於經濟學史是沒有興味的。它本身祇從和純粹經濟學無關的，社會學的觀點纔成爲關心的對象。脫離勞動價值說之發展的種種意見，由經濟上的利害關係來說明。從而它便和科學的公平相矛盾，和科學發展的內部必然性相矛盾，因此它便置於僅圖闡明科學發展之內部必然性的論外了。」

這樣，和社會學毫無關係的純粹經濟學（多麼堂皇的「卡爾主義的」用語啊！）在階級鬥爭的外部，隨「科學發展之內部的必然性」而發展。把這樣觀念論的愚劣思想推托到卡爾身上去，希爾法丁是多麼蠢笨的傢伙啊！

### 經濟學史的任务

科學的歷史，必須闡明科學發展的規律性；經濟學史，必須闡明經濟學發展的規律性。

如果根據和「卡爾主義者」希爾法丁一鼻孔出氣的馬赫來說，科學發展的法則，是自然法則。在思維向諸事實的適應上，「人類生存條件之生物的必然性」出現，在思維相互間的適應上，其來自思維之法則的機能<sup>①</sup>出現。從而，一個是生物學的法則，另一個則是思維的法則。但是假若同

①同上。



意馬赫和希爾法丁的話，則生產和分配的諸法便能依據更大的理由視爲自然法則，因爲誰欲否定物質的財貨之生產和分配是人類生存的條件呢？

物質的生產總是被社會所制約的生產；同樣，「精神的生產」即科學、藝術等，也是被社會所制約的。關於經濟學，卡爾說：「在社會中生產的各個人，從而各個人爲社會所制約的生產——這是顯明的出發點。」<sup>①</sup>這句話，可以這樣說：即在社會中從事科學研究的各個人，從而各個人爲社會所制約的思維活動——那顯然是一切科學史——經濟學也包含在內——的出發點。

重商主義者研究流通，重農主義者把研究從流通部面轉移到了生產部面。這當然並不是爲了這樣的理由：即在重商主義者的時代，生產不是人類生存的條件，不是流通自身的條件；到了重農主義者的時代，牠才成了流通的條件。重商主義者之忽視生產，更正確的說來，認流通優於生產的，要依社會的歷史的諸條件來說明。

卡爾說：「近世生產方式之最初的理論的處理，——Mercantilism 重商主義必然的從在商業資本的運動中被獨立化了的流通過程上的諸現象出發，從而它只不過把握了外表而已。……關於

① 見上述希爾法丁論文，在那裏他替馬赫註解，說馬赫已到達唯物史觀，多麼堂皇的唯物史觀啊！

② 卡爾：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說。

近代經濟的真正科學，直到理論的攷察從流通過程轉移到生產過程時才開始的。」●

不僅重商主義體系的内容，就是它的方誌和材料之理論的整理，也是為社會所制約的。就是說重商主義的體系，必然的從在商業資本的運動中被獨立化了的流通過程上的諸現象出發，所以牠只不過把握了外表而已。

因為重商主義者通過商業資本的眼鏡來看財富，所以他們不能製造出重商主義以外的體系來。重商主義體系代表濟經學的幼年時代，它恰恰和商業資本的支配時代代表資本主義的幼年時代一樣。

古典濟經學者與重商主義者論爭，把他們的見解看做樸素的，甚或嘲笑其為妄誕。古典濟經學者之科學的哲學的教養，無疑的是比重商主義者有不可比擬的超越；但是決定的事，是古典濟經學者代表產業資本，所以他們對重商主義的鬥爭，就是產業資本對商業資本鬥爭之理論的表現。

要之，經濟學史既不是在由來於一般人類生存條件之「生物學的必然性」上去探求諸經濟學說發展的法則，也不應在由來於思惟之本性的諸機能上去研究。經濟學的發展法則，必須在經濟學自身，即在生產諸力及生產諸關係的發展中，在階級鬥爭的敵對及階級鬥爭的激化上所表現的

生產諸力與生產諸關係之矛盾的發展中去探求。

托拉赫登堡指摘信用理論極多這件事，好像多麼深刻的思想家似的發起如下的議論。他說：「只依據經濟學有階級的性質啦，各種經濟思潮是反映特定的社會團體之利害的一類說法去說明這種矛盾，說明似乎誰都承認的觀點之缺乏，是困難的。信用理論的數量比階級的數量要多的多。」

我們可以對於現代信用及其組織的著者，斷言利潤、資本、工資以及其他理論的數量，也比階級的數量多的多。因此，階級的態度，賦予理論以階級的特徵，就變成無益的事。爲什麼呢？因爲它沒有認識上的價值。總之，量的處理階級和理論，是和卡爾主義沒有任何共同的處理法。第一，階級這東西，並不是什麼永久凝結了的團體。第二，在某一階級的內部，有利害不同的種種階層。第三，也存在有中間的團體（小布爾喬亞的種種階層）。最後第四，階級不能相互脫離其他階級而孤立生存。我們知道，即在普羅列塔利亞特的階層中，也有受布爾喬亞亞特別是小布爾喬亞亞的影響的，這是我們所曉得的。但是，要依照托拉赫登堡用算術的方法來正確的計算階級和理論的數目，那就作成雙方平衡的必要。這些數目好像是全然永久不變的。

斯密、李加圖、賽依、巴斯夏（C. F. Bastiat）等，雖然都代表着產業布爾喬亞亞，然而第一，他們是在產業布爾喬亞亞的歷史發展不同階段上代表了，第二，他們是在不同的領土，不同的民族，國家

等條件之下代表了。在工場制度的手工業生產的基礎上的布爾喬亞的發展和在機械生產的基礎上之布爾喬亞的發展——這是布爾喬亞社會發展的兩個階段。

斯密與李加圖之間，相距雖甚近，但却有時間的隔離。然而，這僅少的時間隔離，從它的意義上說起來，則等於一個整個的時代。英國的產業革命，法蘭西大革命，及甲可賓戰爭和拿破崙戰爭——都是在這一時期內發生之決定的事件。

李加圖和塞依是同時代的人，但是前者代表美國的產業布爾喬亞，後者則代表了法蘭西的產業布爾喬亞。然而，英國和法國是在不同的產業發展階段上，而且曾因兩國前此歷史的不同，而被複雜化了。李加圖繼承斯密，曾使斯密理論中科學的要素及其方法之科學的方面向前發展。塞依繼承斯密，却使斯密理論中庸俗的要素發展起來，變成了俗流經濟學的創始者。塞依和李加圖都從斯密出發的，但是他們所走的方向恰是分歧的。

李加圖以後，俗流經濟學也在英國被確立起來。然而，它和法國的俗流經濟學並不是一樣的。那就是由於兩國經濟發展不同的原故。不僅現代布爾喬亞經濟學者們各種庸俗的理論互相有着顯著的不同，即塞依和巴斯夏當時的俗流經濟學，也顯有差異。因此當研究各布爾喬亞的理論時，不僅要闡明那些理論的統一性，同時還不得不闡明其相互間的差異。

卡爾主義的理論家，必須指出爲什麼從單一的社會根源上會成長出有無數樹枝的大樹來——這些樹枝有時互相向極遠的方向分歧。但是那些不從這一枝飛到那一枝去看它們同一根幹，甚至連看也不想看一看的「卡爾主義者」，是一分也不值的。

古典經濟學在原則上和俗流經濟學是有所差異的，而認識兩者差異的必然性也是極其重要的；不過忽視這兩個布爾喬亞經濟學體系之統一性，却是絕對不允許的。古典經濟學是布爾喬亞青年時代進步傾向的表現；俗流經濟學則是其自利的、辯護論的傾向之表現；雖然如此，但是却不能過大的來評價布爾喬亞的進步性，爲什麼呢？因爲布爾喬亞的進步性，始終是有一定限度的。

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創設者們，由於把經濟學從布爾喬亞的限制性中解放出來，纔完全把它糾正過來。但是却不能因此就忽視了卡爾和古典經濟學者之間的聯繫。這裏面也有傾向於過大評價這聯繫的人；他們把卡爾和古典經濟學者之間的差異，歸結到極端的差異，甚至社會的政治的見解的差異。其他的人，則又過分重視兩者的差異，而未充分的評價兩者的繼承關係。這個問題，被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二卷的序文中，完滿的與以解決。

恩格斯把卡爾在經濟學上的任務和有名的拉瓦錫 (Lavoisier) 在化學上的任務相比是對的。恩格斯說：

「在剩餘價值上說，卡爾對他的前輩們所有的關係，和拉瓦錫對普里斯特里及希爾（Priestley and Scheel）所有的關係一樣。我們今日稱爲剩餘價值的生產物之價值部分的存在，還在卡爾以前，就被確認了。同樣，這個價值部分由何而成立的呢，即它是由佔有者並未給以任何等價的勞動生產物而成立的這件事，也多多少少明瞭的被敘述過了。但是人們却止於此而未前進。有些人們——如古典的布爾喬亞經濟學者們——至多不過停止在研究勞動生產物在勞動者和生產手段所有者之間所分配的量的比率上。另外一些人們——社會主義者們——則視爲這種分配是不公平的，而去尋求可以廢除這種不公平之幻想的手段。兩者都被局限在他們以前的經濟學上既成範疇之內。

「在這裏，卡爾出現了，他直接的和他的前輩們對立起來。他們認爲解答的地方，他只視爲問題。他知道眼前的東西既不是脫然素氣體，也不是火氣體，毋寧是酸素。他知道：這味成爲問題的，並不祇在確認經濟上的一種事實，或此事實和永久的正義及永久的真理相衝突的事件，毋寧是負有應該把整個經濟學與以變革的任務，而且把可能理解資本主義生產之總體的鍵鑰，提供給懂得使用這個鍵鑰的人的手中這一事實纔是問題。卡爾基於這一事實，去研究一切既存的諸節，這恰恰和拉瓦錫以酸素爲基礎，去研究鹼素化學上之既存的諸節一樣。爲了要知道剩餘價值是什麼，必須先知道價值是什麼，所以首先必須以李嘉圖的價值論本身，作爲批判之對象。」

在某種意味上，成爲古典經濟學和卡爾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的，是空想的社會主義。空想的社

會主義（特別在大烏托邦主義者的著作中）用它那無情的輝煌的批判，對於古典經濟學的基本要  
求，即對主張布爾喬亞的體制是適應人性的自然體制那個出發點，給與了痛烈的打擊。不錯，自然性  
的「原理」烏托邦主義者也沒有把它拋棄；而且在這一點上，他們的方法論和古典經濟學者的方  
法論同樣都是形而上學的。但是烏托邦主義者却拒絕給與布爾喬亞的體制以自然的稱呼，而對社  
會主義給與這個稱呼。實際上，終究是烏托邦主義者們纔把資本主義的生產換以社會主義的生產  
這個問題，提上了日程。誠然，他們還不理解這個問題之歷史的被制約性，沒有理解在資本主義自身  
之中，破壞它的力量（使資本主義崩潰的力量）正在逐漸成熟。和這個完全同樣，烏托邦主義者們，全  
然不知道資本主義的發展法則。但是他們却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給與科學的批判，替卡爾主義，則  
作為清掃地盤的先鋒隊而出現了的。而這一點就是他們的功績之一。烏托邦主義者們的第二功績  
是在於他們「多多少少在經濟學的、空想的、批評的、革命的形態上實行了經濟學的論駁」這一點  
上。烏托邦主義者和李加圖的商品價值為勞動時間所決定的意見完全一致，這簡直就是他們批評  
的出發點。但是他們發現了：在資本主義的體制之下，其中，當勞動和資本相交換的時候，這個法則便  
被破壞。烏托邦主義者們也和古典經濟學者們一樣，不知道勞動力的價值這個範疇。這是因為他們  
把活生生的勞動和被對象化了的勞動相交換認做了不等價交換的緣故。因為被預允支出作為工

資的資本對象化了的勞動，比勞働者交給資本家的勞動少，所以有的人便根據社會主義的原理，要求資本主義生產的改造，另外一些人——如蒲魯東式的小布爾喬亞的社會主義者——便打算廢除在發展了的形態上的資本主義，而保留由所謂等價原則舉行交換的單純商品經濟。

烏托邦主義者，雖然由於從古典經濟學家們的學說中引出社會主義的結論，而傷害了這些學說在布爾喬亞者間的威信，可是這樣他們却助長了俗流經濟學的勝利。從此以後跟社會主義（最初是空想的社會主義，後來是科學的社會主義）作生死之爭的這一最有責任的任務，便擔負在俗流經濟學的肩上了。

隨着卡爾主義的出現，科學的經濟學和俗流的經濟學之間，便劃分了一條難以跨越的鴻溝。卡爾首先由於把古典經濟學重新加以檢討而利用了他們之中一切貴重的東西，即科學的東西。反之，俗流經濟學則聲稱古典經濟學中之科學的要素無根據而把它拋棄，或者不能辨別而把它歪曲。例如布爾喬亞經濟學史的偽造者們，爲了要把斯密和李加圖由勞動價值說論者轉爲費用價格說論者起見，如何的努力，乃是周知的事實。

從這件事情上可以知道，一切企圖使卡爾主義和現代布爾喬亞經濟學接近的嘗試——例如魯濱（見其所著西歐的經濟學者）和布留明（請看他對於斯托爾茲曼——Rudolf Stolzmann



——及其他「社會學派」給與的特徵——一方面是對布爾喬亞經濟學者的「中傷」，加以以冤枉罪，另一方面——當然這方面是更爲重要的——這種嘗試，是把卡爾主義及布爾喬亞經濟學的進化的卡爾主義的理解完全歪曲；爲什麼呢？因爲布爾喬亞經濟學的發展，正在和卡爾主義愈離愈遠的背道而馳，並且不得不如此，決沒有與之接近的道理。

說在階級上對立了的體系，在某種形態上接近起來，等於說階級鬥爭如今在鈍化，矛盾在減少，此後，在鬥爭過程上的兩個階級的經濟學體系之間，也就在開始着獨特的「思想的交換。」這樣的想法和現代社會民主主義<sup>①</sup>的精神完全一致，但和真正的卡爾主義却一點也不相像。

理論不能離開實踐，不消說這在經濟學史上也是適當的。卡爾主義的經濟學史，在和布爾喬亞的諸理論及卡爾主義理論的諸歪曲的鬥爭上，是最重要的武器之一。爲了和有害的諸傾向作有效的鬥爭，不僅要知道那些傾向的現在，並且也有根本的知道其過去的必要。同時，又爲了正確的理解卡爾主義的理論起見，也必須歷史的地來把它加以研究；爲什麼呢？因爲已成了——發生鞏固、發展難以壞破的一種力量的原故。

①但是社會民主主義者，如以前我們所見到的一樣，單單這樣的「交換」已經不滿足了。他們正打算來候最新的俗流的「理論」的安好，而完全拋棄卡爾的經濟學了。

由於在各種階段上研究這個門爭各種問題便被投射了新的光芒它的意義也變成可以更深刻的理解似的。同時這是理論鬥爭最好的學校。因為卡爾和伊里奇已經給了我們正確的處理經濟學史的一切基本的東西，所以這一研究也就比較的容易了。即因為研究方法，卡爾前後以及現代的布爾喬亞和小布爾喬亞經濟學的許多代表們（孟什維克也在其內）之具體的評價，都由卡爾和伊里奇給了我們（尤以在剩餘價值學說史和在對人民主義者及合法的卡爾主義者的批判上），所以，經濟學史面前的任務的解決，是再容易沒有的了。

### 「資本論」與「剩餘價值學說史」

卡爾在一八六五年七月三十一日給恩格斯的信中說：「說起關於我的理論的工作來，是這樣的：我必須再寫三章書，這樣，理論的部分（最初的三卷）便可結束。此外，第四卷（文獻史）也不能不寫。這在我是比較容易的工作；因為一切的問題，已經在最初的三卷中解決完了，在第四卷中，只是在歷史的形態上重複一下罷了。」

卡爾是這樣的把學說史看作資本論的第四卷，把在最初的三卷中已經在理論上解決了的，作為「歷史形態上的重複」。從考茨基對學說史第一卷的序文上看來，據說恩格斯也曾打算把學說

史作爲資本論第四卷來刊行，然而考茨基本諸他敘述於上述序文中那樣的考慮，決心要把學說史作爲別種書籍來刊行。可是考茨基所考慮的，難以完全同意，按照他的意見來說，結局問題便歸結到這一點上，即把學說史作爲資本論第四卷來刊行，要遇到非常的困難。這種困難究竟是難以克服至何種程度，根據考茨基的考慮，那是不能判斷的。但是第一，考茨基把卡爾的意見和恩格斯的意見都忽視了，是沒有爭論的餘地的。第二，考茨基不理解資本論的任務和方法論，以及根據這二點所決定的資本論的構造。考茨基以爲把卡爾所給與的經濟學史，如作爲資本論的附錄或補充之類的東西，但可以容易從資本論分離開來的。

卡爾在自己的著作上給了資本論和政治經濟學批判這兩個名稱。所以，卡爾一開始，就由於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同時，以研究其在布爾喬亞的諸經濟學者的頭腦中的反映爲任務的。隨之，卡爾研究的目的是在於建設新的經濟學，而這個目的若不從批判的克服既存的經濟學着手，是不可能達到的。然而倘使是這樣——並且實際上無條件的是如此——則經濟學史便是資本論的一個構成部分。誠然，卡爾在資本論的全部三卷之中——無論在本文中，或在註解中——都把他的前輩及同時代的人，載於批判的俎上。但是，卡爾不能在這樣的形態上，把各個的見解，各個的理論，許多的思想和體系，在其「歷史的前後繼承關係上」換句話說，在歷史的形態上加以批判。卡爾在作爲

全部著作之重複，而且是構成部分的別卷上完成了這些工作。

考茨基要把學說史作爲另一種書來刊行所提出的理由中，如果多少有可能接受之處的話，那麼結局便回歸到這一點上：即在學說史中反復着許多在資本論最初的三卷中已經被說明了的東西。從這裏，考茨基便下了如下的結論：學說史和資本論是并行的著作，並不是資本論的繼續。但是，如果依照同樣的方法，便可以認資本論第二卷是和第一卷并行的著作，爲什麼呢？因爲在第二卷中，也反復着許多在第一卷中已經被說明了的東西。這樣的重複，「從而」又這樣的「并行」，甚至在同一卷書中，也很多的存在着，例如在第一卷第四篇（工資論）中，就重複着很多在同一卷第二篇分析勞動力的價值時已經說明了的東西。

把現象在形而上學的，即在孤立的，在凝固了的姿態上去研究的人，自然可以避免重複。他可以一點也不觸到貨幣，而「完滿」的研究商品，或者也可以把商品放在一邊去考察貨幣。但是形而上學者，却不去闡明現象的本質，它的真實的性質，且亦不能闡明；這是只有根據辯證的方法，才得以闡明的。爲什麼呢？因爲它——現象的本質——是辯證法的。就上面所說的爲例罷，我們不能不說，沒有商品，貨幣就不存在；同樣，沒有貨幣也就沒有商品。因此，商品價值、價值形態的分析，同時也就是貨幣的分析。然而也並不是說貨幣之獨立的分析是毫無意義的，因爲在商品和貨幣的統一性中，也還

含有它的區別。從而，商品問題和貨幣問題的統一性，並不是拋棄兩者的區別，反之，倒是以它爲前提的。在這樣的處理方法上，——而且這是唯一正確的做法——重復是難以避免的，但每次在新的斷面上重復。

同樣的，關於資本論的理論部分和歷史部分，也可以這樣說。

當樹立新的經濟學的時候，卡爾也不能使積極的部分離開歷史的、批判的部分而孤立起來；不能使後者離開前者而孤立起來。當他在最初三卷中敘述自己的理論時，同時，他不得不指出舊經濟學的無力。又當他在第四卷中敘述並批判舊經濟學時，他不得不使自己的見解或理論和它對立起來。在這裏，非但重復是不能避免的，而且還是必然的。

無論在資本論最初的三卷中，或第四卷中，卡爾都建設了爲資本主義之學問的，爲資本主義變革之學問的新的普羅列塔利亞的經濟學。但同時，他却<sup>在</sup>第四卷書中重新建設並糾正了經濟學史。古典經濟學者，把重商主義當做完全的錯誤而處理了的。卡爾却在重商主義之中，看出了商業資本之經濟和政治的表現，更在後者之中，看出了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上的特定的階段（初期的階段）。可是，這意思就是說第一，卡爾把重商主義看做完全合理的現象，即爲歷史所制約的現象；第二，他闡明了重商主義之階級的本質，社會的政治的內容。

這樣，如卡爾自己所指示的最初的三卷，構成理論的部分，在這裏面，順序的研究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

我們已經說過卡爾由於他的研究樹立了新經濟學，而當時後者若不克服過去遺產之批判的攷察，則後者是樹立不起來的。

因此，資本論也就是政治經濟學批判，而其經濟學，便是由布爾喬亞經濟學者們所繼承下來的。但是在批判的部分中，體系化是必要的，新的斷面上的重複，在和資本主義的發展並行的思想之漸次發展的斷面上的重複，是必要的。如據卡爾的計劃，那是資本論之直接的繼續，是應該在必須作其第四卷別卷上做的。考茨基並未執行這個工作，且也不能做。在當時，考茨基對於資本論的方法論，是不關心的。在他寫的關於資本論的文字中，他全然沒有要闡明其方法論的企圖。百分之百的機械論者考茨基不理解唯物論的辯證法，而且也不能理解。

## 第二章 重商主義的成立和發展

重商主義是商業資本的意識形態。但是這所謂商業資本，並不是一般的商業資本，而是先於產業資本的一個特定時代的商業資本。

### 作為資本主義產生之「前史」的商業資本

首先，我們要攷察作為產業資本之先驅者的商業資本的特徵。商業資本是產業資本的「前史」。卡爾寫道：「却說理解遠在資本尚未到使生產從屬於它以前，爲什麼商人資本便當做資本的歷史形態而出現，也沒有絲毫的困難。商人資本及其到某種程度的發達，是其自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發展的歷史的前提；第一，因爲它是貨幣財產集積的預備條件，第二，因爲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是爲了商業生產，不是以各個顧客爲對象的大規模的販賣，從而也不是爲滿足自己個人的欲望而購買，

而是以使許多人的購買行爲集積於自己購買行爲上的商人爲前提的。另一方面，商人資本的全部發展，賦與生產以逐漸以交換價值爲目的的性質，起着使生產物逐漸轉化爲商品的作用。」●

商業資本，逐漸賦與生產交換價值生產的性質，但是另一方面，商業資本並不是產生交換的，而是在商業資本自身已經發生的交換的基礎之上發生的。商人是媒介者，所以爲商人所媒介的環，即買者與賣者必須存在。一句話說來，商業資本是交換的結果，是交換發展的產物，並不是它的原因。隨着勞動生產物轉化爲商品，商品中之一種轉化爲貨幣時，貨幣便開始獲得新的各種機能，即作爲資本的諸機能。「被送給他人消費的各個生產者的生產物，只由於採取貨幣的形態，換句話說，只在質量的兩方面預先受到社會的計算之後，才達到消費者的手裏，給予生產者取得其他社會生產物的權利。可是，這種計算，是在生產者的背後，通過市場的變動而進行的。這種生產者所不知道，離生產者而獨立了的市場的變動，在生產者們之間不得不發生不平等，由於使某人破產，把爲社會勞動產物的貨幣給予別人之手而不得不強化這種不平等。爲包買人之貨幣所有者的力的原因，也就由此而明白。依此力而出的源泉，在於那成天價工作，即令是最大的也竭力以一星期爲單位而反復工作的手工業者們之間，在於祇有他握有爲過去社會的勞動產物的貨幣，因爲這貨幣在他手中，就變成資



本即成爲占有別的手工業者之剩餘生產物的手段，所以——卡爾主義者下着結論道——在這種社會經濟構造之下，生產者的剝奪和榨取，全然難以避免的，非所有者之向所有者的從屬以及他們階級利害的對立，完全是必然的；——而只有這階級利害的對立，才作成科學的階級鬥爭觀的內容。」

使商業資本成爲必要的充分前提，是商品流通。G—W—G'以W—G—W爲前提，如沒有後者，前者也便不可能。但是另一方面，W—G—W'不可避免的要到達G—W—G'的。在小商品生產中，隱藏着不集中的生產和集中的販賣二者間的矛盾。販賣常常被集中；而販賣却行於各種商品集中的市場上。

不集中的生產和集中的販賣二者間的矛盾，在商業資本中，發現它的解決。伊里奇說：「在商品生產發展微弱的時代，小生產者止於把生產物在地方的小市場上販賣。有時甚至止於直接達於消費者手中的販賣。這是商品生產低度的發展階段。隨着市場的不斷擴大，這種分散的小規模的販賣（它是完全和分散的小規模的生產相對應的）便不行了。在大市場上，販賣必須要是大規模的，大量的。然而生產之小規模的性質，到底和大規模的批發販賣的必要是不相容的。在既存的社會經濟

的諸條件之下，即在小生產者們趨於孤立解體的狀態下，富裕的少數人的代表們，除把販賣攬到自己的手中，而使之集積以外，是沒有別的方法解決這種矛盾的。所以，包買人們，使用大量的收買和集中製造品（或原料），以節約販賣費用，從小規模的偶然的，不規則的狀態上把販賣轉化為大規模的有規則的。——而在大規模販賣的這種純粹經濟的優越性的壟斷之下，小生產者便不可避免的和市場斷絕關係，在商業資本的權力之前，不得不陷於完全沒有寄托的境遇。①

商人的任務，當然不在於做販賣者和購買者的媒介，而在於使貨幣增殖，即在於使G轉化為G。雖然W—G—W生出G—W—G，但在G—W—G中，W和G都獲得了新的性質，就是說W成為商品資本，G成為貨幣資本，兩者相合而形成商人資本。即形成商人資本的兩種形態——貨幣形態和商品形態。

商業資本雖以交換為前提，但交換却不是商業資本的全部。G—W—G，只是從W—G—W中發展出來的，而且是可能發展的；雖然如此，但前者和後者是完全相異的另一種東西。G—W—G，雖然是W—G—W更加發展了的東西，但同時，兩者在原則上是不同的。在W—G—W中，交換是為消費而行的，結局，交換是使用價值的交換。在G—W—G上，交換是為致富的，但不是一般的致富，而

是爲了在貨幣形態上致富而行的在布爾喬亞經濟學者說商人是購買者和販賣者的媒介這個主張中，忽視了最緊要的一件事，那就是在商人，這種「媒介」不過是必然性，難以避免的憎惡；他的任務是在於貨幣的增殖，一句話歸總，在於使G轉化爲G'。

「商品交換自身以及做商品交換之媒介的各項行爲——那是離開生產，由非生產者來實行的——不過是財富增殖的手段而已，但却並非簡單的財富，而是一般的社會形態上的財富，作爲交換價值之財富的增殖手段。發動的動機或決定的目的，在於使G轉化爲G'。在G—G'的交易中媒介着的G—W以及W—G'的交易，只作爲從G'到G—G'這一轉化經過的階段而表現。只有這G—W—G'才是作爲商人資本之特徵的運動，以使用價值的交易爲最後目的，生產者們自身之間的商品交換W—G—W上區別商人資本的東西。」

一方面，商品流通雖然是商業資本的前提，但另一方面，前者却以後者而在這個前提中起作用。即商業資本在不斷擴大的規模上，再生產商品流通，由於把一個部門的生產物供給其他各部門而把交換擴大下去。但是比這還更重要的，則是商業資本把財富作爲貨幣的財富而使之發展。現物的財富，使用價值的所有，在榨取者階級的消費中有其限度。然而貨幣的財富，是無限制的。加之，商人由於把一部門的生產物供給其他部門，也使消費擴大起來。他由於供給而發生需要。但這意思就是說：

第一他喚起對於貨幣的需要；對於貨幣的需要強化，從而湧起對於剩餘生產物的渴望，這因為是很容易由於商人的「媒介」轉化為貨幣的。

在中世紀輸入西歐諸國的，主要的是奢侈品。那是從產業比較發展的國家輸出的，反之則向這些國家輸入原料生產物。自是以後，外國貿易，不論在名詞之直接的意味上，或者換句話說，在本國內貴重金屬的出產微微，而各國貨幣材料的增加這一意味上，都是貨幣財富的源泉。

所謂商人，是貨幣形態上的財富代表者，商人層的分化，是貨幣財富的所有階級的分化，如果說財富一向是為土地所有所代表——土地是主要的財富的源泉——的話，則伴隨商人資本的發展之財富的貨幣形態，便和使用形態上的財富，即卡爾名之為「專作消費用的財富」那種封建領主的財富相對立。

商業資本的歷史，可以分為兩個時期。從商品交換中發生出來的商業資本，是隨商品交換而成長的。商品交換，在帶着都市支配的性質的範圍，小商品生產者自身在地方的市場上，販賣自己的生產物。這是基爾特及遵奉都市支配的時代，是都市的和地方的封鎖經濟的時代。第二時期是以大市場的形成，世界市場的發生，小生產者從屬於商業資本，和工場制手工業的出現為特徵的，這時商業資本到了得意的絕點。在這大商業公司，大商業利潤，以及大殖民地的掠奪被形成了的時代，後來代替了

商業資本的產業資本，還占着從屬的地位。工場制手工業經營者，除同時兼大商人的人們以外，還不過演奏着第二提琴而已。

### 商業資本時代經濟的及社會—政治的構造

然而我們不能過大的評價所謂商業資本的意義，把它認為好像是從自己的胎內造出一切的力量。「商業資本的發達，如果把它作為它自身來攷察的話，說明它是從一種生產方式向另一種生產方式的推移的媒介，是不夠的。」●卡爾更說：

「商業和商業資本的發達，到處使生產向着以交換價值為目的的方向發展，擴大其範圍，使其種類加多，給它以世界主義者的性質，使貨幣發展為世界的貨幣。雖然商業道東西，對於既存的生產諸體制——聽說形態不同，但却都是以使用價值為目的的——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多多少少給以崩解的作用。但是，他究竟是在怎樣的程度上，助長舊生產方式的崩解呢？這首先就要看舊生產方式的堅固程度和內部構造如何。這種崩解過程要歸到怎樣的結果呢？換句話說，怎樣的一種生產方式代替舊生產方式而出現呢？這是和商業無關的，而要看舊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如何。在古代的世界，商業的作用和商人資本的發達，常常在奴隸經濟上結束。又由於起點如何，也有僅僅使以直接生產生活資料為目標之家長的奴隸制

●卡爾資本論第一卷。

度轉化為以生產剩餘價值為目標之家長的奴隸制度的場合。反之，在近代的生產方式上，他便歸到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由此觀之，就知道這種結果，是被和商業資本的發達完全無關的別個事情所制約的。」<sup>①</sup>

商業資本之在工匠的基爾特體制上起了崩解的作用，使小商品生產者們從屬於自己之下，乃是因為小商品生產由於自己內部的性質而不得不崩解的緣故；又如上述，因為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它那發生衝突的矛盾在商業資本中發見出它的運動形態；而且又因為商品生產發展之主觀的諸要因（富裕的商品生產者和「暴發戶」）和客觀的諸要因（貨幣的蓄積和市場的擴大）從其胎內生長起來的緣故。商業資本之對於封建領地及封建諸關係，起了崩解的作用，乃是因為它們本身已經到了崩解成熟的程度。封建的土地所有之巨大規模的集積，廣大的拉蒂封狄姆<sup>②</sup>的形成，便和成為封建體制基礎的經濟之自然性質發生了矛盾。桑巴特（Sombart）說：「希皮特·豐·法爾聖斯坦伯爵，不論招集怎麼多的家僕，也吃不盡每年所收納的九千六百九十四塊乳酪餅……同樣，特里戴布特大寺的僧侶們，除去販賣而外，也沒有辦法處分一萬四千塊乳酪餅。五穀就縱令非養活幾千人不可，也不能全部把它做成麵包吃得干干淨淨。」<sup>③</sup>於是商人便以「助手」的姿態出現。

① 同上

② 拉蒂封狄姆（Latifundium）古代羅馬以奴隸勞動為基礎從事大規模經營的大土地所有形態。

就是說，他不僅接受了賦役經濟之超過分的販賣，並且也統辦了各生產物，特別是奢侈品，伯爵、男爵以及僧院院長等，便可以由「自己的」販賣超過分所得的貨幣，去買這些奢侈品。

隨着商品經濟和貨幣經濟的發展，現物納貢便好似爲貨幣納貢所代替，「超過分」甚至在農奴之間表現出來，因爲他們要支付這些貢納，非弄到貨幣不可。在貨幣形態上徵收租稅的新興中央集權國家權力，也向着這個方向去努力。

商人便這樣對整個經濟唱了個引子，這因爲當時的經濟，是以商人爲必要的緣故。說重商主義者是商人資本的意識形態時，我們却不能把它單純的去理解。不能把重商主義僅僅看做只是商人的意識形態。它是商業資本時代的意識形態。「支配階級的思想——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者們指示道——無論在怎樣的時代也是支配的思想，換句話說，支配社會之物質力的階級，同時也就是那社會之支配的精神力……支配的思想，不外是支配之物質諸關係的觀念的表現；那是支配之物質諸關係的思想的表現，換句話說，是以某一階級爲支配的諸關係之思想的表現，總之，那是表現這個階級支配的思想。」<sup>(4)</sup>

● 萊巴特：近世資本主義。

④ 卡恩文獻第一卷。

在商品流通的發展，市場及商業關係的擴大中所表現的生產諸力的發展，使商人轉化爲一個階級，商業布爾喬亞化。商業布爾喬亞化從不曾一度達到過像後來產業布爾喬亞化所達到的那樣勢力的階段。然而它（商業布爾喬亞化）却有相當的勢力——而它的勢力是在發展着的社會物質的利害上奠下了基礎的，並且還能予社會之整個經濟的及社會政治的構造以影響，在那上面打上自己的烙印。

桑巴特和其他布爾喬亞研究者們，把商業資本時代（如依桑巴特的用語，則爲早期資本主義）經濟以及社會的「政治的構造，視爲中世紀之經濟的及社會的「政治的構造的，所謂「都市」經濟和「地方」經濟的構造被擴大了的規模上的，即在全國規模上的再生產。如果說從來的生產和流通，是爲其爾特、都市評議員、地方的封建勢力所統制的話，那麼這個時期，經濟生活的調節和統制，便成了新興中央集權國家權力的工作。

「所謂實際軍商主義，不外乎是都市的經濟政策向極廣大的領土被擴張了的東西。都市把自己利害權於天地萬有的中心上，使其餘一切人們的利害從屬於自己的目的，與此完全同構。在……：……：權力下的廣大諸領域的政策，根本上也是自己中心的。」

●桑巴特近世資本主義。



丘爾伯也說了同一旨趣的話：

「在英國，國家的干涉政策，爲國家權力所採用，和在別的国家一樣，是出自中世紀社會體制之自然傳統的。封建領主自任爲自己臣民的一切經濟活動的自然的管理人。及至基爾特權力和市評議會，便發揮着更大的權能。正是有了這樣的傳統，國家權力，對於產業生活，纔得把持應行全面統制的使命之更堅決的信念；關於施行這種統制的權利和那是否適應了現實並且能否實現等，當時的支配者們，并未曾懷過絲毫的疑心。」

重商主義的這種俗流的處理法，沒有透入研究中的現象的本質，可以說只是從外部的標識，外表的類似出發的。基爾特和都市評議員，在小商品生產者的利益上，管理了商品的生產和發賣；此外，他們又在新誕生的商業資本的襲擊下，保衛了小商品生產者的利益。反之，商業資本支配時代的國家權力的經濟政策，是在商業資本的利益上，而且在絕對主義的利益上被施行了的。那是以使小生產者們從屬於大商業資本家們，使地方的封建勢力從屬於中央權力爲目的。被現象外表的類似奪去其注意的布爾喬亞研究家，是看不到那些現象之階級的差異的。

就是在經濟學講義的著者們——波格達諾夫和史威班諾夫，也缺乏階級的契機。所以——

● 丘爾伯：經濟學第八版，一九一五年，八七頁。

他們說——和國民的結合一起，領主的經濟政策也變成似乎呈現出國民的規模，遂至於它在所謂「重商主義體系」的名義之下爲人所知的思想體系上，取得原則的公式化。所謂「領主的經濟政策」，至於呈現出國民的規模」這句話，是抹殺了領主的政策和「國民的」國王之「國民」政策之階級的差異的。

他們又在他們的著作的其他部分上寫道：「從封建的世襲財產所有者——領主——發展到從事國民結合之國土的君主的最高封建領主（或事實上的國土管理者）他還站在自己領地上，而今不得不繼續在全國的規模上施行那在封鎖時代就已經施行了的經濟政策。」誠然，說作爲「最高的封建領主」的國王，一向就是一個「世襲的領主」這是對的，但是，及至他一度登上了國王的寶座，便不得不使其餘的「世襲的領主」們從屬於他自己之下。過去是「同僚之一」的他，現已高居於昔日的同僚之上，把他們作爲自己的臣屬；自然，他們雖然是臣屬，地位依然很高，那是不錯的；但是臣屬究竟是臣屬，由他們之中，拔擢官僚，軍隊的幕僚和宮中的貴族。「世襲領主們」的全體，是最高的社會層，因此，他們又是主權的支柱，可是沒有像從前那樣的權力了。宗教的「世襲領主」們也走了和他們同樣的過程，他們也臣服於國王的權力之下，他們的內部也會高官輩出，因而他們的

全階層，便從領主轉化爲王權的支柱，形成社會上第二流的特權階層。

在這過程中作爲最活潑的勢力之一的，是形成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整個第三階層之領袖的商業布爾喬亞（Bourgeoisie）和高利貸布爾喬亞（Lender Bourgeoisie）。正是在這一過程中，絕對主義和第三階層的上層之間的同盟，被鍛鍊、被鞏固起來。根據這個理由，也就不能說絕對主義的經濟政策是「領主經濟政策」的單純繼續了。

其次，是關於高利貸資本要說幾句話。高利貸資本和商業資本，依照卡爾的表現說來，是孿生子。作爲高利貸資本之前提（充分而且必要的），也是單純的商品生產。卡爾說：「高利貸資本之所以能存在，除生產物至少要有一部分被轉化爲商品，隨商品交易的發達，而貨幣在它那種種的機能上發展之外，就無需乎別的任何條件。」<sup>①</sup>然而這就是說商品生產，還在單純的或小商品生產的領域中。

爲高利貸之顧客的，是（一）商人（二）小商品生產者（三）貴族的代表。商人因爲商業的業務，貨幣是必要的，換句話說，他們以之爲（商業）資本。小商品生產者（或單純的小生產者）和貴族的代表，並非以貨幣爲資本，而是以之爲購買手段或支付手段。高利貸資本的特徵，就在於借貸

●卡爾：資本論第三卷下。

給非商業的方面，「在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時代高利貸資本，在兩個特徵的形態上存在着……這兩個形態，第一，是對於豪奢的上層人物（在本質上，是土地所有者的人們）施行高利貸；第二，是向握有自己的勞働諸條件的小生產者們施行高利貸。在這第二的小生產者中，雖也含有手工業者，但大多數却是農民，因為在前資本主義的諸關係之下，允許相互獨立了的個別的生產者存在，農民階級，一定是佔大多數的。」●

所謂小生產，是極不安定的存在，只要受到一點點打擊，它的再生產過程就馬上被破壞，而陷於混亂和動搖。在這樣的場合，小生產者就要求「助」於高利貸，可是祇要一次上了高利貸的鈎，那便永無脫鈎的可能。爲了僅留下一點最低限度的生活資料而支付那欲吞沒其一切剩餘生產物的高利起見，他必須不斷的舉借新債。債務只見增加，於是生產者遂以完全破產終局。所以，在這種條件之下，貸款并不是普通的經濟業務，而是惹起債務人破滅的一個災難。

大領主們也不是爲了經濟的業務（在封建諸關係下，他們不需要這種業務的貨幣，）而只因酒宴借入貨幣，他們除了訴諸暴力（所謂經濟以外的要因）而外，也沒有從借金中逃脫的道路。有力的封建領主，能夠自己宣言債務的無效，在這種場合，破滅的已經不是他，而是他的債權者了。但是

●同上。

就全體來看，因「借貸行爲」的結果而損失房產的貴族也不在少數。

正是在貨幣形態上之財富的蓄積這一點上，高利貸資本和商業資本一樣纔有其歷史的意義。「高利貸業，和以消費爲事的消費對立，直接作爲資本的發生過程而有歷史的意義。高利貸資本和商人財產，在離土地所有而獨立的貨幣財產的形成上有作用。」<sup>①</sup>

雖然高利貸資本對於小生產及封建的領有起了崩解的作用，但是對於國王的權力，却起了有利的作用。貨幣資本家們就是王侯的銀行家。

高利貸資本的歷史，也可分爲兩個時期；這時期，大體上和商人資本歷史上的兩個時期是對應的。在第一時期，是我們方才講過的貸款的兩種形態支配着，這樣，高利貸業便留下了罪惡的烙印。商業在當時，還被看做是生業，<sup>②</sup>換句話說，被看做爲得「衣食」之資的業務。當時商人一般的還兼爲搬運人，即他們自己把財貨從一個地方輸送到另一個地方，這件事情，也有給予助長此種見解的力量。當然，在那時候，商人也已把貨幣轉化爲資本，轉化爲榨取的用具，但這件事情是爲（一）商業的規模小，（二）它和運輸相聯結的這兩件事所隱蔽了。高利貸業，却什麼也不能把它隱蔽；由貨幣而生貨

①同上。

②恩格斯：現代資本主義——第十八章「作爲生業的商業。」

幣的事，則被認為反自然的瀆神的行爲。

第二期，即在大商業支配，工場制手工業發現的時期；高利貸業者成爲有名譽的人物，他和大商人並駕齊驅地形成第三身分的上層。當然，在當時對於高利借貸業的反響是擴大着的，但這不過是過去的尾聲，舊時代諸關係的反射而已。宮廷的御用銀行家，常常被賜以貴族的稱號，而重要的，則是所謂成了社會基本力量的貨幣，與其說在商人的手中，勿寧說是更多量的集積在他們的手中了。

兩個學生子——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勢力的增大，一方面是意味着舊來諸關係的解體；另一方面，意味着還缺乏適應於發展了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諸關係。在商人資本支配着的地方，時代落後的諸關係支配着。這種情形，在同一國內也可見到，例如，純粹的商業都市，在和過去諸狀態相類似的點上，呈現着和工業都市全然不同的姿態。①

商業——貨幣布爾喬亞的支配被物神化了，就是說它採取了貨幣支配的姿態。貨幣對於一切人都是必要的了，一切都追求貨幣，一切都渴望貨幣。貨幣對於商人，高利貸者，工場制手工業經營者是必要的，因為在他們手中貨幣才是資本，因為他們產生出新的貨幣來。貨幣對於教會和俗界

的顯貴都是必要的。我們以前曾引用了遜巴特所說伯爵和僧院長如果沒有商業，便沒有處分過剩的乳酪餅和穀物的辦法這種指示。此外，我們不得不補充一句：這些貴人們已經不能滿足穀物和乳酪餅似的「低賤」食物了。優美的食物、高貴的衣服等等，對於他們是必要的了。——而所有這一切都能用貨幣去買。貨幣對於「平民」也是必要的，因為他們必須用貨幣去交納租稅和其他的貢獻。假如他沒有身分的自由，便可以用貨幣去買自由，假如用貨幣也可以買到各種的稱號位階和官職。需要最多貨幣的是王權，即爲了養活宮臣、官僚和軍隊及爲實行戰爭起見，先決的條件是金錢。

所以貨幣對於整個經濟政策，開始作爲物神而發揮其威勢，努力使用一切手段使國內的貨幣增大起來，因爲公認只有這，才是使臣民和國王的致富之道。國王權力和商業——貨幣布爾喬亞的同盟，當然是不妨害兩者利害之背馳的。在這裏，我們不能深入的論究這個問題，而只止於指摘貨幣流通方面的一個契機，國王發現了用偽造貨幣的方法可以取得相當收入的秘訣。不消說，這和布爾喬亞的利害是對立的，布爾喬亞則從流通界中提出分量十足的鑄貨，而把分量不足的偽造貨幣剩留在流通界，以爲答覆。①

① 商學界對於鑄貨損傷的反應，在「Gresham的法則」名義之下，盡人皆知的即用法則的形式表式化了的「劣貨逐逐良貨」。

## 作為經濟政策之特殊體系的重商主義

重商主義這句話，有時被理解為經濟政策的特殊體系，有時被理解為經濟學之見解的特殊體系，即被理解為特殊的學說。首先，我們簡單的考察一下作為特殊的經濟政策的重商主義。作為實踐的重商主義，說起來是先於作為理論的重商主義的「開步走」，而這開步走，是被商業資本時代經濟發展的整個進行所惹起的。

閻鳩爾寫道：「在理查二世 (Richard) 統治時代（一三七七——一四〇五年）國王諮詢倫敦市應使用如何手段，以防止英國福祉的破滅？在對此問題的解答中，包含着某種見解的本質，這種見解直到其後由和牠對立的別種見解所代替為止，在英國全部經濟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即解答說：「吾人從外國人購買而外，必須把很多的東西販賣給外國人。」英國初期立法的一切特性，都基於這個原則。它是追求着兩重目的的，首先是儘可能的從外國吸收多量的鑄貨，其次，把它保留在國內，再盡全力去防止其消失。」●

● 閻鳩爾英國自由貿易第一分冊，一八七六年，五頁。



我們不能認為理查二世和倫敦的商人們有什麼理論，或什麼透徹的原理。倫敦的商人們，在對國王的答書中，只表白了一切人，其中尤以商界中人所感覺到的需要。即貨幣的需要，而立法也并不由商人們的答書中所公式化了的原理出發，而是從上述貨幣的需要出發的。重商主義的實踐，在理論上被闡明；重商主義的理論開始出現還是後來的事。誠然，立法亘數世紀以來，一直是向着重商主義的方向發展了的，從這裏便發生諸如此類的幻想：一種什麼理論恰好為立法所實現或實施的幻想。但是，這種現象，要用所謂經濟的發展自身是向着一定的方向去運行這件事來說明——經濟政策的方向一定了的原故，實基於此。

如果說經濟學無論在什麼場合都不先於經濟政策而存在，那是不對的吧。也有這種情形，即最初，理論家從經濟發展的趨勢上出發，作成科學的理論，然後在實生活上把它實現。可是現在，我們說的只是重商主義，而在重商主義的場合，如事實所告訴我們的，經濟政策却先存於經濟學。

### 所謂重商主義的實踐是什麼？

初期的重商主義和發展了的重商主義，是有區別的。兩者對於貨幣都曾與以決定的意義。這一點上沒有改變，但是，第一、在貨幣的取得和保有的方法方式上，兩者便分歧了；第二、對於貨幣，在發展

了的重商主義上却不見有像在初期重商主義上所看到那樣的——說什麼好呢——直接的素樸的態度。「金銀雖不是貨幣，但貨幣在其本性上却是金銀。」（卡爾）商品流通正在發展着的國家，不得不握有貴金屬，其數量必須隨商品流通的發展而增大。信用的發達還貧弱，交易的大部分用現金實行。

但是應該注意，信用並不是廢棄貨幣的，不過是使必要的貨幣量某種程度的減少而已。所以，把貴金屬吸收到國內而保有之，成爲政府日常的顧慮之一。

在商品交換的發展方興未艾的國家，最初，只以經濟的手段吸收必要的金銀量，而不能把它保存在國內。行政的各種方策，伸長了援助的手。在初期重商主義時代的英國所施行了的行政方策，大抵屬於下列二項：（一）對於英國商人的統制，（二）對於外國商人的統制。僑外的英國商人，只能在被稱爲所謂「商品貯藏所」的特定場所實行交易。「英國商人——閻鳩爾報告——把通常的商品（羊毛、皮革、錫、鐵刀板、魚類等）搬進這些商品貯藏所，而從外國人方面則換取必要的生產物（大抵是製造品）……從這種交易中吸取利益，且爲統制交易起見，設立由市長、城主、倉庫組合等合組而成的特別團體，其目的在完成兩種任務：即（一）監督當羊毛輸出時被賦課的關稅，是否被正當的徵收了；（二）檢查當各個販賣時所支付的貨幣，是否係指定爲輸入英國用的外國貨幣

或金屬貨幣。」●

把貴金屬吸收到國內來的任務是這樣的被解決了。而國王的官吏們，除完成「全國民的」任務——貨幣吸收到國內——之外，還不忘却自己直接的主人的利益。貨幣不僅在商品流通上是必要的，即對於國庫，也是必要的。（順便乘此機會，解釋一個或不可避免的疑念吧，這個疑念是：爲什麼應支付的貨幣的一部分，必須是外國的鑄貨呢？這樣的要求和「國民感情」不是不相容嗎？但是，此問題的解決，並不困難，因爲當時英國鑄貨的大部分，分量已經不足，把牠反輸入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對在英國國內進行交易的外國商人統制，是用更複雜的方法施行的。「懷着本國的貨幣來到英國的外國人，不得不取迅速的趕赴造幣廠或兌換處，在那裏把自己所有的外國貨幣兌換，只能給他的英國貨幣，倘使後來發覺他仍有外國貨幣而把它隱藏起來，則這些貨幣便被沒收於國庫，他自身還得受嚴重的處罰。」●

這個方策的意義是不待言而自明的，即是說外國人提供其所有的分量十足的鑄貨，換取分量

●圖博爾，上述書六頁。

●圖博爾，上述書九頁。

不是的鑄貨，因為他所有的鑄貨也是分量不足的事態，便沒有變化；爲什麼呢？因爲外國的鑄貨在重量上被接受了去，反之，外國人則接受了，只能給他的那點英國鑄貨的緣故。換句話說，不得不以英國分量不足的鑄貨代替分量十足的鑄貨而接受下來，不僅是本國的臣民，外國人也是如此的，因爲兩方面都不是以貨幣的分量爲基礎，而是必須以其公定的價格爲基礎的緣故。

關於貨幣爲國王們所改造，閻鳩爾所給的說明是特徵的。他說：「若照當時的見地爲了貨幣一個價格，只需國王指定一下就行了，牠的被決定是和貨幣內的金屬價格沒有關係的。在中世紀，由執政者自身那樣普遍施行的鑄貨改造，即由來於此。」●當然，鑄貨的改造，并不是由來於「此」的。它之所以被施行正如我們所已經知道的，因爲它實際的提供給國王們一種利益（而且在貨幣形態上）如我們已經知道，給他們任何事情上都少不了的貨幣形態上的利益。爲了把這種不正當的手段正當化，而獨占之起見（普通的人僞造貨幣時，是有殺頭之罪的），便產生了閻鳩爾的所謂「當時的見解」。

且回到本題吧。這樣的一種對策有籌畫的必要了，即對於外國商人不許他們以其財貨的販賣而得到的貨幣搬出英國境外的對策；因此，頒布了兩種法律，即所謂消費法和偵探法，如就前者說，外

國人必須把他在英國得到的全部金錢消費在英國商品的購入上。監督這件事的責任，是由第二種法律，課之於「監視人」或「偵探」。新來的「客人」，一定得先去見一見「監視人」，然後監視人便形影不離的跟着他，把這外國商人的交易，詳細的記錄下來，必須監視着他別把貨幣搬出國外。

這是英國資本主義幼年時代的情形。但是在這裏，如豪放的誇耀着現代「文化和文明」的布爾喬亞學者們，在敘述當時的狀態時好像喜歡說的那些「素樸的幼稚」或愚拙的幼稚之類的话一句也沒有。只做了可能做的事，而且是資本主義幼年時代必要的事。

和這種狀態相對應的是初期重商主義。發展了的重商主義，是指既經起因是更發展了的經濟的經濟政策之較高度的水準而言。在這個時代，商業顯著的成長起來，工場制的手工業出現了，信用正在發展着。所謂「原始的蓄積」時代開始了，作為「學生子」的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在廣大的範圍裏恣意猖獗。用舊來那樣的方法是不能統制或規制牠的了，而且也沒有必要了。對於金銀的追求，較前更為劇烈，但對於這追求的態度，則和從前不同。作為資本之貨幣的機能，已經在完全的姿態上開始發現了，然而因為貨幣這東西，只能在運動上纔得變為資本的，所以過於壓迫它，決非得策。舊來所謂多賣少買的格言，也已經不適於新的諸條件了。

對於生產的態度也改變了。在從前比較小規模的商業，用小規模的生產就足夠充分了。可是在

已經達到了大規模的商業，小規模生產已經不夠作為它的基礎。於是強行大規模生產，發生了樹立工場制手工業的必要。伴隨着大生產，也發生了規制勞動問題的必要性。使勞動者更多勞動，而對於自己的勞動，則務使不要求得過多，這些任務是係於當時已經大大鞏固化了了的王權。

重商主義不採取商業政策的姿態，而似乎採取了產業政策的姿態。事實上，許多的研究家，直接把重商主義作為產業政策來處理着。前面引用了的波格達諾夫和斯退帕諾夫共著的講義中有如下的一節：

「作為產業政策之體系的重商主義，已經在中世紀時代就發生了；可以看做它的發生之故鄉的，是十四世紀的英國；在那裏，雖然開始國民的統一比什麼地方都早，但長久期內，英國在世界商業上却居於被動的地位，成為意大利和漢撒商人們無情的榨取對象。」<sup>(1)</sup>

又說：

「重商主義的產業政策方面，對於它的商業政策方面至於顯示出還更為優越者，這是在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前半世紀的法國（亨利四世和考伯特——Colbert 時代），十七世紀後半世紀的普魯士（腓特烈——「大選舉候」威廉——的時代），和十八世紀初頭的俄國（彼得一世的時代）。重商主義基本的諸傾向，任何地方都是一樣的。」<sup>(2)</sup>

● 波格達諾夫及斯退帕諾夫：經濟學講義第二卷第一分冊，一九二〇年刊，一六六、一六七頁。

● 同上，一六七頁。

對於由亞丹·斯密所引用的「重商主義」這個名稱自身，也有反對的人。亞丹·斯密說：「在相異的各國中，相異的時代之物質狀態發展的不同，關於國民致富的手段，產生了兩種對立的經濟學體系，一種叫做重商主義，另一種可以叫做重農主義。」<sup>①</sup>

腓特烈·李士特 (Friedrich List) 對此加以反駁，而翁肯 (Orken) 也完全同意於這種反駁。「如果根據李士特的正當評論，則所謂重商主義體系，能以比亞丹·斯密自身的體系更大的權利名之曰產業主義的體系。」<sup>②</sup>而他這樣的展開着他的思想：

「在法蘭西，重商主義在工場制的手工業上，看出它主要的表現來；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則在殖民政策上看出來；在英國，這個運動，更進一步而把農業也包含於其範圍之內。問題在農業的重商主義也存在着這一點上。」<sup>③</sup>

當然，正確的是亞丹·斯密，追蹤為新時代之保護貿易論者的腓特烈·李士特和翁肯等之足跡的，是波格達諾夫和斯退帕諾夫。

① 亞丹·斯密：關於番國民之財富的性質與諸原因第四篇。

② 翁肯：亞丹·斯密以前的經濟學史，一九〇八年，一五三頁。

③ 同上，二〇二頁。

「**工業主義**」政策，是一貫的重商主義的，爲什麼呢？因爲對於由工場制手工業的樹立顯示出來的產業所費的心思和當時的勞動立法，一切都不外是由重商主義的精神去貫徹的。最能確證這種事情的事實，便是當時被獎勵被統制了的生產諸部門，實在是以輸出爲目的的活動諸部門，即作爲一方面爲獲得外國市場，另一方面爲吸收貨幣到國內的手段而使用的諸部門。勞動立法——主要的在勞動時間的延長和低工資的固定化——的目的，也還是一樣的，即人人想望以廉價的勞動使「國民的」產業在外國市場上發揮最大的競爭力。

「我們已經（在本章的開頭）說過：如果  $G—W—G'$  是初期重商主義的特徵，則  $G—W—P—W'$ ，—— $G'$  就是發展了的重商主義的特徵。生產已不能被輕視了。而且即令如此，生產依然被看作是發展流通的必然條件，認流通爲財富的源泉。」

卡爾關於貨幣資本的循環，即以  $G—W—P—W'$ ，—— $G'$  爲特徵的貨幣資本的循環，這樣寫道：「生產過程這東西，僅僅作爲貨殖上必然的憎惡，必然的媒介物而被表現出來。」<sup>①</sup>但是，祇要把生產看作「貨殖上不可避免的手段」，則它（生產）便不應止於視野之外，在這裏無論如何

① 卡爾資本論第二卷，重商主義者們的這種見地，在後世以貨幣資本的運動爲立論之基礎的經濟學者們看來也是特徵的。



要努力去把它合理化。「合理化」其中就要到歸到使勞動廉價，而這個努力已如上述，被表現在勞動時間的延長和工資的低下。

當作促成勞動立法的外部刺激而使用的，是在十六世紀前半世紀黑死病的流行。那黑死病奪去了不在少處的勞動人口，結果，惹起了勞動力的不足。

### 卡爾說：

「與一三四九年制定之最初的「勞動者條例」(愛德華三世——Edward III——時代第二十二年)以直接口實的(是口實而非原因，因為在這種口實消失之後，這種立法還存續了數世紀之久)是當時流行的大黑死病……：在這裏，相當的工資和勞動時間的限制，變成用法律來強制規定。勞動時間的限制……：更在一四九六年(亨利七世治下)的法令上，也被規定起來。」

### 卡爾又說：

「和近代的工廠法強制的縮短工作時間相反，這些法令毋寧要強制的延長工作時間。資本尚在開始漸漸發育的萌芽狀態，尚未到單靠經濟上的強制力便足保證其充分的剩餘價值的吸收權的程度，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便有求助於國家權力的必要，然而這種狀態之下的資本的要求，和同一資本到了成年期不得不讓步的各種條件比起來，可以看出實際上

是極其簡單的。」

「重商主義是商業資本的經濟政策；商業資本的歷史任務是在替產業資本清道，替它奠定無限制支配的基礎。重商資本的使命終了時，重商主義便從助長經濟發展的要因，一變而為經濟發展的鎖鍊。從這時起，在政策及理論的兩方面，都開始發出反對重商主義的呼聲。」

### 作為理論的見解之體系的重商主義

許多研究者們，只看見重商主義之中，帶有經濟政策性質的各種方策的體系。下面列舉關於重商主義的若干定義。

翁肯說：

「在這裏，成爲問題的幾個體系的所有共同點是，它們都直接以實踐爲目的。它們是經濟政策的體系，並非理論經濟學的體系；企圖究明理論經濟學的嘗試有是有的，但是假如除開這樣的企圖來考察時，則縱然在研討國民經濟學上的諸問題時，那些體系，也還是帶有經濟政策的性質。」

● 翁肯：亞丹·斯密以前的經濟學史一三二頁。

標特爾·馬斯洛夫說：

「保護以生產輸出品爲目的的產業部門，進而由那人爲的支持和貿易收領賬單之人爲的保持——這種政策的體系，名叫重商主義。」

諸如此類的一部分著者們，使重商主義只和經濟政策發生關係，把它從經濟學上除開；其他的著者們——這是大部分——說起經濟學來，大都看不見理論方面和實際方面之間的差異。實際上，重商主義如上所述，是由國家權力所實現了的實際的各種方策的體系，同時，也是理論的。

我們已經從資本論中引用了下面的一些話，即卡爾說：

「近代的生產方式之最初理論的處理——重商主義的體系——必然的從作爲商業資本的運動而被獨立化了的流通過程上表面的諸現象出發，因而那不過是只把握了現象的外表而已。這一則是因爲商業資本還東西，是資本一般最初自由存在方式的緣故；再則是因爲當封建生產最初的變革期，當近代生產的成立期，它具有莫大的勢力的緣故。關於近代經濟之現實的科學，自理論的考察從流通過程轉移到出產過程時，才被開始。」

卡爾把重商主義體系稱作近代生產方式之最初的理論的處理；但同時，他又宣稱：「現實的科

●馬斯洛夫：國民經濟史講義第六版，一九二五年，一三二頁。

●卡爾：資本論第三卷。

學，自理論的攷察從流通過程轉移到生產過程時，才被開始。」<sup>①</sup>

科學始於闡明現象之本質的任務已被提起已被實現了的時候。但是只站在流通的研究基礎上是不能闡明現象的本質的，在重商主義者們看來，研究的對象，是照出現於表面上那樣姿態的現象。

重商主義者們的研究對象是流通，方法是所觀察在諸現象的記述，一部分是它的分類，它的任務在狹隘的實際。而研究的結果則在一貫的經驗的合法則性的表式化。

商業資本的時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前史」，同樣，商業主義的體系，是經濟學的「前史」。經濟學第一是自研究從流通部門轉移到生產部門的時候起，第二是自為其基礎的勞動價值論被開始樹立的時候起，才成為科學。把研究從流通部門轉移到生產部門的，是重農主義者。開勞動價值論之端緒的，是威廉·培蒂 (William Petty) (重商主義解體期的經濟學者)。

重商主義者作為商業資本的理論家，最初首先從這資本的運動形態  $G—W—G$  出發。他們認為資本的流通過程只是由流通的兩個階段  $G—W$  及  $W—G$  形成的循環。於是他們便把

① 翁青不理解非科學的理論也能存在，說：「重商主義是實踐上的體系，而非經濟學之理論的或科學的體系。」(上述書一六三頁) 重商主義雖不是科學的體系，但這不是說牠也不是為理論所決定的教說。

流通看作利潤的源泉，而且是一般財富的源泉，從這裏也產生了他們如下的見解，即所謂財富者就是貨幣的「集積」。實際上在商人們看來，商品販賣，也不過是為增大自己的貨幣資本，為把G轉化為G'的手段而已。商人把較少數額的貨幣投入流通之內，從那裏面取出較多數額的貨幣。

但是商業資本漸次的開始支配生產。商人開始統制落在自己支配之下的小商品生產者們——家庭手工業者。資本主義的家庭工業，也就出現。經濟學是不能忽視生產過程的。後期的重商主義者們便代替初期的重商主義者們而登場（卡爾名初期重商主義者的體系為重金主義的體系，把後期重商主義者的體系則名為本來意味的重商主義的體系。）只不過在G—W—G'的形態上的資本循環，已經不符合現實。商人不始終只買賣既成的物品，他也收買原料，以之供給依存於他的小商品生產者們，他也常常供給他們以勞動工具。從而他的資本循環，已開始取G—W……P……W'……G'的形態。實際上，後期重商主義者們換句話說，本來的意味的重商主義體系的代表者，是已經從資本的此種運動形態出發的。

資本的循環說起來成為更為發展了的（牠已經不始終只停止在流通的階段上），雖然如此，但生產仍然被認為什麼次位的，這是一。第二，資本的整個循環的，確仍然用所謂完全貨幣的黃金色彩粉飾着。它的起迄都是貨幣，資本的全部運動，完全表現為貨幣的自己增殖過程。

重商主義者們從貨幣資本循環的一面性出發，尤其這一面性，是由商業資本的支配這個現實本身所惹起的。及至商業資本到達從屬於產業，生產資本的循環似乎纔開始被置諸注意的焦點上。卡爾把貨幣資本的循環和生產資本的循環二者間相互的關係這樣的表式化着：「資本價值的貨幣形態在貨幣資本循環的第一形態之下而有的獨立性的外觀，在這第二形態之下消滅了；所以這第二形態是作為第一形態之批判的，不過把它作為特殊的一形態而已。」●

產業資本的循環，是資本循環之三個形態——貨幣形態，生產形態，商品形態——的統一。這些形態，相互的「批判着」，而它們各以其他的形態為「不過特殊的一形態」而已。貨幣資本的循環，片面的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即在產生貨幣的貨幣形態上，——附與着一個特徵。全部過程作為貨幣的自己「活動」，作為貨幣的自己增殖而表現着；生產不過是必然的條件而已。

反之，生產資本的循環使貨幣回歸到流通工具或支付工具上，即回歸到為媒介並維持生產不斷的更新之必要手段這方面去。於是此次恰如全問題在生產一般（作為社會的生存條件的）中，而並非在價值的自己增殖中一樣的得到片面性。因此，如果生產資本的循環「批判」着貨幣資本的循環，則在同一程度上，貨幣資本的循環「批判」生產資本的循環。兩者都作為同一產業資本的

兩個形態而相互否定，相互爲前提。關於商品資本的循環也可以這樣說。在循環的這種形態上貨幣的運動和不斷的生產，不過作爲商品量的運動上必然的契機而表現出來罷了。

生產資本的循環之所以把貨幣資本的循環作爲「不過是特殊的一形態」的，只在產業資本的支配之下。在商業資本的支配之下，只有貨幣資本的循環才是資本唯一的運動形態。

準備了產業資本的到來之後，商業資本便失掉資本的主要機能，轉化爲「產業資本的代理人」了。「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部——換句話說，資本一旦把握生產自身，附與它一個完全變化了的特殊形態之後，商人資本便馬上只作爲特殊的一種機能上的資本而出現。在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切生產方式下，而生產愈是直接的爲生產者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則商人資本便作爲資本的最主要機能而出現。」<sup>①</sup>

又說：「在資本主義生產之內部，商人資本從以前獨立的存在被降低到爲投資一般之特殊的一個契機的位置之後，它的利潤率爲利潤率的均等化而使歸到一般的平均。於是商人資本便只作爲生產資本之代表而顯現其機能。」<sup>②</sup>

① 卡爾資本論第三卷。

② 同上。

不過是資本運動之特殊形態的貨幣資本的循環，正因為這種特殊性的原故，已如上述雖然是最一面的，但却最明白的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變成具有特徵的形態。第一，只有資本循環的這種形態，最明白的曝露出獲得利潤的這個資本主義生產的動機；第二，牠指示出貨幣不單是流通工具。這件事——還是極素樸的，在粗野的形態上——早被重商主義者們敘述過了，而且這件事是使重商主義的體系屬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最初的理論的考究出來的產物。

重商主義在幾個世紀以來，從而在各樣歷史的以及民族的領土之各種條件之下發展了。翁肯以此為根據，認為各種重商主義體系是存在過的。但是他却忽視了重商主義常常是商業布爾喬亞階級的階級利害的表現，它有單一的階級的基礎這兩件事。同時，重商主義有立腳於貨幣資本之循環的單一的方法論的基礎。

在  $G—W—G'$  上，不甚至於在  $G—W……P……W'—G'$  上，（一）貨幣作為資本而出現，並不只作為資本的貨幣形態；（二）流通是以支配生產的姿態而出現的，並非生產支配流通；（三）利潤率是作為推銷和買賣的結果而出現；（四）利潤不是別的，而是作為貨幣的超過分而出現的。從這裏產生出了在重商主義者的體系上所見到的把貨幣和資本以及財富的視為一體，換句話說，把形式和內容的視為一體，把流通過程和生產的視為一體。



亞丹·斯密以後，在把貨幣和財富視爲一體的這一點上嘲笑重商主義者的人開始出現了，但是批判重商主義者的人本身却不理解這視爲一體之客觀的根據，他們雖然知道這視爲一體是極片面的；但他們却不理解給予極尖銳的布爾喬亞的生產方式以特徵的，貨幣資本之循環的所謂理論的反映。因爲不理解這一點，所以重商主義的批判家們只是過於單純的只就文字上去考察重商主義的把貨幣和財富的視爲一體。雖然如此，雖然重商主義的理論家並沒有誰主張：例如金錢可以代之以穀物衣履等，這是一。第二，如果說重商主義者過大的估計了貨幣的意義，那末他的論敵就是過小的估計了貨幣，使它回歸到單純的流通工具。這種過小估量的結果，遂忽視了作爲資本運動形態之一的貨幣資本的循環。

「重商主義者重視表現價值之質的方面，從而他也就特別把重心放在於貨幣上有其完全成了的姿態的商品的等價形態上。」●生產商品，在他們看來就是生產貨幣。在爲使貨幣雖是暫時的，但不只是單純的流通工具起見，少買多賣是必要的。而初期重商主義者的思想發展到貨幣均衡的理論，所謂重金主義體系，後期重商主義的思想則向貿易均衡的理論，本來意義上的重商主義體系發展。

貨幣均衡的理論和貿易均衡的理論——兩者是重商主義發展的兩個階段，這兩個階段又反映着商業及商業政策發展的兩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上，要求着作為貨幣抑制方策的貨幣輸出的禁止；在第二個階段上，要求對外貿易的發展，所謂對外貿易是從付出較少貨幣收入較多貨幣的觀點上出發的。在第一個階段上，還未存有對於經濟力自身的信賴，決定的意義尚在行政的各種方策上；在第二個階段上，對於經濟力自身的信賴，對其內部論理的信賴開始支配了人們。但雖說是後期重商主義者——發展了的重商主義的代表者——也還離商業的完全自由和經濟力的完全解放的思想很遠。

商業資本的歷史使命——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創造各項條件——已如上述，沒有國家權力的積極援助，沒有商業和產業雙方的特定政策，便不能完成。於是在重商主義的理論家看來，國家權力的援助甚至國家對於經濟生活的監護，被認為自明的真理。在初期重商主義者和後期重商主義者之間，不過在理解這干涉的具體形態的方法上，即關於使之成為最合目的的方法上，意見不同而已。

當結束本章之際，把幾個值得記憶的重商主義者代表們的思想作一概觀如下。

## 重商主義者的文獻

且看兩種著作吧——其一，應該視爲初期重商主義的總決算的，另一種是和已經發展了的重商主義有關係的。

威廉·斯塔佛德 (William Stafford) (1554——1612年) 1581年在倫敦刊行了題名爲「關於現今行於吾國各方面之不平的簡單調查」的一本書，在這本書裏，有略寫字 S W 的署名，全書是以對話體的敘述寫成的，社會上各階層的代表們都參加了這種對話。裏面有騎士、商人、手工業者、農民、神學者，其中以神學者爲中心人物，他所說的，代表着著者的意見，就是說那是本書的根本思想。

關於這本書，卡爾說：「這本書因爲是用問答體寫的，所以世人很久以來都相信這是莎士比亞的手筆，到一七五一年還在他的名下被刊行着，這本書的真正的著者，是威廉·斯塔佛德。」

斯塔佛德的著作，是一方面正當英國早在十五世紀便開始了的農業革命方酣的時候，另一方面，在貴金屬從新發見的各國，特別是從美洲大量的流入歐洲來的時代出現的。還有必須附帶說一

●卡爾：資本論第一卷及至現今，關於斯塔佛德是否真正的著者又發生了異議，世人以爲約翰·海爾斯才是真正的著者。

說的事，就是當時國王們的改造貨幣是被大規模的施行了的。農業革命表現在農民由喪失土地栽培五穀而移向牧羊業方面去。其最近的原因是羊毛貿易的發展和羊毛價格的騰貴，而且貴金屬的流入和鑄貨之大量改造的結果，一切商品的價格都騰貴起來，遂惹起全般的物價騰貴。牠并且喚起了所謂勞動力的騰貴，名義勞動工資 (Nominal wage) 也昂貴起來。

本書的登場人物們，各各陳述不平，關於一般的窮困的原因則相互彼此責難。騎士說：「為我的隣人而作農夫的你，為雜貨商的你，為鍛冶銅匠及其他手工業者的你——你們真能擁護你們自身的利益。為什麼呢？因為目前一切物品比從前騰貴，而你們販賣的物品和勞動也都騰貴了這些些，是我們沒有什麼可以販賣的，只是購買高價的物品，所以沒有法子販賣高價物品來補償損失。」反之，農夫首先對於地主把耕地變為所謂「圍柵」即變為牧羊地而大為不平。他說：「這些圍柵成為一般零落的原因，為什麼呢？因為它使我們不得不對佃田支付較高的佃租而妨礙其開墾。這些羊，正是我們一切不幸的原因；為了羊的緣故，從來供給各種生產物的許多的農家破滅下去了；如今，打開眼睛一看，則遍地都是羊羣。」商人和手工業者，則把一切的責任都轉嫁於促使勞動價格騰貴了的勞動者們。神學者處於各階層的「上位」。他恰似布爾喬亞的理論家一般，說教着「超階級的真理」，他的所謂真理，總之不外乎初期重商主義的見解。誠然，在斯塔佛德，也可以看出已經脫出所謂

重金主義的體系範圍之外的思想。他已經論述祖國的加工產業有保護的必要。但是他所關心的，無論如何主要的也還是在於把貨幣保存於國內，使得他痛心憂慮的，是從把貨幣從國內搬出。直到理解貿易均衡的思想為止，他却尚未前進一步。和這件事有關的，他也曾對分量不足的鑄貨之出現抗議，因為它把分量十足的鑄貨驅出流通界而逃出國外的緣故。

如上所述，斯塔佛德關於貨幣的價值和商品的價值二者之間的聯繫，在當時指示出值得注目的理解。他認為分量不足的鑄貨之出現，國王的改造鑄貨，這兩件事是商品價格騰貴的原因。鑄貨的改造，必然伴隨着兩種結果：（一）物價騰貴，（二）分量十足的鑄貨流出國外。

斯塔佛德的保護貿易思想，在下列一節中特別顯著的表現出來。「有時我問書籍文具販賣商，為什麼在我們國內不像在海外一樣製造白色和灰色筆用的紙呢？對於這個問題我所得到的解答是這樣：『不久以前有人創辦了製紙事業，可是不久就把工場關了；所以然者，因為知道不能夠像如今外國那麼便宜的製造……但是我却相信——書籍文具販賣業商又說——倘使對外國紙的

●閻鳩爾：英國的自由貿易第一分冊，第四〇頁。農民雖有種種的不平，可是當時很變化了自己的地位。（參照資本論上述諸點。）蓋當時是資本主義的佃租，農業者被逐出來的時代。勞動者之聲，在本書中還聽不到，勞動者尚被忽視着，因為他們還未形成爲其自身的階級。

輸入加以禁止，或者課以比今日更高的關稅，則我國立刻便能製造比外國還要賤的紙。」<sup>①</sup>

好似一條綫索貫串着全書的，是這樣的思想：即外國的商品輸入，其中縱令是比較高價製造的，也有害於在國內生產的物品的輸入，蓋因商品的輸入——這是他的根本思想——即伴隨着貨幣輸出的緣故。在國內和外國交易的結果所得到的一切，是永久離開吾人之手而去；反之，我們英國人相互取得的，一切都保留在國內。<sup>②</sup>

斯塔佛德反對從英國輸出羊毛，而由這些羊毛所製造的製造品輸入到英國來；他要求這羊毛要在英國本國的內部去加工製成呢絨，他以洋呢工業的發展將給予不小的一部分人以工作為上述要求的一個理由，但是根本的理由却不在此；當羊毛輸出國外，而由外國輸入製造品的時候，外國人由於廉價羊毛的購入而輸入到英國的，勿寧是由高價的洋呢的販賣從英國輸出較多的貨幣。

湯麥士·曼 (Thomas Man) (一五七一——一六四一年) 在一六六四年，湯麥士·曼的名，「英國在外國貿易中的寶庫或外國貿易的均衡的著作被刊行了。湯麥士·曼是一個大商人，東印度公司的董事之一而且被認為貿易均衡理論的創始者，即發展了的重商主義的代表者。

① 開鳩爾：英國的自由貿易第一分冊，第四四頁。

② 同上。

曼氏并不反對貨幣的輸出，勿寧說他要求撤廢貨幣輸出的禁令。然而他倒是能動的對外貿易，換句話說，輸出多於輸入之類貿易的提倡者。他說：「通常使我國財富和財庫增大的手段是對外貿易。但當此貿易之時，我們必須經常遵守下述的規程：就是說我們每年賣給外國人的我國商品，其金額要超過我們使用他們的商品的全額之上。」又說：「因此，現在假定我國有過剩的呢絨、錫、鉛、鐵以及其他地方的產物，而每年只把這些過剩產品向各外國要輸出二百二十萬鎊，於是我們就有可能在海外購買我們所必要的外國商品，其數額作為二百萬鎊吧！這時我國比其他各國每年就富餘二十萬鎊。而這二十萬鎊可以只在貨幣的形態載回故國。」●

湯麥士·曼也把國富和貨幣看作一體。他之尊重能動的對外貿易，就是根據「我國比其他各國要富餘二十萬鎊，而這二十萬鎊可以只用貨幣的形態載回故國」的這個理由。但在他已經表現了極廣大的見地，牠是代表了大商業資本的利益，其中代表了當時在英國貿易的發達上演了重大作用的東印度公司的利益。這個公司含有應把多數的貨幣額向印度輸出的任務，反之則把多數的貨幣額從印度輸入英國。說到東印度公司，曼氏寫道：「構成英國最有利的貿易的，是對東印度的貿易。英國人由於販賣從印度商品中得到比印度人自己更多的利益。」對印度的貿易是經手販

●開闢英國的自由貿易第一分冊，第七六頁。

賣的貿易。換句話說，在印度所買的商品，更在其他諸國中賣出去。英國人在這買方（大概英國人在印度不是普通的買者，更作為殖民地政策的實行者，能極廉價的買入商品）賣方的兩重資格上「大得其利」，因為印度商品的交易被英國獨占了。

曼氏理解貨幣的意義并不在於把貨幣貯藏起來，而在於把牠投入賦予貨幣以「生殖力」的流通界。他說：「貨幣造出商業，商業使貨幣增加，因此貨幣之被投入流通界的量越大，越好。」曼氏在證明有把貨幣投入流通界的必要時，把商業和播種子相比較，就是說：「我們只要在播種時看看農夫的行動，即只要看他把優秀的種子那麼多量的投入地中時，我們與其以為他是堂皇的主人，勿寧要說他是瘋子吧。可是到了秋天看到他的勞動的果實時，看到他的努力的成果時，就知道他的勞動受到了豐富的報酬了。」

曼氏是拘束輸出貿易之類的一切方策的反對者。他甚至要求減低輸出商品的關稅，和擁護高物價的初期重商主義相反；他是低物價的支持者，因為低物價可以刺激外國市場上的競爭。曼氏并且反對貨幣的改造，「為什麼呢？因為鎊，先令，便士這些名稱不是可尊重的，鑄貨內在的價值纔是可

● 同上。

● 同上，七八頁。



尊重的」當時曼氏返復着我們曾經知道的斯塔佛德的命題，他說：貨幣價值的低落要惹起商品價格的騰貴。

曼氏要求國內產業的發展，而和斯塔佛德一樣，要求以製造品的輸出代替原料品的輸出。他又論證造船業發展的重要性，英國人有用英國船輸出一切商品的必要。但曼氏把這一切的問題都用商人的尺度來處理。其中，在他關於經手販賣貿易的考察中，這種情形特別明顯的表現出來，即他把經手販賣貿易認為最有利者，那是因為在發音的金銀貨的形態使商人獲得最大的利潤。說起來，曼氏的著作和斯塔佛德的著作比較起來，顯然又前進了一步。兩者雖都是重商主義者，但在商業資本的指導權之下，是站在英國經濟發展不同的階段上的。斯塔佛德盡全力證明保留貨幣於國內的必要，反之，曼氏（特別爲了經手販賣貿易的發展）則證明了有把貨幣輸出國外的必要。爲了要輸入更多的貨幣而輸出貨幣，是英國在外國貿易的寶庫的著者的信條。

他關於貿易均衡及匯兌行市的理論，也是立脚於這個信條上的，這個理論的目標，在於證明人爲的保留貨幣於國內是無益的，不，甚至是有害的。他說：「和外國人貿易必須作成規準者，在我國輸

●經手販賣貿易的發展，并不以國家產業的發展爲前提。——販賣貿易以其他各國的生產爲支柱，商人是生產國和消費國的媒介。

出商品的價格凌駕輸入我國商品的價格時，則行市低，反之，則行市高。」又說：「貿易的均衡依輸入輸出富的大小，而發生於我有利或於人有利的變化，而所有這一切是必然要發生的，不能加外力而改變的。要使貨幣向國內流入強化的其他一切方法和努力，只能收暫時的效果。結局不僅徒勞，甚至反而有害。那正像有時要突然的沖去兩岸的急流，突因水量不足，只得一任牠乾涸的河床似的。」●

發展了的重商主義的代表者，對於初期重商主義的各種方策，例如：以前我們所說的「消費法」和「商品貯藏所」等等，下了這樣的判決。

● 蘭姆爾：英國的自由貿易第一分冊，第八二頁。

### 第三章 重商主義的解體和古典學派的成立

——近代經濟學的始祖威廉·培蒂——

(William Petty) (1613—1687)

在前章我們已經考察了前期重商主義和重商主義的發展。現在我們要考察重商主義的沒落，同時就是古典學派的成立。

x

x

x

x

布爾喬亞經濟學家，把威廉·培蒂的意義過小的評價着，或甚至全然忽視着。例如翁肯斷然宣言道：「但在現今，政治的算術（培蒂名其著作之一為「政治的算術」——洛森堡）本質上是統計學，誰都知道並不是正確意義的經濟學。」

對於培蒂的這種評價並不足驚奇，因為背離了勞動價值說的布爾喬亞經濟學者們，將不會給這個學說創始者以正確的特徵的話。雖這樣說，但把培蒂經濟學者的名簿中完全抹煞去也是不行的，因此，翁肯也不得不這樣的聲明：「培蒂可以被看作所謂客觀學派（這是什麼話！——洛森堡）或費用學派的先驅者。」<sup>①</sup>

不消說，卡爾所謂「近代經濟學的始祖，是最天才的最獨創的經濟研究家之一的威廉·培蒂」的這個論斷是正確的。因而我們就要探究其所以然。但在這探究中首先要考察一下達勞動價值論成立以前的社會經濟的基礎。

### 勞動價值論成立的社會——經濟基礎

在前章我們曾經敘述過：商業資本替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準備了許多的前提，而最初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本身也是在商業資本的旗幟和指導之下發展起來的。從只生活在流通部門的純粹

① 翁肯：亞丹·斯密以前的經濟學史。

② 全上，四三六頁。順便說一聲，這位著者，是把「勞動價值說」稱做「費用說」的。

③ 卡爾：剩餘價值學說史。

商人直到產業資本主義，其中是存在着許多階段。關於離開商人資本之下的流通生產的獨立化，卡爾說：「生產諸部門爲第三因子所相互結合的流通過程的這種獨立化，表現着二重的情形：一方面，流通尚未至把握生產而和作爲所提供的前提的生產相對立；另一方面，生產過程尚未至單把流通過程作爲一個契機而包攝。反之，在資本主義的生產中，任何方面却都施行了。」

但較之於「資本主義的生產上的任何方面都被施行着，」商業資本已開始失去自己的指導權，重商主義的體系開始失却了它的基礎——經濟的及社會—政治的基礎。

卡爾把向大生產方面的移動如下的描寫道：「要之，應該有三種移動在推行着。第一是商人直接成爲產業資本家，這在以商業爲基礎各種營業——其中奢侈品製造業上可以看出來。這些產業，是跟原料和勞動者們一塊兒被商人從外國輸入來的。例如十五世紀從君士坦丁堡輸入意大利的便是。第二是商人以小工頭們爲仲介人，或直接向自家生產者購買；自家生產者名義上依然獨立，它的生產方法也不變更。第三是產業家變成商人，直接爲商業而大規模地生產。」

因廢棄商業資本的指導權而決定的是第三種，即「產業家變成商人，直接爲商業而大規模生

●卡爾資本論第三卷上。

●全上。

「產」流通變成生產的一個契機，於是重商主義的修正便沿着各種路線而開始。重商主義的貨幣觀，流通觀（把流通看作財富的源泉）被再檢討，其中最重要的是開始內在的經濟的規律性的探求，換句話說，是開始探求事物外觀之背後的本質。因流通變成生產的一個契機，所以它便不是自足的現象。理解表現於流通界中各種現象的關鍵，開始在生產中去探求。

這就是使威廉·培蒂從勞働中去探求市場價格的基礎——他的所謂自然價格——的所以然。由此他開了勞働價值論的端緒。

忠實於自己反卡爾主義之見解的魯濱（Rubin）這樣的說明着重商主義的崩潰說：「自十七世紀的後半葉以來在英國的重商主義文獻中，承認了加強對理論的關心。這一則由於數學及經驗哲學（培根——Bacon，霍布士——Hobbes）之廣泛的普遍化性質的影響，二則為適應經濟發展中所呈現之新的複雜化了的各種要求而有更廣泛更根本的再檢討重商主義的體系的必要上發生的。」<sup>91</sup>

魯濱的說明是在第一章我們就已經熟知的希爾法丁——馬赫思想的重複，即科學的發展是循着思維相互間的適應及思維事實的適應這條路走的，數學和哲學發展了，因而有使經濟的思考

與之適應的必要；新的事實（「經濟的發展複雜化了的各種要求」）發生了，因而有使經濟的思想與之適應的必要。這種「說明」當然和卡伊主義沒有任何共通點。卡伊主義不否定一種科學對他種科學的影響，較爲發達的科學應得去領導未發達的科學。卡伊主義並且還否定「經濟學的發展所呈現的複雜化了的諸要求」的影響。但對於卡伊主義根本的決定，則在於問題的階級的處理，在於理論的階級本質的闡明。所謂經濟的發展並不是無人格的，它是由於屬特定階級所生存的人們而人格化的。階級支配或階級指導權的交替，便喚起理論的交替。

魯濱當說明勞動價值論成立的時候，也仍然忠實於自己，忠實於希爾夫登和馬赫。即依他的見地，則全問題便在於形成自生價值的這種新事實的發現。「隨着資本主義經濟的發現——魯濱說——事態變化了。基爾特的評定價格，次第讓位給賣方和買方之間的競爭。被規制的價格形成，由自生的市場的價格形成所代替了。因爲價格被強制的確定，預先能盡量固定；所以複雜的競爭過程便轉化到預先難以測知的結果。如果以爲十三世紀的學者從公正的立場出發，而審議應確立如何價格的問題，則十七世紀的經濟學者們的思想便轉向到另一方面了；他們希求闡明支配着市場上的價格之現實的形成過程的規律性。價值問題之規範的提出，讓位給科學的理論的提出了。」

●魯濱經濟思想史，一九二六年，五三頁，旁點是魯濱加的。

如此從魯濱的所謂問題之規範的提出推移到科學的「理論的提出的階級的本質便被孟雪維克的魯濱完全抹殺了。所以由於「捨象」階級的本質，我們的「理論家」便什麼也不能說明，他只確認事實而已。「在中世手工業的時代，生產物的價格為基爾特與都市權力所規制。基爾特對於手工業製品的評定價格，是以保證對於手工業者們「身分相應的衣食資料」——他們的勞動報酬為目的，所以十三世紀有名的教會學者阿爾伯斯·馬克那斯 (Albertus Magnus) 和大衛士·阿奎那斯 (Thomas Aquinas) 教示生產物的價值乃依存於其生產中所消費的「勞動和費用的分量」，並不值得驚奇。這種表現的方式，雖然外形上和後世的勞動價值說相類似，但在兩者之間有着深刻的差異。前者是發生於手工業經濟的地盤上的，而不是發生於資本主義經濟的地盤上的。做成這種表現方式的人們，他們所着眼的是手工業者的費用（原料和工具的消费量）和對於他的勞動的「身分相當」的報酬。惹起他們關心的，並不是現實在市場的競爭過程中所確定的價格，而是適應於中世手工業之傳統的諸條件在權力上所應確定的「公正的價格」(Iustum Pretium) 價值問題的提出，帶着「規範的性質」。

魯濱根據關於手工業的經濟和資本主義的經濟（這樣的話，他甚至加以力點。）來說話，雖然

●魯濱經濟思想史五三頁，旁點是魯濱所加的。



持着說明什麼似的風度，但站在觀念論的立場的他，本質上什麼也沒有說明，並且不能說明。他又從何故在中世紀的手工業支配着的時代，人們對於真正的勞動或對於勞動的「相當」報酬出發，例如爲什麼不從被生產的物品的效用或限界效用出發？連這樣的問題也不提及。對此只留着唯一的解答，那就是說：在當時公正（！）支配着了；從而這是與教會之父的大衛士·阿奎那斯的精神完全一致的解答。但是觀念論者們的解答也不錯，他們以爲在當時人們還不知道奧大利學派思想還未到達那樣精巧的相互適應的程度。

進而何故於自生的價值形成之下，人們開始在不離其基礎的勞動中去探求的問題，也被留而未決。根據魯濱的主張，則是原因乃在於問題提出的方法改變了，問題之規範的提出被科學的理論的提出代替了。雖然如此，但無論在怎樣的問題提出法上，其解決都要從勞動中去探求。這又是什麼緣故呢？

卡爾和恩格斯的指示：價值法則在從資本主義的生產很早以前就支配着了。卡爾說：「因此，價格和價格運動乃由價值法則所支配的事情，暫置而不問；商品的價值，不僅在理論上，就在歷史上也是先於生產價格的東西，這種看法完全是適切的。因而這種狀態，不問在古代世界和在近代世界，都是表現於握有土地的自耕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

卡爾的這個命題，在恩格斯的論文價值法則和利潤率中更加發展，且予以基礎。恩格斯依據豐富的歷史的材料，到達下面的結論：「要之，在經濟諸法則的影響對於單純商品生產之全時代而發現的範圍內，從而直到價值法則隨着資本主義的形態之發展而受到變形止，卡爾的價值法則是普遍的。在當時，價格寄託在由卡爾的法則所決定的價值，以它爲中心而變動；從而單純商品生產發展到極完全的程度，平均價格不但由過程之正常進行的強力的破壞而從外部中斷，並且通長期中極正確的和價值一致，其間的價值之差縱然忽視也是沒有妨礙的結果。卡爾的價值法則，自從使生產物轉化到商品之交換的發展起，直到十五世紀止，在經濟的意味上是普遍的。」

所謂中世紀的公正價格（*Iustum Pretium*），不外價值法則的獨特的表現（在宗教的掩蓋物上所覆藏的表現）。價值法則在小商品生產的支配下，比在資本主義的生產下更直接的表現着；價值還未被生產價格所變形。基爾特及都市的權力，當規制價格時，事實上是從這個法則出發的。權力的代表者們，主觀上是受「相當的衣食資料」的必要所指導，而客觀上指導他們的却是價值法則。因爲他們是依存商品生產所支出的勞動量而確定價格，隨着不依存於他們意志的勞動的生產性的變化，不得使價格變化的緣故。然而隨着商業的發展和商人任務的強化，價值法則的發現便

開始複雜化了。

商業資本雖然榨取勞動——小生產者的勞動——但並沒有把它加以組織。他對於生產上所支出的勞動，也並沒有如何的關係。他只不過曉得價格——購買價格和販賣價格——間的參差而已。然而彼此的價格在量的方面實際也和價值不一致。卡爾說：「商業資本榨取相異的諸國中的生產價格間的變動（在這一點上，商業資本有使諸商品價值均等化確立的作用，暫且不提，而上述的諸生產方，乃齋到商人資本至於占有剩餘生產物之壓倒的一部分的結果。這一則是商人資本在本質上還販賣着以使用價值爲目的而從事生產的各共同體間的生產物部分，總而言之，販賣進入於流通的生產物部分，從而在其價值流通上販賣諸生產物，除却從屬目的重要性之外，沒有共同體間的作爲媒介者而發生機能的結果；而且再則是在像這初期的生產諸方式之下，爲商人之交易對方的剩餘生產物之主要所有者的奴隸所有者，和封建領主以及國家（例如東洋的專制君主，）代表了享樂的財富的結果，商人想把這樣財富賺去，這事情已經在前面關於封建時代的文章中說過，亞丹斯密·思曾正確的找出來了的。」

常產業資本榨取勞動時，已經把它加以組織——它不能全然捨象勞動的確，在產業資本方面，

利潤被看做其全資本的產物，而不是僅其可變部分的產物。這就是說：無論怎樣反覆都不能把勞動完全捨象——縱使以費用價格中對於勞動的支出占有顯著地位的這種理由也是不可能如是的。由於這產業資本被推到舞台的前面，乃使有想在勞動中去尋求價格形成的基礎的嘗試。

在中世紀的手工業支配着的時代，由價值的大小來決定勞動時間的事情，並不是一個什麼特別的發見。價值和勞動間的連繫還沒有十分被隱蔽；於是它（價格）就被認為自然的東西或公正的東西了。權力者所可為的事，只是講求為取締這公正之破壞者的手段，其結果變成固定價格的制定，破壞它的人受嚴重的懲罰。在十七世紀，依勞動時間而決定價值之大小的嘗試，已經是大大地發見了；為什麼呢？因為價格和勞動間的連繫，從視界中被隱蔽了的緣故。

魯濱不理解這樣的事，並且不能去理解——對於這種理解和他的反卡爾主義的全傾向是對立的。就中，這種理解和他所立的價值法則不存於先資本主義時代（明白的和卡爾及恩格思的意見相反對）的主張不相容的。所謂價值法則若只隨資本主義生產的發見而表現，則它從來就不得發見，這樣的見解也是無理由的；因為從來……只有公正價格支配着了緣故。

## 威廉·培蒂的生平和事業

威廉·培蒂在英國史上的一個暴風雨時代過了一生。十七世紀對於英國是革命和反革命相繼的時代，政治體制到世紀末葉漸漸的安定了。在世紀的初頭（一六〇三年依利薩伯女王死後）所開始的由汎的人民大眾所支持的議會和王權的激烈的鬥爭，以後者的顛覆和查理士一世的處刑（一六四九年）而終結了。共和國雖然樹立起來，但事實上不久全權力便集中在變成了英國獨裁官的歐利窩·克洛姆威爾（Oliver Cromwell）的手裏。他死之後（一六五八年），其後繼者們不能維持獨裁，在一六六〇年先被推翻了的王朝，復興起來，查理士二世登了王位。這復興的期間繼續不久，其間充滿了鬪爭和陰謀，於是由於詹姆士二世（James II）——代替其兄弟查理士二世而登王位——的失蹤而告了終結。爲充補空位起見，便由議會中招聘出奧倫支侯威廉。這事件在歷史上被稱爲無血革命，是一六八九年發生的事。奧倫支（Oranje）侯威廉在特定的條件之下被由議會予以權力，這是雖然統治而不支配的條件，最高權力乃存留於議會的手裏。

議會的權力象徵着大布爾喬亞和大地主的權力。大布爾喬亞已很鞏固化，絕對君主制已經不是適應其利益的東西了。大地主也顯著的布爾喬亞化（縱令地位甚高）不能以隨侍國王之傍的宮內官的任務而滿足，並且也不願意去做了。

但是，對於民衆並未會給與何等的份兒。他們的英雄的鬥爭，他們對於革命的熱情和無條件的

忠誠，爲大布爾喬亞和大地主的利益所利用。這就是說，從民衆中也有在個人上「榮達」於這動亂的時代，而到達了占有很高社會地位的人。

但威廉·培蒂是一個例外。他不但是經濟學的創始者，並且就在英國貴族中也是身份最高的門第的先祖。●

培蒂不僅在「學問的神殿」上，就在「財神的神殿」上也一樣的活躍着。生長於貧窮的手工業者之家族的他，死的時候，却變成英國的貴族以及大百萬的財主了。他由於投機獲得了大成功，但爲愛爾蘭的代理官亨利·克倫威爾（歐利窩·克洛姆威爾之子）的秘書時，在同地勾留中參加同地之土民的掠奪，獲得了更大的成功。斯圖阿特王朝復興時代，培蒂是以同樣的熱心（當然因爲有報酬，）仕于同王朝。其貴族的稱號是得於這時代的。

培蒂對自己的子孫遺留下莫大的財富和貴族的家世，對於學問遺留下了許多貴重的著作。●

●「威廉·培蒂——卡爾說——不僅是英國經濟學之父同時也是英國自由黨之創立者別耶期士通侯爵亨利·培蒂的先祖。」（經濟學批判）

●培蒂的著作沒有由他的子孫們得到再版，卡爾說明其中的理由是這樣道恐怕由於遺出版有加添著者之詳細的傳記的必要，然而一說到這兒，關於大多自由黨之大家族的起源，最好是「少說爲佳」了。「頭腦雖銳敏，但是一位無聊

他是當時最有教養最有才能的人們之一。經濟學史家翁肯對於他有如下的述說：「這樣多方面的人物是不多的。雖然是醫者出身，但其後更成了數學者、音樂家、測量師、造船技師等。」

就其見解來說，培蒂的確是重商主義者。他把一切的問題（包含宗教問題）都從商業及貨殖的見地中去處理。「他——卡爾說——擁護信仰自由為商業的條件，因為雖然貧民們自己只是沒有財富，但對於天國的事則有至大的智慧和理解，這只許認為是貧民的特權；而且貧民是勤勉的視勞動和努力為對於上帝的義務。」所以商業「和如何樣的宗教也不相結合，它寧可和國民中的異教的部分相結合。」

培蒂對於貴族層加以攻擊。「他——馬克斯繼續說——反對那種徵收，那種把財富由勤勉者的手裏移到了那些除去吃、喝、唱歌、遊戲、跳舞、弄弄玄學而外什麼也不做的人們的徵收。」但是培蒂「為救濟浮浪之徒提議特別的社會稅，因為這樣向公眾徵收以救濟浮浪人，比讓公眾被浮浪人徵收的軍警，借着克倫威爾的風光要求掠奪愛爾蘭，對於掠奪者所必要的男爵的稱號又向查理士二世去跪求，這對於公眾的觀感上恐怕不見得是怎樣的冠冕。」（經濟學批判）參看郭沫若譯本四〇頁。

●翁肯·亞丹·斯密以前的經濟學史二二七頁。

●卡爾：經濟學批判，參看郭沫若譯本三十九頁。

收的，對於公衆更爲妥善些。」

培蒂的世界觀是顯著的立脚於科學的，惟其如此，所以他對於形面上學採取極冷淡的態度，把它和跳舞及賭博置於同列。

### 培蒂的方法

培蒂的「反對理論的重商主義」表現於他所採用的方法中。他的方法，如培蒂自己說的一樣，「不是傳說的東西。」實際上他和傳統分離。重商主義者的方法，如前章所述說，是記述的，即只是蒐集事實把其間的經驗上的連繫弄明白而已。「政治的算術」的著者，是企圖着「由感官的經驗來立論，要只把自然界中有顯著可見的根據的諸種原因來加以考察。」

培蒂把用於自然科學的諸學科中的方法導入於經濟學之中。他在這種方法上，更附加了數學的形態。以此爲根據的許多的研究家，沒有看見培蒂之方法的真正性質，從而把他（由於統計）認爲好像是僅主張那由於事實之正確的觀察和統計方法的記述的經驗論者的確，培蒂要求正確的

●全上，旁點是卡爾加的，參看中譯四十頁。

●卡爾經濟學批判譯本三八頁。



觀察，這是事實，但是他爲說明被觀察的諸現象起見，換句話說，爲闡明其本質起見，而廣泛地利用科學的演繹，這也是很明顯的事實。

例如培蒂當研究租金時，如下的說道：「在詳細論究租金之先，必須企圖說明被稱爲利息的貨幣租金，及租金從土地及房屋中的內奧的性質。」從而卡爾對培蒂完全正確的指責：「現象自身不是問題，現象的基礎才是問題。」然而闡明現象的基礎，或者如果用培蒂的話，闡明現象之「內奧的性質」如根據卡爾的用語來說，借抽象力而代替顯微鏡和化學的試藥，是不可能的。

想闡明現象之基礎的培蒂，同時並且理解了「在此基礎上所展開的上部構造是……極多樣複雜的事。」即培蒂理解了這樣的事：（一）現象的本質和現象自身不是同一的，然而經濟論者是從真正兩者的同一性出發的；（二）研究不僅是由現象本質的闡明而完了，且進而必須指出它如何的發現。

① 卡爾剩餘價值學說史。等點是洛森堡加的。

② 全上。

③ 卡爾：資本論第一卷序文，英譯六頁。

④ 卡爾：剩餘價值學說史。

但是在培蒂的新方法適用的最初嘗試，不得不力說是僅被看到的；此種方法，在重農主義者和英國古典經濟學者，特別是李加圖之間，更完成了極大的發展。

### 培蒂的價值論

培蒂首先以新的方法適用於價格的分拆，從而當時他探求着基礎。雖然這是序幕，但如果像翁肯的斷言說培蒂不過單單是個統計學者，則他——根據統計的方法——將止於確定平均價格了。然而培蒂却真正的探求着平均價格的基礎。他是，以市場價格變動之中心的平均價格被什麼決定的問題為研究之目的。他的解答是這樣：「如果誰能夠在和生產一斛的穀物的同一時間，從伯爾的銀礦中採取一盎斯銀子送到倫敦，則這一盎斯的銀子便代表一斛穀物的自然價格。如果發現了新的，較富的礦山，以從來採取一盎斯銀子的同樣程度的容易能採取二盎斯的銀子，而其他的事情不變，則往來一斛值五先令的穀物，現今就要有十先令的價格了。」

由此很明白的，培蒂確認着下列的事實：（一）商品——一斛的穀物——的自然價格，由該商品生產中所支出的勞動量所決定；（二）牠和採取銀子中所應支出的勞動的生產性為正比例，如

果銀子的採取容易二倍則穀物的自然價格也便增大二倍，把培蒂的命題和下列卡爾的命題比較看看吧，「商品 A 的相對的價值，即由商品 B 所表現出來的商品 A 的價值，如果商品 B 的價值沒有變化，則和商品 A 的價值爲反比例而增減的。」<sup>①</sup> A 商品在培蒂的例子中是穀物，商品 B 是銀子；由銀子所表現出來的穀物的相對的價值，隨着銀子價值的低下而增大。

根據這種比較，顯然的看出培蒂並沒有規定了商品的價值，而是偶然規定了商品的相對的價值。加之他把相對的價值更當做了那偶然的貨幣的表現，換句話說，不研究某商品之價值由其他任意的商品的表現（即兩個任意商品的交換比率），而研究商品價值由貨幣的表現（在培蒂的時代，銀子是通貨材料即貨幣）。從而培蒂不僅未從交換價值中去抽象價值，<sup>②</sup>而且也沒有從價格即價值之貨幣的表現中去抽象價值。「這就是說——卡爾說——他把交換價值依照它在諸商品的交換過程中顯示着的外觀當做貨幣，而把貨幣當作現存的商品即金子和銀子。」<sup>③</sup>

在這點上，無論如何都表現着培蒂的重商主義。對於他商品的價值不外是得能平均的和該商

① 卡爾資本論第一卷。

② 從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同一看待，甚至到李加圖還沒有解放出來。

③ 卡爾經濟學批判叢書譯本四〇頁。

品相交換的貨幣量。但引起培蒂注意的，則是爲什麼在和那個商品相交換中（在平均上）真正的得到某一定量的貨幣的問題——從而在以此爲問題的着點上，他和其他的重商主義者們有不同之處。

培蒂的重商主義不僅表現爲他的價值論的弱點，特別值得注目的，那還是成爲他的價值論的強處。而且正是重商主義的思考方法，才由商品價值及勞動的自然主義的處理方法，換言之，可以說，就是由還元於以價值爲自然過程的勞動屬性的方法防衛了培蒂。如我們在前章所述說過的一樣，承認流通對於生產的優勢，形成對於內容的優勢的重商主義，並未容認了這種自然主義的機械論的價值向勞動的還元，因爲這種還元是真正無視流通和形式——特別是價值的貨幣形態——的東西的緣故。所以培蒂便立於一見難以解決的問題之前了。作爲重商主義者的他，不能把價值，如果更正確的說，不能把自然價格從勞動中取出。然而依據他的新方法時，也不能把它（價值）從市場價格的變動中取出，因爲新方法需要捨象市場價格的變動。培蒂的天才性和獨創性實在發揮在他所發見的，從這種困難中逃脫出的途徑中了。培蒂發見了的逃脫的途徑，有如下述，他說：一切的勞動不能造出交換價值，僅在銀子即貨幣的生產中所支出的勞動造出交換價值，其他種類的勞動，只在和銀子相交換的範圍內，才造出價值。

「他拘束在貨幣學派的觀念中，把用於金和銀之採用中的一種特殊的現實勞動解釋為決定交換價值的勞動。本質上，他認為布爾喬亞的勞動不應生產出直接的使用價值，而應生產出商品——即由於在交換過程中的推銷表現為金與銀的使用價值，換句話說，即表現為貨幣、交換價值、被社會化的一般勞動的使用價值。」

在培蒂還不理解包含在商品中的勞動的二重性。他從全社會的勞動中，選出現實勞動的一種類，使它和現實勞動的其他諸種類相對立，前者直接生產出交換價值，後者直接不生產交換價值，由於和第一種的勞動的生產物相交換，才生產出交換價值。

不理解勞動生產價值之性質的培蒂，當然也不能理解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不同。如根據他的思考，一切勞動生產物也應分為兩個部類：（一）一切種類的勞動生產物，（二）金和銀。前者在交換中變成交換價值，後者從最初就生產為交換價值。換句話說，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不同，反映出應用於金山及銀鑛中的勞動和其餘種類的勞動的不同。

但在金銀的生產中，並不僅勞動單獨參加，自然也是參加的。因此，一方面生出了培蒂這樣的解釋：「勞動是財富之父，自然是財富之母。」另一方面，對於培蒂存在了兩個價值尺度——勞動和

自然。「我想說，一切物品的評價應該受兩個自然的分母——土地和勞動——所通約，例如，船和衣服，應該說是等於這些量的土地的價值，這些量的勞動的價值。爲什麼呢？因爲兩者——船和衣服——都是土地和人類勞動所產生的東西。」

從而培蒂好像把零碎的東西還元到整個的東西似的，述說着以一個價值尺度還元到其他價值尺度的希望，認爲這是經濟學的決定的諸任務之一。但是這件事，只不過證明培蒂理解價值的本性和其社會的特質還是不夠而已。他還未理解自然只參加在使用價值的生產，「在交換價值之中，例如和在匯款行市中相同，並沒有包含着由自然所給予的物質。」

培蒂把這兩種價值尺度還元到一種價值尺度的做法很有興趣。他進而如下的考察：現在，假定

◎翁肯只在皮相之外去理解培蒂，而以培蒂的此種解釋，視爲不是「在方法上首尾一貫的研究」的結果，而是簡單的警句（前揭書）第一，這所謂「警句」是由培蒂的全思想的體系中生出來的，第二，如方才所見到的一樣，培蒂也努力想在方法上去研究此種金言。

◎卡爾·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一卷。

◎卡爾·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一卷。

◎卡爾·資本論第一卷。

在未耕的二畝土地上所放牧的牛的重量，只相當於五十日間足養一個人的分量之肉的一年間增加吧。然則這土地（不借人力，）便在於生產五十日份的「食糧分配」，於是形成這土地部分的年地租。其次，如果人類由於耕種這土地部分，只五十日份就過餘地生產了「食糧分配」，則這超過「分配」，就相當於勞動的價值。所以勞動和土地，就還元於所謂食糧分配的單一的測量單位。

的確，應該注意的，不僅在於培蒂的兩個價值尺度的存在，進而如其後布爾喬亞的勞動價值論者之多數如是似的，他也施行從商品價值由勞動的決定中向商品價值由勞動價值之決定的轉換。他說：「通常的價值尺度，是成人成天價的平均的生活資料，並不是他的成天價的勞動。這個尺度和純銀的價值同樣是規則的，而且被認為是恆常的東西似的。……所以我由於被那建築時的建築者們所消費了的成天價的分配的段量來決定愛爾蘭的百姓們的價值。」

加之，培蒂如從前面引用文中所考察似的，是和其後多數的經濟學者們同樣，混同了價值內部的——內在的——尺度（即勞動）和價值外部的尺度，更正確的說，混同了價值內部的尺度之發現形態（即貨幣）。雖然如此，但在根本上，他是由勞動來規定作為內部之尺度的價值，或者借用他的表現來說，即由勞動來規定自然價值。

卡爾把培蒂的勞動價值論的特徵如下的寫道：「價值在三個聯合着的形態上表現出：

(1) 由勞動時間之等量所決定的價值的大小，當時勞動被視為價值的源泉。

(2) 作為社會之勞動形態的價值。所以在其他的地方，雖然培蒂傾覆了重金主義的一切幻想，但是他視貨幣為價值的真的形態。

(3) 作為交換價值之源泉的勞動和使用價值的混同。①

實際上，培蒂把價值的兩個尺度還元於單一的尺度——勞動，這事件有特別力說的必要。例如他把土地的價格，如方才所見到似的還元於被資本化了的地租，把地租還元於剩餘價值。

在前面引用文的末尾上卡爾如下的說道：「實際上，他分裂了土地和勞動的平等關係，把土地價格描寫為被資本化了的地租，換句話說，他並沒有把土地看作所謂現實勞動之自然的對象。」

價值由勞動時間的決定，是以一切種類的勞動的平等為前提的，從而這也並沒有逃出培蒂的注意。他寫道：「在銀子的生產中，需要比較穀物的生產更大的技術，縱然會伴隨着極大的危險，但結局一切都要歸結到同一的吧。現在，假定以一百八十年間生產穀物的同樣的人數和同一時間，被充用於銀的生產，其時被採取出來的銀子的純殘餘，將代表穀物之純收穫率的價格，而構成前者等部分



的價格。」

由此很明顯的，培蒂並不從個別的勞動者或個別的勞動及職業的各個特徵出發，而以平均的勞動者——所謂多數人中之一人——為基礎，把個人的特徵平均化於其中。的確，這離抽象的勞動及社會的必要勞動之理解還是很遠的東西。

### 培蒂的工資學說

雖然培蒂由其價值論而成了新見地的創始者，但關於其工資學說，這件事並不適當。他是僅僅企圖有根據當時存在的事態而已。蓋在當時雖然工資為立法所確定，但當時被決定的並不是工資的最低額，而是其最高額。「禁止支付在法規上規定着的以外的租金，犯着這種條款的被處以入獄之刑，當時接受這種不法的租金的人，比支付那租金的人還要受更苛刻的處罰。」

這就是說，培蒂關於此問題的見解，也不是尋常的經濟學者在其論究工資之最高額制定的必要的議論中，他對於正在發展着的資本主義的諸關係，指示出很深奧的理解。他說：「法律對於勞動

●卡爾·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一卷。

●卡爾·資本論，卡爾在全頁，關於此種法律詳細的論究，更附註補足本文，極完全的解明這一問題。

者只應保證生活資料，爲什麼呢？因爲如果允許他得到二倍的租金的話，則他要除却認爲應該勞動或想要勞動的程度之半分外，便不勞動的緣故，因而這在社會的方面就意味着僅此分量的勞動的喪失。①」

卡爾給予這引用文如下的註釋：「這個所在，應該如下的理解：如果勞動者對於六個鐘頭的勞動接受六個鐘頭的價值，比之於他（對十三個鐘頭的勞動）被給予六個鐘頭的價值的現在要接受二倍的工資。此種場合，他除却只有六個鐘頭而外就要不勞動了。」②

所以勞動的價值乃由生活上必要的物質所決定。勞動者爲獲得生活上僅有的必需品起見，便強制的使用他可能範圍內所利用的勞動力的全部；只此之故，勞動者才變成剩餘價值的生產者，變成剩餘價值的提供者。

固然，在培蒂方面，還沒有勞動時間向必要的勞動時間和剩餘價值的勞動時間的意識的分割。但事實上，他却如是的分割着勞動時間。當時，他以此分割爲理由的態度很有興趣。如果不強制勞動者在剩餘時間上來勞動，這便是所謂「在社會方面意味着僅此分量的勞動的喪失。」

①卡爾：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一卷。

②同上。

培蒂把工資由權力的諸機關的統制，牠的最高限的制度，不解釋為專斷的規則，而解釋為立脚於現實的基礎上的規制。成爲這基礎的是勞動者之生活資料的最低額，從而這使他成爲在某種特定意味上的工資「鉄則」的理論家。正是這種原因，培蒂才反對工資趨向法律所制定了的水準以下的低落。工資應制定的最高額，對於他又是其最低額了。

當論究貨幣價值的低下齋來適應於牠的一切財貨之價格的騰貴的時候，培蒂如下的寫道：

「如果在這貨幣價格低下的時候，制定禁止一切勞動者的工資騰貴的法令，則這種法令便等於課稅於勞動者；他們不得不失却其工資之半。似此不但是不正常，也恐不可能。爲什麼呢？因爲他們雖然不得不由從來工資的半額去謀生活，但這是由於假定而成爲不可能的緣故。在此場合，制定這種工資的法律要變成惡劣的法律，因爲本來這法律的目的所在，在於給予勞動者以只爲生活恰好必要的東西。」

●愛斯·阿·華爾庫諾在其所著工資之來源一書中，雖然引用這一節（三一頁），但是當時，他把它歪曲而理解，即他僅視之爲「當時的一般願望」的表現（三〇頁）。從而他在很多的真段中，始終從培蒂的所論中去探求生活資料最低額的理論的痕跡。卡爾（資本論第一卷）引用着如下的極明瞭確當的培蒂的斷定，「勞動的價格，常常由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所決定。」

所謂工資鐵則的法則的萌芽在培蒂只不過於某種極被限制的意味上得到確認，這件事有把它再度力說的必要。工資的「鐵則」和工資之自生的規制有關係，即此法則的支持者主張在自生上所規制的工資常常在於生活資料之最低額的水準，然而培蒂是就關於被權力的諸機關所發布的工資的法律來說的。他和「鐵則」論者的共通點，不過在於兩者間都主張置勞動者於應該只取得生活資料的最低額。

最後，勞動者之生活資料最低額的範疇，如以下所見，要把在培蒂的地租論上擔任決定的任務的事情置諸注意，不如無此範疇，則他的地租論也是同樣的虛浮於天空的。

### 培蒂的租金論——土地租金和貨幣租金

培蒂把土地租金（地租——譯者）在現物的表現和貨幣的表現之雙方面來考察。他把現物的表現上的地租如下的規定着：

「現在如果假定有人以自己的手去耕、掘、勻、下種子、收割、搬運穀物、打穀、簸出，而且在播種時有充分種子的貯藏吧。如從收穫之中除却為播種所使用的穀粒外，自己消費的部分以及添製衣服和其他的必要品交付他人的部分等，殘餘的穀物即形成該年的自然的真正地租。如果把與其說是

七年間的平均毋寧說是凶年和豐年相繼續的幾年間的平均來算，則以穀物的形態可以求出通常的地租額。」

因此，所謂貨幣形態上的地租，便是形成着在培蒂以上列為根據的諸扣除之外所得到的自然價值的貨幣量。換句話說，培蒂把貨幣形態上的地租，決定於其自然價格論的基礎之上。他說：

「這穀物或這租金，從價值上來看，能和幾何量的英國貨幣相等嗎？我如下的解答着：牠在埋頭於貨幣生產的某人除却了各種的生產費用之後，可以在同一期間內所取得的貨幣量相等的。即假如現在某人赴銀產地，於此採取、洗鍊這種金屬，把牠送交到先前的穀物產地，從這銀子中去鑄這貨幣。而且這個人在埋頭於採取銀子的期間內，他還需要食料、衣服和其他。有時一方面的人的銀子，在其價值上必須和其他方面的人的穀物相等，例如在前者的手中有二十盎斯的銀子，在後者的手中有二十斛的穀物，則一盎斯銀子便要形成一斛穀物的價格。」

在上列的引用文中所用的例子中，缺乏工錢勞動。最初的引用文是所謂「現在無論誰以自己手來耕種。」這樣的語句開始的；在第二個引用文中也仍然是「……某人赴銀產地……」

●卡爾：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一卷。

●卡爾：剩餘價值學說史。

結局。如根據培蒂的見地來說，則就在工錢勞動不存在的地方，地租也存在着。但卡爾完全正確的在培蒂的地租論中發見出剩餘價值論；這就是說，因為培蒂無論如何事實上也是研究過資本主義的農業的地租。從而在資本主義的農業中，地租是除却一切生產費用之後所得到的穀物超過分貨幣表現上的地租，是這穀物超過分的自然價格。

的確，培蒂由其所使用的例子塗抹了地租的資本主義的性質。但惹起他那作為布爾喬亞之理論的代表者之關心的，並不是地租的資本主義的性質，而是所謂其物質的基底。引起他的關心的，是為什麼地租在物質上技術上被生產，而且被實現，即被轉化為貨幣呢？他把地租的這物質的基底還元剩餘生產物，把其（基底的）貨幣的等價還元到可理解為超過生產費用的貨幣超過分的剩餘價值。固然，這並不是真正意味的剩餘價值學說，但是已經邁出第一步了。

如培蒂所曾做過似的，甚至地租向剩餘生產物及剩餘價值的還元，也是偉大的一步前進。由此奠定了為建築真實的剩餘價值學說的最初的基石。但是不僅如此，培蒂的地租論明明白白的確實以那工資論為支柱。實際上，地租是對於生產費用的超過分。

但是所謂生產費用是什麼呢？如根據培蒂的習解來說，穀物的生產費用，是由種子及勞動者之

●卡爾剩餘價值學說史，旁點是洛氏加的。

生活費形成的。如果把牠適用於資本主義的農業，這件事便意味着：成爲費用之構成部分之一的是工資。從而如果工資是不定的大小時，則地租也依然必須是不定的大小；因爲費用是不定的大小，所以對於牠的超過分也依然不得不爲不定的大小。這是和我們敘述（當考察工資的時候）沒有培蒂的工資論，則他的地租論也便虛浮於天空有同樣的原因。然而如根據他的工資論來說，工資是完全被決定了的大小；牠被還元於最低的生活資料。

在上述的意味上，由於依據工資來決定地租，使更爲明瞭地表現出培蒂的租金論不外爲剩餘價值學說。事實上，培蒂自身也使地租的大小依存於工資的大小。他說：「工業和技術如果發達，則農業便不得不衰頹，換句話說，農業勞動者的工資騰貴，地租便不得不低下。」<sup>①</sup>

所以如果根據培蒂爲說明這命題所用的例子來說，很明瞭的，他把完成生產物的全交換價值只分爲工資與地租了。這是已經指示出培蒂在地租的概念之下並沒有意味着剩餘價值的一部，而是意味着其全部的一個證據。「例如——他說——假定小麥一斛賣五先令即六十便士吧，如果成長小麥的土地的地租由各個小麥束的三分之一所形成，則六十便士中，二十便士歸屬於土地，四十

① 卡爾·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一卷。旁點是洛氏加的。

便士歸屬於農業勞動者。」

由這個例子，也可明白下列的事——從而卡爾在對於這引用文的注意中注意到這件事——即培蒂的主見，並不是穀物的價格依存於地租，而是相反的地租的大小依存於穀物價格；從而這也是他的自然價格論之當然的歸結。所以培蒂成爲把農業上的完成生產物之價值分割爲 $\angle$ 十 $\angle$ 的李加圖的先驅者了；培蒂也把牠分割爲 $\angle$ 十 $\angle$ ，所不同者只是李加圖以 $\angle$ 解釋爲利潤，而培蒂則把牠解釋爲地租的一點而已。

培蒂並不曉得作爲獨立的範疇之利潤，在他看來，地租是剩餘價值的一般的形態。在培蒂的見解中——卡爾說——剩餘價值僅存於地租與利息的兩個形態上。他把後者由前者中引導出來。只有地租對於他——像後來對於重農主義者似的——是剩餘價值的真實的形態。①利潤，如衆所周知的，被分割爲企業紅利和利息，從而在現象的表面上，企業紅利表現爲對於企業家之勞動的報酬。可以說培蒂在觀察上的確是在此種幻想的影響之下的。所以在他看來，成爲問題的，只是利息，如果借他的話來說，只是貨幣租金；企業紅利還尙未至作爲問題而處理。

培蒂把利息從地租中引導出來。那是如下面的做法：貨幣所有者，無論誰都能買土地得到地租。從而貨幣也不得不和土地同樣齎致所得。培蒂發見對於利息之自然的基礎，把牠與地租等量齊觀。

① 卡爾：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一卷。

② 卡爾：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一卷。



的，是反對利息之立法的統制。利息必須依存於對貨幣的需要及其供給而施確立的

培蒂已經曉得了差額地租。他寫道：「例如在倫敦或某軍隊的給養所用的穀物，必須從距離四十哩的地點搬來時，在離倫敦或當該軍隊之屯營地僅一哩之遙的地方所栽培的穀物，在其自然價格之外，應多給予相當三十九哩之搬運費用的金額。」這如衆所周知的，是由於距離的差額地租。但培蒂的確也表現了依於肥沃程度的差額地租的萌芽。卡爾揭錄適應於此的引用文，如下的結論着：「從而培蒂敘述了比亞丹·斯密還堂皇的差額地租。」

但是，因為在培蒂方面，地租是剩餘價值的一般的形態，所以不能把他視爲與利潤之範疇相對立的特別範疇的地租理論之父。於近代意味上的地租理論之父，如卡爾在其他地方所說似的，不是培蒂而是安德孫（Anderson）。關於此點，留待後章敘述。現在僅先指示出如培蒂所述說的意味上的地租的定義，也可給予爲解明地價問題的關鍵。這實在是培蒂的功績。他把一年的地租乘一定年數的得數，視爲地價，換句話說，即是他在土地的販賣之中看出地租的販賣，正因為如此，才是他的偉大的科學的功績。

商品之自然價格的理論和地租論是指示他以這樣的解決。他不能視地價爲通常的商品之價

格。因爲土地並不是勞動生產物的緣故。但土地提供出地租，所以土地的販賣便不外乎所得的販賣。於此，培蒂遇到的困難，乃在於解決這樣的問題：應否使用幾何的年數作爲地價決定的基礎？換句話說，應否以幾何的年數乘地租？培蒂解決此問題，如下的說道：「一塊自由的土地，在自然上。」(natur-) 是否能值年地租的幾何量？」從而培蒂又聰明的解答着：「如果牠值年地租的無限倍，而just 生出一畝土地的價值和千畝土地的價值相等的，不合理的結果，這因爲一單位的無限倍等於千單位的無限倍的緣故。」<sup>①</sup>

培蒂到達了這樣的結論：年利息應以二十一年去乘。這就是說，因爲根據統計的材料來說，在此期間中能夠看到三世代的人——「五十歲的人，廿八歲的人及七歲的兒童，換句話說，祖父、父及兒子」——同時生存着的緣故。從而培蒂說明：「此外就很少有不得不爲遠代子孫所苦惱的人了。」<sup>②</sup> 但是在我們當前重要的課題，並不是培蒂對於他所提出的課題述說着如何的議論，而是他根

① 旁點是洛森堡加的。關於土地，培蒂也是以不欲決定其市場價格，而乃決定其自然的價格爲任務。在此種場合，在他看來，「問題不是現象自身而是現象的基礎。」

② 卡爾：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一卷。

③ 卡爾：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一卷。

本上正確地解決着問題，而且在培蒂方面，除此而外，並沒有得到了什麼解決。因為他把利息——貨幣租金——從地租中，換句話說，從所謂由貨幣而買得加上利息的土地中導引出來的緣故，而必然的視地價爲被資本化了的貨幣所得（利息）。

× × × × × × ×

我們曾述說過布爾喬亞的經濟學史家過小地評價着培蒂，甚至把他加入統計學者之列。到了分析他的方法及學說，只有卡爾認爲他是「近世經濟學」的創始者，那才是正確的理解。

的確，培蒂還是重商主義者，但是由於這重商主義者及其研究，實不僅幫助了重商主義的解體（培蒂對於當時的人們曾有着很大的影響力），而且奠定了古典經濟學的基礎。培蒂的一般的世界觀由重商主義而貫通着。他距離最後世成爲經濟學者們之「信條」的「自然的秩序」的思想或經濟的自由之說教還很遠。重商主義的標記，如我們所見到，是印在他的自然價格說之上的；牠也可以被命名爲重商主義的勞動價值論的。例如，船員（指商船的船員）的勞動比農民的勞動是約三倍生產的——這種培蒂的主張，是重商主義的。這就是說，培蒂甚至關於對重商主義者們爲決定的問題的貨幣問題，敘述着和「正統的」重商主義全然不相容的思想。

培蒂對於流通上必要的貨幣量，有如下的敘述：「在一國的商業上所必要的貨幣中，存着一定

的限度和比率；較之過多或過少的時候，便阻礙商業。」<sup>①</sup>並且在其他的地方，蒂培把問題很明瞭的提出：「有非常多量的鑄貨的場合，怎樣去做好呢？」從而他答道：「可以鎔毀其中最重要的去做成金製或銀製之食器和什器，不然則向其需要或願望的某地方作為商品而輸出，或者附上利息貸予利息高昂的地方。」<sup>②</sup>但是最特徵的是下列一點：「貨幣不過是國家這種身體的脂肪。牠過少的時候，就引起國家的疾病，同樣，牠過多的時候，就阻害國家的運動……脂肪使筋肉的運動光滑，在沒有食物的場合，供給身體以營養，而且使凸凹平坦，使身體美麗，同樣，貨幣使國家的運動活潑，在國內食物缺乏的場合，把牠從外國輸入進來，而且清償諸種的債務……」<sup>③</sup>

培蒂的重商主義的見解和反重商主義的見解，其根源就養育在他當時的轉換時代。一方面在英國舊式的商人和高利貸還沒有退出舞台；另一方面，商人及產業家的新的類型已經出現了，他們的財富由大工業制手工業或大土地所有而形成了。在此時代，視貨幣為財富之唯一形態的人，和只視貨幣為流通及財富的手段的人，二者間相交錯的不應加以區別。

① 卡爾資本論第一卷，旁點是洛氏加的。

② 同上，旁點是洛氏加的。

③ 同上，旁點係洛森堡加的。

## 第四章 培蒂以後經濟學思想的發展

培蒂在經濟學史上的地位，反杜林論中曾舉出如下的特徵：「在經濟學之幾乎一切的領域內，培蒂所完成的最初大胆的把握，由其英國的後進者們所一一採用，且進而展開了。從一六九一年到一七五二年的時期中，這種過程的痕跡，就是如何淺薄的觀察者也是明白的；屬於這時期比較重要的一切經濟學書，無論贊助與否的任何方面，都和培蒂相結合，這是曾經顯示着的事實。」<sup>(1)</sup>

恩格斯付與這時期以非常的意義。他繼續說：「這個充滿獨創的頭腦的時期，對於經濟學之漸次發生的研究是最重要的時期。」

我們先來攷察關於培蒂最近的後繼者——陸克和挪兒斯吧。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德版二五三頁。

約翰·陸克 (John Locke) (1632—1704年)

業醫的陸克，主要是爲十七世紀的大哲學者而有名。陸克否定本有觀念的存在，認爲感覺是認識的源泉，是十八世紀法蘭西唯物論者的直接前輩。當論究道爾巴克與愛爾玩叔斯及其他當時學者的唯物論時，蒲列哈諾夫如下的寫道：「論駁這種見地（本有觀念的存在——洛森堡）的法蘭西的唯物論者，實際說來，不過祇解說了陸克的學說。」<sup>①</sup>

陸克在其政治的見地上是自由主義者。他是把國家統治上積極的任務付與以「第三身分」的立憲政治論者的一人。卡爾關於陸克述說道：「他代表着一切形態的新的布爾喬亞，即代表着和勞動者階級及貧民相對抗的工業家，和舊式高利貸相對抗的商業家，以及和債務者的國家相對抗的金融貴族，從而在自己的著作之一中，甚至把布爾喬亞的悟性，論證爲人類之規範的悟性了……」<sup>②</sup> 陸克實不僅在理論上代表了布爾喬亞，說到國家之商業行政上重要的官職，他還是英蘭銀行的創立者及大股東之一（該行創立於一六九四年）呢。

① 蒲列哈諾夫史的一元論，一九三三年版三頁。

② 卡爾政治經濟學批判。

爲「一切形態的新的布爾喬亞化」的代表者的陸克就在經濟學上也同樣地代表着這件事。在他的利息論裏最明白的表現出來。他和培蒂同樣，認爲利息完全是正常的現象，反對強制取締利息率的一切的企圖。陸克把利息的問題如下的表式化：

「我們現在要探求：貨幣爲什麼要由利錢或利息 (Use or Interest) 的一定的年額收入去獲得和土地的同性質呢？蓋土地在自然上生產着非常新的、有用的、對於人類有價值的東西，反之貨幣是不生育的，什麼也不生產，只不過由於二者的合意，把一個人的勞動報價移於他人的衣袋而已。」

陸克很正確的提出問題——從而這是他的學問上的功績。即是他把利息還元於剩餘價值的占有研究爲什麼施行這種占有的問題。正當地提出問題的陸克，還給予正當的解答：「這件事是由貨幣分配的不平等所引起的。此種不平等，縱然對於土地關係也發生和對於貨幣關係同一的影響……現在如果有人想耕作或有耕作不了的土地，別的人有同上程度以下的土地，則此種不平等的結果，前者對其所有地就要找出佃戶。同樣，貨幣分配上的不平等……爲我的貨幣創造出借貸人 (Tenant)。所以我的貨幣靠着借貸人之勤勞，因借貸人之故，而獲得生產百分之六以上的產物的能

●卡爾·剩餘價值學說

力這恰和某人的土地靠其佃戶之勤勞有着能生出地租額以上之產物的能力同樣。」<sup>①</sup>

從附有旁點的地方可以察知，陸克不僅把利息還元於剩餘價值，同時也把地租還元於剩餘價值。卡爾關於這個問題加以如下的說明：「在這一點上，陸克一則對於土地所有者抱着論證他們所取得的地租和高利貸所取得的利息全然沒有區別的論爭的興味。靠着生產手段的不平等分配，利息和地租都是『把一個人的勞動的報償移入他人的衣袋中。』」<sup>②</sup>

卡爾依此說明，提供出理解這樣問題的關鍵：爲什麼布爾喬亞的思想家們給予剩餘價值學說之真正萌芽呢？換句話說，爲什麼把剩餘價值還元於剩餘勞動呢？當時剩餘價值學說把其鋒刃舉全力對向非難利息的封建貴族了。布爾喬亞的代表者基於利息和地租有同一的根柢，兩者都不過是剩餘勞動占有不同的形態而正常的連結利息，是所謂攻擊的防禦的方法。

如先前所見到似的，培蒂也仍然以闡明「地租之秘密的性質」爲任務；從而他的所謂地租，是剩餘價值的一般形態之意。但在培蒂方面，論爭的契機並沒有陸克那樣銳利；從而，這不得不特別力說，一般論爭的性質越銳利，理論的銳利也便越增加。怪不得陸克不能直捷爽快的說地租和利息是

①同上，旁點是卡爾加的。

②同上。



生產手段從生產者分離的結果了這就是說，陸克之資本的概念的確純粹是重商主義；他不能區別貨幣和資本，從而這件事也反映在他的利息率之決定的方法中，依他的意見，利息率是依存於一國內的貨幣量。

爲着要好好的理解陸克的剩餘價值學說起見，更不得不使它和他的價值論及他的私有財產的基礎相對照。陸克也仍然由勞動去規定價值（但非交換價值而是使用價值）。陸克雖然沒有否定在使用價值的生產中參加自然，但他從這件事中得出如下的結論：由於自然所生產的一切，是共同的財產；由於勞動所生產的一切，是勞動者之私有財產。這件事雖然關於土地自身也是正確的，即根據陸克來說，土地由勞動去耕殖，只在「有所獲得」的程度上才變成私有財產。然而如果進一步發問爲什麼勞動附與所有權？則那是因爲「我們握有這樣完全的根據，即他（人類——洛森堡）的肉體的勞動及其手之製作物當然屬於他自身之所有。」「從自然的創造給予人類手裏的諸物中，人類製造出的一切，由他使其與其勞動相融合，依此它和他所有的任何東西相結合。他是基於這種方法把它作爲自己的財產。」

陸克更由使用原理去訂正這勞動原理。「基於自然給予人類之勞動及欲求以限度，顯明的規

定了所有的程度。●卡爾如下的約說着陸克的思想：「所以建立所有之一種限界的，是個人的勞動的限界；所有之別別的限界，是任何人也不蓄積過他能使用之外的東西。」●

這勞動原理和使用價值，隨着土地及貨幣分配的不平等之發生而開始被侵害了。所以這不平等，如我們所曾知道，是引起地租和利息之形成的所在。如果脫去理想主義的外衣——人類之「共有財產」啊，人類「具有他自身之一身」啊等語句——來考察時，就得出如下的真正命題：（一）剩餘價值是歷史的範疇——但它並不是在適應於特定的生產方式的意味上的（陸克離這樣的思想還很遠，）它（剩餘價值）是在於「文明」之一定發展階段上而發現的意味上的。（二）剩餘價值是由生產手段和生產之分離而產生的剩餘勞動占有的結果。

· 所以把論爭及批判的鋒刃對向封建制度的布爾喬亞思想，基於暴露大土地所有之秘密的性質，同時很明顯的生出了資本的「秘密的性質」。尤其是最初的階段，僅在於明顯的生出了帶利息的資本之「秘密的性質」。

這就是說，陸克的確仍然是重商主義者。關於貿易均衡的重商主義的說教，對他的確是難以忘

●同上三七八頁。

●同上三九頁。

却的東西；但是他會以極非重商主義的辦法去處理許多的問題。例如，拿他的貨幣學說來看吧。他把金銀——金屬貨幣的價值視為想像的或條件的東西。從而卡爾說這是「和所謂只有金銀才握有真的價值的重金主義之主張相對抗的最初之粗野的對立形態。」

但是這並不妨碍陸克成爲鑄造重量不足之鑄貨的激烈反對者，而要求國家以重量完全的鑄貨支付其負債。

當時在流通界出現了磨滅的，重量不足的鑄貨，其結果，銀一盎斯的市場價格高漲到其鑄貨價格以上。詳細來說，即雖然在法律上規定一盎斯銀子中以全部鑄造五先令兩便士，但實際對於一盎斯却給予六先令三便士。因爲事態如是，所以便從流通界中消失去重量完全的鑄貨，它被作爲鎔毀的原料而販賣，只有重量不足的鑄貨殘存在流通界。除去銀的市場價格及其鑄貨價格之差的確立的方法有二：（一）使重量不足的鑄貨合理化，換句話說，以一盎斯的銀子鑄造六先令三便士；（二）把重量不足的鑄貨驅逐出流通界，使重量完全的鑄貨代之而流通。財政部長勞倫茲（一六五二—一七二四年）主張第一種手段，陸克則主張第二種手段。第一種手段雖然對於國庫，結局對於納稅者有利，但對於國債所有者並沒有利；第二種手段則適得其反。

●卡爾：政治經濟學批判。

認識論學者陸克是概念論者，同時也是金屬論者，他一方面主張貨幣的價值不過是想像上的或條件的東西；而另一方面，則理解了要求貨幣之完全的金屬內容，換句話說，要求重量完全的鑄貨的方策。因此，事實上他又證明了「布爾喬亞的悟性就是人類之規範的悟性。」

陸克又可算作貨幣數量論者之一，成爲此種理論之方法論的基礎的，是貨幣不過爲流通手段的主張。（關於此事，後面還有極詳細的論究。）所以就在此處陸克也是和重商主義相背離的。這就是說，他關於貨幣數量說也仍然站在動搖的立場上。「此種見地（所謂商品的價格依存於正在流通的貨幣量之見地——洛森堡）——卡爾說——或爲陸克所肯定，或爲陸克所否定。」●

其次，兩者是相互關聯着，換句話說，陸克在貨幣概念論和貨幣金屬論之間的動搖，當然不得不把他導入對於貨幣數量說的動搖；這就是說，因爲陸克把貨幣數量說從其貨幣概念論中導出來的緣故。卡爾說：「陸克端正的述說着金銀之無價值性和金銀之價值由於量的決定相關聯。」從而卡爾從陸克的著作中引用如下之處：「因爲人們同意於把想像的價值付與金和銀……所謂這些金屬的固有價值，畢竟是不外於分量。」●

●前揭書，五四二頁。

●卡爾資本論第一卷，英譯一三〇頁。

都德里·挪爾斯(Dudley North)(一六四一——一六九二年)

都德里·挪爾斯主要是和國際貿易有關係的大商人。抗根如下的寫道：「長期間住於君士坦丁堡而為商人的挪爾斯，在他之後，國際貿易的利害帶着極端的個人主義和世界的市民權，才在英國的文獻史上開始出現。基於這兩種東西，它便和國民經濟的利害相對立。」<sup>①</sup>

關於與「極端的個人主義」、「世界的市民權」、「國民經濟的利害」相對立等等的論究，所有這些花言巧語，都是使既成之過程的意義曖昧而歪曲，這自然不能不拋棄重商主義的理論和實踐，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從而資本主義無論在深度上無論在廣度上都加以發展——轉而為對於資本主義的桎梏了。實際生活上和英國的世界貿易密接地相結合着的，從而直接體驗到重商主義之拘束的挪爾斯，特別在國外貿易方面和當時的著作家相結合而與此種桎梏相鬥爭了。<sup>②</sup>

●抗根前揭書二一六頁。

●「國外市場之所以必要者，——依里奇寫道——與村落共同體、世襲財產、種族領土的區劃或國家等之限制所拘束的諸種舊生產方式相對立而向無限制擴張的傾向，對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是固有的緣故。」（全集二卷）國外市場和國內市場一點也沒有矛盾，並且國民經濟也沒有矛盾。資本主義是把其內外市場作為兼併的全體，對立於先資本主義的經濟形態。

挪爾斯和陸克同樣，本質上都走着他們之前的培蒂所曾开拓了的途徑。卡爾說：「拿挪爾斯和陸克的著作來和培蒂的著作……相比較來看時，他們是依存於培蒂的，特別顯著的是他們關於法定利息之確定和鑄貨之改造等的論究。他們的著作和培蒂的著作有直接的關係，他們把基礎建立在培蒂的上面。」<sup>①</sup>

挪爾斯對於利息取得的正當性，與培蒂及陸克同樣，亦以地租為根據而論究。但是，與其說他在理論上去精密地論究，毋寧說他要在實際上去進行議論。「像土地所有者出租其土地似的——他說——雖然有資本而缺乏在商業上使用它的熟練而且厭惡和此工作相結合着的煩勞的人們出借其資本。那時他們所受到的東西，便被稱為利息。但是和土地所有者之所得是土地地租同樣，它不過是貨幣利息。」<sup>②</sup>挪爾斯甚且把利息和地租的同性質，基於諸國的國語上所謂「土地的出租和貨幣出租用同一語而表現」的事為根據。他更進一步說利息必須高於地租，蓋以地主并不冒什麼危險——佃戶不能奪去其土地——而債權者在情勢不利的場合就要失掉其全資本的緣故。

關於決定利息率的問題，挪爾斯比培蒂及陸克顯著的前進一步。培蒂和陸克使利息率依存於

① 卡爾：剩餘價值學說史。

② 同上，四二頁。旁點是卡爾加的。

貨幣量，他使牠依存於借貸資本的需要供給。「如果——他說——借與者多於所借者，則利息率便低落。」<sup>①</sup>由此出發，挪爾斯把商人對於高利息的不平轉到別處。「低利息並不使商業活潑，隨着國民之商業的繁榮，資本的過剩是使資本利息低落的。」<sup>②</sup>

從而卡爾也正當的評言：「挪爾斯開始正確的理解了利息。」<sup>③</sup>利息的本質——利息向剩餘勞動的還元，被陸克極好的極銳利的表式化了。但挪爾斯的功績則在於沒有把利息和貨幣相結合而和變成了資本的貨幣相結合的這一點上。這樣，關於資本，關於資本和貨幣的不同，他指示出很好的理解法。挪爾斯嘲笑着隱匿貨幣的人們：「無論誰——他說——由於以金和銀器等之形態保有其全財產的不能變成更富裕；不如說他由此而貧窮。只有其財產正在增加着的人們才是最富的人。此種場合，不問其財產是被怎樣形成的，由於租出去的土地也好，由於附上利息借出去的資本也好，或者由於投資於商業及工業的商品也好。」<sup>④</sup>

卡爾說：「古典經濟學最初的發見之一，是貨幣的貯藏和增殖的相反，換句話說，是作為資本之貨幣的敘述。」這「最初的發見」如上列引用文中的敘述得以明白，是由挪爾斯而被極確切的表

① 同上，四三頁。

② 同上，四三頁，旁點是洛蘇堡加的。

③ 同上，四四——四五頁。

式化了。

在對於利息之強制的規制的反駁上，挪爾斯比培蒂和陸克也更爲首尾一貫了。這就是說，因爲他關於此問題的見解和他對於經濟生活之發展的一般的見地相結合的緣故。把挪爾斯算作和重商主義之貿易均衡論相斷絕而要求了完全經濟自由（也包含國外貿易的自由）的最初的一個英國經濟學者，這是得當的。在挪爾斯方面，重商主義的渣滓已經很少，但是與其說他是理論家，毋寧說他是實際家和經驗家。

與其說是理論家，毋寧說是實際家的挪爾斯，也把那種使重商主義者急激感亂的貨幣問題解決了。他發問：「呼求着貨幣的人們，要求什麼呢？」從而述說對於貨幣缺乏的人民之種種的不平；指出他需要的并不是貨幣而是別的東西。對於乞食必要的是生活資料，對於地主必要的是交納債務，對於批發商人和小商人必要的是賣出自己的商品而買進其他的商品。所以挪爾斯下了如下的一般的結論：「因爲貨幣……是買賣的共通（Common）尺度，所以想賣什麼東西而未發見它的買方的人，無論誰也要俯首相信他的商品未發見販路的原因乃國家中貨幣的缺乏；這雖然是到處對於貨幣缺乏的不平之聲呼喊的所以，但這是大大的錯誤。」

●同上四四頁。



在挪爾斯的話裏面還沒有關於貨幣流通法的理論的表式化，但對於貿易均衡的重商主義的說教，已在純粹的經驗上放出了不信仰之矢。

如果根據挪爾斯的見地來說，是不會有貨幣不足的事情。因為貨幣這東西和商品同樣，「由過剩地握有它的人們拿去，他便不足，或者被移讓到需要它的某地方的緣故。」●而且貨幣的過剩部分已經不是貨幣了，「只不過是金銀本質，或只作為這種東西而處理。」●

事實上，挪爾斯是把貨幣還元於商品的，但作為貴金屬之特殊性質的結果貨幣擔任了商品流通上許多的機能。貨幣的這種解釋的長處，在於他從一切物神崇拜的觀念中解放出來的一點上；其弱處，則在於作為價值之絕對形態的，作為價值之定住的貨幣的本質未弄顯明的一點上。但這是古典經濟學所立脚而且鞏固自己力量的根本陣營（在次章以下我們再歸回到這個問題來論究吧。）

挪爾斯的主要功績——從而由此決定了他在經濟學史上的地位——是他開始把經濟學看作由於內在的法則在自然上發展着的過程。他縱然不會意識的把這件事加以表式化，但這是橫置於其全思想所隱匿的前提的基礎。他對於國家權力對經濟生活之干涉的非妥協的敵對的態度，實

●●同上，四四、四五頁。

立脚於此。抗根之所謂「世界的市民權」也由來於此。「只關於商業——挪爾斯說——全世界形成所謂單一的國民或單一的民族；一切各個國民，如單一民族的每個人一樣，都是平等的。」<sup>①</sup>

經濟作為自然的過程發展而外，沒有可以設立國民的障壁之餘地。由這一點生出如下的提說：「在國民方面，不利的貿易是不能存在的，因為如果有這樣的事，則人們便要拋棄它了……」<sup>②</sup>

又說：「無論那一種政府的法律都不能決定貿易上的價格，它是應確立於自然上的；如果這種法律存在着的話，則它就要變成對於貿易的大妨害，這是值得非難的。」<sup>③</sup>

最後還有一個命題，即謂：「無論什麼國民都不能由國家的方策變成富裕，只有和平、勤勉和自由，才能造出商業和財富。」<sup>④</sup>

亞丹·斯密對這些關於經濟自由的諸命題，如後面考察他的體系時所呈現的一樣，在本質上並沒有附加過什麼新的東西。

① 岡特爾：英國的自由貿易第一分冊，三〇頁。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旁點是洛森堡加的。

約翰·勞 (John Law) (一六七一——一七二〇年)

如果以爲挪爾斯對於許多問題是亞丹·斯密的直接的前輩，那麼反之勞氏之經濟的見地就是和古典學派的見解完全對立的。這就是說，在經濟學史上不能忽視約翰·勞。他是一個重商主義崩潰期中色彩最鮮明的人物。到此我們所考察過的著述家們，多由於新見解的發展，乃至由於對重商主義之說教的直接的批判而援助了重商主義的崩潰，由是在古典經濟學上打開端緒或清除其道路。反之，勞氏則由於使重商主義適用於新的諸條件而加以近代化，助進其崩潰。由是，結局勞氏在荒唐無稽上結束了重商主義。

舊式重商主義者們神化貨幣物，跪拜於貨幣物神之前。勞氏神化信用物，於是他成了在信用中看到資本創造力的近代的布爾喬亞之俗流信用理論的化身父母。在勞氏的時代，信用已經形成了顯著的發達，極端發達的銀行制度出現了；流通界中，隨着也流通了金屬貨幣，私人單據，銀行券和國庫證券。在商品貨幣流通的基礎上所成長的信用，現在在此流通中活動着，於此，便生出信用物神崇拜中所表現的新的幻想。約言之，貨幣物神崇拜得由信用物神崇拜所複雜化了。

勞氏和舊式的重商主義者們相對立，並不跪拜於金銀之前，但他也不同意於陸克所說的金銀

的價值不過是想像的或條件東西的話。「不同的諸國民怎樣——他問——能把想像的價值附與同一事物呢？……又怎能維持這想像的價值呢？」從而他解答說：「銀子由其所有的使用價值換句話說，由其現實的價值所交換了。依靠其作為貨幣而使用的使命，牠的確取得了一種追加的價值。」<sup>①</sup>

這樣，勞氏「發見」了銀貨在其作為銀的價值之外，還握有作為鑄貨之追加的價值。此追加的價值和銀的價值是無關係的，因為它是由銀子担任着的諸機能所造成的緣故。由此，便得出這樣的結論：紙幣也可能有這種追加的價值。然而因紙幣乃由銀行所發行的，（勞氏假定紙幣只由銀行所發行，）從而銀行能造出貨幣及財富。

這是所謂勞氏的「體系」的骨幹。當然，勞氏已知道過：如果沒有商業、工業、農業，僅由銀行之發行，絕不能增加財富。但是他主張只由他的「原理」所組織的銀行才能給全經濟以生命和活氣，換句話說，只此才是全國民經濟的動力，才是創造力。

所謂勞氏的原理有如下列：

（一）最良的貨幣是紙幣，它沒有重量的減少，其價值比金屬也更長久，攜帶方便，以為流通手

① 在事實的材料這一點上，看有與味的抗根的著作約翰·勞吧。

段最稱便利。最後，它沒有逃出國外的事情（牠是真的國民的貨幣）。

（二）金屬的流通把國民經濟的發展關閉在狹隘的界限內，使它依存於貴金屬的存在額數。國民經濟必須從這種「金屬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從而這種完成須由造出新貨幣的信用力才能。

（三）必須在不動產的保證之下，設立發行本行銀行券的特別銀行。勞氏把不動產視為最堅固「不朽的」價值。所以不動產依靠着信用轉化為流通自在的鑄貨。

「雖然勞氏想在故國蘇格蘭實現其銀行改革，但在此處或者在英蘭，都不能得到共鳴者。隨後他便把其改革的活動移到法蘭西去。當時法蘭西受到死於一七一五年的路易十四世之紊亂的統治之後，財政破壞達於極點。一七一六年他組織了適應於他的「原理」的銀行；那是使國庫和國民都可以「富足」的。雖然銀行在前代未聞的投機和交易所的熱病的昂奮之雰圍氣中存續了四年的光景，但終竟在世界上由於變成有名的破產和醜聞而閉其「生涯」之幕。」

不止於由勞氏之「體系」所設立的銀行破產了，同時「體系」自身也破產了。換言之，被勞氏所近代化的重商主義破產了。這給予經濟思想之後的發展（就中在法蘭西）以顯著的影響。它

● 鴻氏前書藝場照。

如後來見到似的，是促進了重農主義思想之發生和發展的諸要因之一。

達衛德·休謨 (David Hume) (一七一——一七七六年)

休謨和挪爾斯同樣，以重商主義之公然的批判而登場了。和他的名字最先結合着的是貨幣數量說，這是直接與重金主義的及重商主義的體系相對立的。「自從美洲的鑛山發現以來，隨着金屬貨幣之增加而發生的商品價格的騰漲，形成他（休謨——洛森堡）的學說之歷史的背景，他向重金主義及重商主義的論戰，供給其實際的動機。」<sup>①</sup>

但是休謨並非這個學說的創始者。十七世紀的許多意大利的經濟學者，有名的法蘭西著作家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一六八九——一七五五年) 以及陸克等它早已啓發過了。卡爾如下的說道：「仔細的來比較王德林特的論究和休謨的『論集』時，絲毫也不容懷疑的是休謨曉得王德林特的這個重要著作而利用了。」<sup>②</sup>所以王德林特主張「無論在什麼國家，民間的金銀增大時，隨而物價騰貴；從而無論在什麼國家，金銀減少時，物價也不得不以之爲比例而低落。」<sup>③</sup>但休謨付

① 卡爾：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文本一八八頁，旁點係洛森堡加的。

② ③ 卡爾：資本論，英譯一八九頁。

與這個學說以最大的秩序，極要領地敘述之，且由其權威幫助其不少的普及，同時休謨又把此學說作為他的全經濟的見解之樞軸。

貨幣數量說也是商品價格的理論，如果根據這學說來說，商品價格這個東西，不問是金屬貨幣或是紙幣，一般的都由貨幣在流通界中的分量所決定。從而貨幣在流通界中的全量，代表着商品在流通界中的全量。由此得出如下的結論：商品量不變而貨幣量或減或增時，在第一種場合，商品量於較少的貨幣量上表現出來，即價格低落；在第二種場合，商品量於較多的貨幣量上表現出來，從而價格騰貴。

休謨確信本說的正確，認為是完全自明的真理。「實際——他寫道——很明白的，貨幣不外為勞動及商品的代表者，不過是那些東西的計算及評價的手段。在貨幣豐足的場合，為着代表同一的商品量，便需要較多的貨幣量，所以貨幣豐足這件事，無所謂有益和有害——這恰和一位商人清理簿記時不用號碼簡少的亞拉伯數字而用號碼繁多的羅馬數字於其商業上之帳簿上不發生什麼變化同樣。不，所謂貨幣之豐足，和羅馬數字同樣，是煩瑣的，不便的，因為它會使貨幣的輸送和保管發生困難。」

●卡爾·政治經濟學批判，中譯本一九一頁。

休謨議論的出發點，如上列引用文中所述，是貨幣「乃勞動及商品的代表者，僅是這些東西的計算及評價的手段。」所以把休謨的議論歸納為形式論理學時，便形成如下的三段論法：

(一) 貨幣代表勞動和商品；

(二) 貨幣和勞動以及商品的關係，無非數字和數的關係；

(三) 所以貨幣量的變化無非記數之方式的變化。

在這三段論法上，大前提和小前提完全錯誤，所以結論也不正確。貨幣是商品（就中也包含着勞動力——不是勞動——這樣的商品）的價值尺度，這是正確的，但說貨幣只是價值尺度，那就錯了。因為貨幣之為價值尺度者，乃貨幣自身有價值的緣故。結果，一切商品在相對的價值形態上表現出來，貨幣在等價形態上表現出來。從而於價值尺度的貨幣和數量記號的數字之間，絕沒有其通物的存在。

商品價格（在金或銀中所表現出來的商品價值）和商品的價值為正比例，和金銀的價值為反比例。在金銀的價值不變的場合，貨幣量由商品的價值所決定；在商品的價值不變的場合，貨幣量由貨幣自身的價值所決定；因此之故，只要銀的價值比金的價值較低，則銀價格便比金價格較高。然而，從休謨看來，商品的價值和貨幣的價值都不存在。「他（休謨——洛森堡）使無價格的商品和



無價值的金銀賤進流過程，所以他絕不述及商品的價值和金的價值，只不過就兩者相互的數量加以述說而已。」<sup>①</sup>

此學說之「歷史的背景」如我們所已經知道，是「美洲的礦山發見以來，隨着金屬貨幣量的增加，而招商品價格的騰貴。」但休謨實因「使無價格的商品和無價值的金銀賤進流過程」所以不理解這歷史的事實，并且不能去理解。休謨由於貨幣量增加後發生商品價格增大的事實的觀察，便下了如下的結論：後者是由前者所引起的。他之沒有提出當時金屬的價值曾經有無變化的問題，也是當然的，因為由他看來，金屬的價值並不存在的。所以美洲礦山的發見，馬上使貴金屬的價值減少。「在十六世紀及十七世紀中，金銀之量不僅有所增加，同時其生產費用也有所減少——休謨由於歐洲諸礦山的倒閉而得明瞭這樣的事。」<sup>②</sup>（歐洲的諸礦山因為不能和生產費極廉的美洲礦山相競爭而倒閉了。）

休謨由於否定價值（無論商品的價值或金銀的價值）而犯了方法論的極端誤謬。「關於流通手段之數量及商品之價格變動的關係，科學的研究必然的要把貨幣原料的價值作為既定的而前

① 卡爾：政治經濟學批判，中譯本一九三頁。

② 同上，中譯本一九二頁。

提着。然而休謨則專一考察着貴金屬本身之尺度中的革命時期，也就是在價值尺度中的革命。」<sup>①</sup>

把貨幣原料的價值作為既定的而前提着的事情，須認識此價值者才能做得到。然而從休謨看來，最初這種價值并不存在。所以在貨幣金屬之價值的否定上，負着決定的任務的是「實際的動機」。

——「重金主義的和重商主義的體系之論戰。」關於此，卡爾如下的寫着：「重金主義及重商主義只是認到在流通之結晶產物的形態規定性中的貨幣，古典經濟學首先在其流動的形態中去把握貨幣，作為在商品轉形其自體內部中創生而又消滅的交換價值形態去把握，這完全是事理之當然。所以和商品流通專在  $M—C—M$  的形態上去把握及後者復專作為販賣及購買行為之過程的統一去把握同樣——貨幣和其作為貨幣的形態規定性相對立，在作為流通手段之形態規定性上加以承認。假如流通手段本身在鑄貨機能中被孤立化時，則牠便轉化為價值符號……」<sup>②</sup>

重商主義者和古典學派都是片面的理解貨幣，前者在貨幣之中看到蓄積手段，退藏貨幣——「流通之結晶的產物」；後者在貨幣之中看到流通手段，怎樣經過的，不斷的從這一個人贖到另一個人，以及在結束其機能之後而行消滅的東西。在現實上，貨幣也有其各方面；所謂重商主義者及古典

① 同上，中譯本一八八頁。

② 同上，中譯本一八七頁。

學派之理解是片面的，便在於兩者都沒有在其全體的姿態上以及在其形態之全多樣性上去理解現實。

古典學派片面的理解貨幣，但他們沒有使這理解達到論理的極端的發展。所以他們的商品價格之理論和貨幣的理論都包含矛盾，就中後者在他們的體系中也是最弱的一環（關於此點將於該章加以論究。）休謨之經濟的見解雖然還有很多沒有到達的事，總之，他一味的向着古典經濟學方向前進，把他的片面的貨幣觀，臻於俗流的理解。因此，貨幣和商品沒有價值而進入流通界，所謂價格不過是貨幣量和商品量的關係。

貨幣之不正確的理解，是以資本主義的生產之不正確的理解為前提的，即它立脚於視資本主義為以欲望之滿足為直接任務的生產這種思考方法之上。唯其如此，便又生出了  $W—G—W$  和  $M—C—M'$  之原則的不同之無理解，以及把貨幣只看為流通手段和價值符號的見解。

休謨以為商品的生產及其流通的全意義在於使欲望較為完全地得到滿足這一點上。他論究商業的全論策，以宣揚此種「真理」為任務。休謨簡約自己關於國外貿易的見解如下的寫道：「簡單一句話，輸出入發達的國家比只以國內產物而滿足的國家，不得不具有多數的生產業，尤其是以製造奢侈品和美術品為目的的生產業……各個人所受的恩惠只在這商業交易可能使他們的趣

味和願望得到滿足。」（旁點係洛森堡加的）休謨就在論商工業之一的特徵時，也提出這種無稽之談。他說：「所謂商業和工業，畢竟不外乎在平時為滿足各個人的需要和願望而建立的勞動資本（想係指被蓄積的勞動——著者。）」

對於這樣去「理解」資本主義的生產及流通的休謨，很容易駁斥關於貿易均衡的重商主義者的說教。他和挪爾斯同是自由貿易論者。但他是站在貨幣數量論上去進行論究。金銀之流出國外恐無必要，如金銀減少則商品低落，如商品價格低落便助長商品輸出，妨害輸入，其結果貨幣復歸於國內。而且不應把很多的貨幣保有在國內，因為商品價格提高反而助長商品輸入，妨害輸出，為着輸出入差額的解決和救濟，便難以避免貴金屬之流出。休謨從同一理由出發，看到富裕的國家——具有多量之貨幣的國家，在廣大的市場上和貧乏的諸國家相競爭是困難的，因為前者的勞動和商品比後者較高的緣故。

使貨幣數量說加以發展，由此引出最極端的，或如他自身所說似地引出異說之結論的休謨，由此見地出發，碰到難以說明的事實。商品價格的騰貴，並不是直接繼續在貨幣數量於流通界中增加之後而生出的事故。（此種事實應和貨幣數量說怎樣調和呢？）而且貨幣數量的增加——尤其那顯著的增加，喚起工商業的莫大生氣，這也是和上列學說不一致的事實。因此休謨對此學說不得

不從事極本質的訂正即在國內貨幣數量增加的瞬間它對該國家是有利的這就是說「爲說明此種現象起見——他說——必須記住一列的事：商品價格的騰貴雖然由於不能避免金銀數量之增大的結果，但它並不是直接繼此增大之後而生出的。貨幣在定期間流通國內，不得不使社會之諸種階級感受。其作用……如果很據我的見解來說，則金銀的增加只有在貨幣數量增大和物價騰貴間的時期內，才是對產業有利的。一定量的貨幣輸入到國內，它不是最初從就被分配在多數人們的手中的，而是首先被藏於少數人們的金庫中，後者努力直接把它使用在有用的方面……這使他們可能使用比從來較多的勞動者，而這些勞動者並未達到想要比從來較高的工資——他們拿到這種良好的報酬已經滿足了。

但是正由於此，休謨才不自知的拋棄其貨幣數量說，而陷入於始終不變的迷混中了。如果貨幣

●旁點是洛蘇堡加的。所謂「使感受」的表現是很曖昧的，牠給予了使若干著作家把休謨的貨幣無量說和孟德斯鳩及李加圖的學說相區別而命名爲「心理學的變種」的口實，反之，他們把孟德斯鳩和李加圖的學說則命名爲「機械論的變種」。站在這種見地上的人，有卡才諾保姆（見其所著貨幣及信用論第二版九六、九七、九八頁以下）。但這是註釋者們的發明。休謨把商品價格看做貨幣量和商品量的關係，從而，正如卡才諾保姆自己所認識的，是「機械論的變種」。

的過剩部分能利用爲資本，而且設法去利用時，爲什麼它不在出現的時候去利用呢？這將是生產的擴張只發生於貨幣過剩的時候，其後就實行單純再生產嗎？但是縱然允許這樣的情形，即從休謨自身的見地來說，他仍然是不正確的；其原因是：如果貨幣過剩喚起當時生產的擴張，從而喚起商品量之增大，爲什麼它在「此期間之經過後」必須喚起商品價格的騰貴呢？縱然貨幣量增大了，但增大過的商品不能適應它嗎？最後休謨在完全變動的情態上考察資本的運動，即是說，被預先借給了的貨幣不復歸於資本家的地方，它不復歸於預先借給它的「少數人們的金庫」中，從而在全體人民當中或多或少的平等來分配。

事實上休謨的貨幣數量說，開始就帶着完全不同的意味。他雖然由於努力指示出貨幣量增大時價格必須騰貴的事，而導入新的一個契機；但這個契機，便至本質上覆沒了他的全學說。增大了的貨幣量，如依休謨的話來說，則漸次的撒布在全人民當中，蓋因爲較多的勞動者被引入生產，地主對於生產物發現較大的市場，及商業被招致生氣的緣故。這不是意味着人民購買力的需要之增大嗎？從而價格的騰貴，這是因爲需要提高，并非因爲在流通界中出現了較多的流通手段。貨幣數量的增大，甚至在休謨的論究中只不過作爲刺激而建立罷了，物價騰貴的真正原因，則是作爲購買力增大之結果的增大的需要。

所以休謨陷入於這樣的結果，作為解救其貨幣數量說而從自己的說法中剝奪他最初插入其中的全內容，即商品價格是商品量和貨幣量之關係的主張。他和重商主義的全論爭，失却了一切的根基，其原因是因為即使是要求國內貨幣增加的重商主義者們，也常常指摘出國內貨幣的增大給予生產、流通，以及全國民經濟生氣的擴大。甚至約翰·勞也都由這種考察為其銀行券發行案的基礎。

其次要指出的是：休謨雖然激烈的批判重商主義，但在許多的問題上，他還沒有從當時已經變成時代落伍的重商主義的見地中充分地解放出來。這在他的商業論中特別顯著。休謨說：「所謂參加生產的商人，有如為生產而遍及於國家各隅的運河。」他這樣激賞了商人之後，便如下的結論着：「所以，一切職業中，只有商業具有使資本收益性增大的能力，換句話說，只有商業強化產業活動；同時，由於養育貯蓄心，也可能使社會各個人取得對於產業極大的影響力。」

在反杜林論中寫着對於休謨完全正當的評價。恩格斯說：「這種『落伍』，培蒂等雖然已經好久就從那裏脫軌了，然而他依然說以商人——即使是舊式——為生產的第一個原動者，而表現於這種場合。」

① 休謨立脚於其貨幣無量說而反對銀行券發行者，特別是依於勞氏說的發行案。

② 恩格斯：反杜林論德版二五七頁。

再說一說休謨的利息論和信用論吧。培蒂把利息名爲貨幣租金，反之，休謨把地租名爲「土地租金」。培蒂和休謨之間的共通點，是兩者都把租金的根據求之於地租。休謨把地租的發生正當地作爲「某些人們握有土地的大分額，其他人們的所有地由於狹隘的限界所限制，第三種人們全然沒有財產」<sup>①</sup>這種事情的結果而說明着。

他使利息的高低依存於仰借者方面的需要和放債者方面的供給。這如我們所知道，已由挪爾斯說出了。休謨的利息論的嶄新之處在於利息率和利潤率被放置在相互關係上。他把這依存關係如下的表式化：「無論誰，如果他要對其資本獲得高度利息，則決不以低度利潤而滿足；從而無論誰，如果能由其資本得到高度利潤，則不以低度利息而滿足。」<sup>②</sup>

這就是說，休謨把利潤率對於利息率的優勢斷然的加以否定。他說道：「檢討低利息和低利潤的何者爲原因，何者爲結果的方法，並沒有何等的用處。」<sup>③</sup>我們要說，如果沒有正確的價值論和正

① 卡爾·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一卷。

② 同上，四八頁。

③ 同上，四九頁。



確的剩餘價值論，則檢討何者爲原因何者爲結果的方法，實際是無用的。從休謨看來，利息并不是借者方面由於被借入的資本之利用而得到的利潤的一部，所以他只能確認兩者的相互關係而已。

馬希把利息的性質很正確的理解了（馬希的著作比關於利息的論文所採錄的休謨的論集早二年出世。）他如下的寫道：「如果借者對於借來的貨幣作爲利息而支付，而它們可以獲得利潤的一部，則利息不得不由此利潤所決定。」<sup>①</sup>如卡爾所確認，休謨雖然從馬希那裏借用過他的利息論，但是休謨却把它收到自己派別中去了。<sup>②</sup>

① 如果就休謨對於信用的見解來說，他把它表式化在下列的命題之中：「這事情（所謂貨幣豐足使物價發生騰貴的事情——洛森堡）必然使我關於對普通的國民也認爲無條件地有利的銀行及紙幣發行的利益而抱疑問。」他又如下的極決定地表明着說：「把取得了的貨幣都藏於金庫中，而決不使貨幣量在流通界增加，恐只有這樣的銀行，才能說是最有用的銀行吧。」休謨並不反對借貸及借貸資本。不和他的同時代者同樣，他把利息視爲完全合法的現象，在理論上找出它的基礎。

② 同上，五一頁。

③ 卡爾資本論第一卷，英譯五四〇頁。

但是他反對銀行券的發行及幫助發行的信用，休謨對於銀行的見解和誇讚銀行之任務的勞氏之見解直接相對立，他則極端加以藐視。成爲這個藐視的原因是，是貨幣數量說。

傑姆斯·斯圖亞特 (James Stuart) (一七二二——一七八〇年)

培蒂、陸克、挪爾斯、休謨而後，重商主義的理論體系，根本上被克服了。但是實際上在經濟政策的方面，它還頑強的存續着。傑姆斯·斯圖亞特以重現之於理論爲任務。他在其主要著作經濟學諸原理的研究（一七六七年刊）中，把重商主義的見解用體系的經濟學講義的形式述說着。

的確，斯圖亞特不能說不全然受資本主義的發展及經濟思想之發展的影響。他不把重商主義單純的再生產，而在許多的問題上把它合理化。卡爾分析斯圖亞特的利潤論如下的說道：「從而在這一點上，斯圖亞特是重金主義之合理的表現者。」現在，我們要來看一看他在其他的諸問題中把重商主義如何的合理化？

爲重商主義之最高表現的斯圖亞特的著作，給其長處和短處雙方以極完全的特徵。在方法論上，重商主義如前章所曾述說，承認形式優於內容，流通優於生產，這樣的思考方法，本質上是錯誤的。

●卡爾·剌餘價值學說史，旁點是卡爾加的。

但雖然如此，而對於與它對立的機械論的思考方法，在更正確的去理解資本主義的生產之歷史的性質這一點上，則有一個長處。在貨幣形態上的交換價值中集中注意力的重商主義者們，把貨幣還元於單純的流通手段，比於忽視  $W-G-W$  與  $W'-W$  間之原則的差異的經濟學者們，能夠更好的理解這些範疇的歷史的性質。例如，在資本主義的生產中，看到為滿足慾望之生產的休謨，和以資本主義的生產之目的視為在於「貨殖」的重商主義者們相比較，在歷史的現實的理解上，後者比前者優越得多。

在重商主義學說的發展上，形成其最高峯的斯圖亞特，關於布爾喬亞的諸關係之歷史的性質，也指示出最大的理解法。於此，斯圖亞特從其社會的出身和地位來說，是屬於封建的貴族，在其信念上是保守主義者，是沒落的斯圖亞特家的歸依者，這些事情也關與而有力。這使他對於布爾喬亞社會，立於反對的批判的立場上了。卡爾寫道：「在其成為貴族的許多點上和十八世紀相背馳而立於歷史的立腳地的斯圖亞特，並未陷入了這樣的偏狹性。」（此處所說的偏狹性係指使布爾喬亞

●傑姆斯·斯圖亞特在卡洛基的戰鬥（一七四五年）後，逃到大陸，輾轉居住於法、德、意、荷諸國，在亡命生活中撰述其著作。

●卡爾：政治經濟學批判。

亞的諸關係還元於人性之自然的諸性質的偏狹性。)

斯圖亞特對於歷史性的理解，曾在形成交換價值的勞動的理解中指示出來。卡爾對於這問題，如下的寫道：

「斯圖亞特比其前輩及後繼者卓越之處，是他把交換價值上所表現的特殊之社會的勞動和生產使用價值之現實的勞動，斷然的加以區別之點。他說，我把由自己的推銷而造出一般的等價物的那種勞動，名曰產業。他把它作為產業的勞動不僅從現實的勞動中來區別，并且也從勞動之其他社會的諸形態中來區別。此種勞動，在他看來是和古代以及中世之形態相對立的布爾喬亞的勞動形態」。

的確，斯圖亞特的價值論，其自身是不可言喻的混亂。他把商品的價值由三個要素來規定。即是：

(一)「一國的勞動者在一日、一週間、一月等等中間平均能生產的商品數量」(二)「為滿足生活資料的價值及勞動者之個人的欲望起見，與為其職業上備辦必需的工具起見所需要的諸費用的價值」(三)「原料的價值」。

斯圖亞特使完全不同的要因合成一起了，他把勞動者的勞

●卡爾：政治經濟學批判，中譯本四七頁。

●卡爾：剩餘價值學說史。

動作爲第一個要因而提出；第二個要因，在他看來，本質上是工資和固定資本的清償費；第三個要因，是流動資本的不變部分。

卡爾如下的說明着斯圖亞特的混亂：「在他（斯圖亞特——洛）看來，經濟學之抽象的諸範疇，還在於與實質的內容相分離的過程中，從而表現爲模糊的不定的；交換價值的範疇也依然如此。」<sup>①</sup>一方面，交換價值是布爾喬亞的勞動之表現，另一方面，他曉得了它（交換價值——譯者）依存於事業家現實的支出和其生產費用。所以他在把一切東西合併爲形成交換價值的各個要因中，表現出最好的逃避的道路。

斯圖亞特把上述的三要因所形成的價值和商品販賣時所交付的價格加以區別（在此價格中也包含着利潤）而名曰實質的價值。所以所謂利潤，是實質的價值以外所取得的東西，從而是流通界中依存於需要供給所生的東西。所以斯圖亞特的利潤論是純粹重商主義的理論。但是他理解了：在流通界中造不出利潤，而且不能造出，在流通界中不過發生着從某人手中到他人手中的財富的移動——從而在這一點上，斯圖亞特有導入重商主義的利潤論中的觀念之本質。這是他把由「推銷」而得的利潤名曰「相對的」，而給此以如上之比喻的特徵的所以然。那指示出在參加者

①卡爾政治經濟學批判中譯本四六、四七頁。

之間，富的平衡動搖不定，但它對於一般的財產並沒有給予何等的追加。」<sup>①</sup>

斯圖亞特把招致「追加一般的財產」的利潤名曰積極的利潤。但他注意的中心則是相對的利潤。然而後者意味着對於一方面人的獲得，同時是對別人的損失；所以今後出場的重商主義者，便引出如下的結論：國內商業不能為財富的源泉；得為財富之源泉的，只有國外貿易，那也只在貿易均衡表示出超的場合。但由此生出如下的結論：在某一個國民和其他國民的貿易上所得到的利益，只在其他諸國民的損失中，在國際貿易中「參加者間財富之平衡的動搖」的利益，常歸結到貿易均衡表示出超的方面。

此結論使斯圖亞特一點也沒有困惑，雖然不得不為着他加以辯白，但他甚至沒有想隱匿此結論。他以其後保護貿易論者所看不到的明快，如下的說道：「國民使用外國商品的國家機關，對其國民必須指教出自己供給其一切需要。反之，國民為國外消費而生產商品的政府，由於使使用外國商品的國民的這種努力無效，而同時欲使該國的臣民了解與其在國內市場購買毋寧從他國購買較為有利，便不得不獎勵有利的販賣。」<sup>②</sup>

① 卡爾：剩餘價值學說史，旁點是洛森堡加的。

② 引自閣鳩爾：英國的自由貿易第一分冊，一三六頁。

因此例如法國政府不得不教其國民自己供給本國的必需品，但英國政府則由英國政府使法國政府的這種努力無效，而不得不使法國人了解在英國購買時比在法國購買較爲有利。所以斯圖亞特以此比喻得到如下的結論：「在此場合，兩國的政治家和以棋盤爭勝負的姿態相似。」<sup>①</sup>

當然，斯圖亞特認爲他所提的「狡猾的」的政策單由和平的手段得以實現的情形，并不是佳好的。他的利潤及貿易均衡的理論，是攻擊的對外政策及商業戰爭的基礎，是合理化；由這些手段使其戰敗國「了解」在戰勝國購買其必要的商品時，比在本國內去生產較爲有「利」這是可能的。就是對於國內經濟政策，斯圖亞特也同樣是乾脆的而且是玩強的重商主義者。他主張國家權力應完全規制國內全經濟生活。他不信任個人的創造性；他反對當時曾經發展的端緒而且適應於正在發展着的產業資本之需要的經濟的自由主義。

堅守重商主義的立場，完全加入對於貿易均衡的重商主義之思攷方法的斯圖亞特，對於貨幣數量說，又必然的不能不加以敵對的態度，且實際他在休謨對於重商主義者們的挑戰中，是親自出馬的。最初此學說關於各個國土間貨幣運動之自己規制的諸結論，是和他所推獎的重商主義的對外政策，以及在過剩貨幣的形態上應予以差額的輸出超過獎勵政策，完全難以相容的。貨幣數量說

① 同上，一三五頁。

復與他關於商品實質的價值及其市場價格形成的思考方法難調和地對立着。

所以斯圖亞特由防禦轉為攻擊。他對休謨的貨幣論下了整個的批判。卡爾嚴勵的評價斯圖亞特關於貨幣流通的研究，而如下的說道：「他（斯圖亞特——洛森堡）是提出這樣問題的第一人，即抑是流通着的貨幣量由商品價格所決定呢？或商品價格由流通着的貨幣量所決定呢？他的說明雖然是關於價值尺度之荒唐的見解，和關於一切交換價值的模糊的思考方法，以及由重商主義之殘存物所混合而成，但是他却闡明貨幣本質的形態規定性和貨幣流通之一般的方法。爲什麼呢？因爲他沒有把諸商品和貨幣機械分開，而把貨幣的種種機能從商品交換自身的諸機能中展開着的緣故。」

這樣的斯圖亞特對於「開始」提出的問題，他好像沒有躊躇的解答說：商品價格並非由於流通界中的貨幣量所決定，反之，後者乃由商品價格的水準所決定。從而「商品的市場價格——他說——由於需要和競爭的複雜活動所決定，這種需要和供給，不依存於金銀量。」關於貨幣的機能，他如下的說道：「貨幣在國內流通中的用途，能還元於借用品的支付和必需品的購買二大項目，從

●卡爾：政治經濟學批判。

●卡爾：資本論。



而總括兩者的是形成現金的需要。」

如上述得明白的，在斯圖亞特方面，則說明着貨幣的兩個機能。他於此雖然沒有附以一個一個的名稱，但無論如何他總是區別着兩者；他的所謂兩大項目，是作為流通手段的貨幣的機能 and 作為支付手段的貨幣的機能。這是卡爾從斯圖亞特身上看出的「貨幣的形態規定性」。

而且斯圖亞特區別着鑄貨和本質銀，稱後者為世界貨幣，於此他也指示出關於「貨幣之形態規定性」的理解。

斯圖亞特也曉得價值尺度的諸機能，但對此正如卡爾所說，則抱着「荒唐無稽的見解。」他的見解的荒唐無稽，乃在於他把價值尺度認為「不外是在求測量被販賣的物品之相對價值上用工夫，由許多相等的部分而成的任意標準」<sup>①</sup>的計算貨幣。

斯圖亞特第一、混同了價值尺度和價值的標準；第二、與此密接相關聯，把價值尺度的機能從貨幣其餘的諸機能——流通手段及支付手段中分離出。他不理解這樣的事情：「只因爲金子曾在交換過程中作為貨幣商品而流通的緣故，所以作為觀念的價值尺度而發生機能，在觀念的價值尺度中，因此而應存着硬貨。」<sup>②</sup>

① 卡爾：政治經濟學批判，中譯本七七頁。

② 卡爾：資本論。

最後我們要附記出斯圖亞特並未會厭惡紙幣（他解之為銀行券之意）的發行。因為它是在信用機構的體制中所發行的，所以貸借期限經過，便復歸於銀行。總之，對於為貨幣數量說之非難者的斯圖亞特，對銀行券的發行，並未喚起何等的不安。硬貨的過剩不引起價格的騰貴，同樣紙幣也並未引起價格的騰貴。他說：金銀的貨幣有的為產業的目的而使用，有的為退藏貨幣而隱藏；反之，紙幣（銀行券）的過剩則復歸於銀行。

× × × × × × × ×

在以上所考察過的諸問題之外，斯圖亞特也研究過其他一串的諸問題，他在其所著經濟學諸原理的研究中，竭力想給予經濟學以一般的解說及方針。例如，他研究人口問題，在此視線之下來攷察蓄積——如果沒有蓄積，人口的增大便不可能。但雖然如此，而他却在重商主義的立場上去處理蓄積。生產物的過剩——滿足日常欲望之後而殘存的部分，必須輸出國外，轉化為貨幣。

當時的經濟學者們，不指出他的名字，而很多「借用」了他的學說。甚至於亞丹·斯密，當利用斯圖亞特的著作時，都不引用他，也不在引證上注出他的名字。斯密在其一封信中，如下的說明着抹殺斯圖亞特的著作：「我對它（指此著書——洛森堡）全然沒有說到，雖然如此，但我抱着這樣的自信：斯圖亞特一切錯誤的原理，在我的著作中都明瞭確當的駁擊了。」●這是極苦惱的辯解。從斯

圖亞特身上借用了許多東西的，是馬爾薩斯及其他的人口「理論家」諸氏。關於此，是卡爾屢次所指摘的。」<sup>①</sup>

斯圖亞特不僅考察資本主義的生產，同時也考察着封建的及古代的生產——常常說明兩者之間的並行關係。

雖然如此，但斯圖亞特的著作幾乎沒有惹引人們的注意，現在已完全被忘却了。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他在其著作中所述說的思想是「後來所表現了的重商主義」的思想。它在資本主義從工場制手工業移行到機械生產開始時，即在為向產業資本之完全的勝利和商人之「生產資本的使用人」之轉化的諸前提開始準備好的時候出現的。

時代使亞丹·斯密跳上舞台，把傑姆斯·斯圖亞特推進了被遺忘的世界。

如卡爾所給予的特徵似的，斯圖亞特是「編製出了布爾喬亞經濟學之全體系的最初的英國人」<sup>②</sup>。雖然如此，但他的學說，結果是難以容受的。就中，給予強力的國家權力之必要理論的「基礎」

① 此信引自約翰·蔚洛拉姆經濟史一八二一年版，一一〇頁。

② 卡爾資本論第一卷。

③ 卡爾政治經濟學批判，中譯本六四頁。

這國家權力在君主主義者撒·傑姆斯·斯圖亞特看來，只用斯圖亞特朝之復興的形式描寫着。所以自由主義的布爾喬亞——就中由於政治的動機——對於斯圖亞特的著作，企圖「抹殺的陰謀」，這事情并非不可思議的。

## 總括

「科學——卡爾說——和其他的建設者不同，它不僅是單單建築空中樓閣，而當前的要務是奠定其基礎，一步步建築出建築物的二層或三層的樓房。」●在重商主義崩潰的時代，「建築物的二層或三層的樓房」建築出來了，但經濟學之鞏固的體系還未達於構成；第一，還未奠定鞏固的基礎，第二，二層，三層還沒有用水門汀打得鞏固，相互間沒有充分的結合。

培蒂曾竭力想奠定這個基礎，企圖把商品的價值由勞動時間去規定。他曾企圖在他所佔據的基礎上建築經濟學之其餘的建築物。但是他所佔據的基礎，也的確是很不安定的，換句話說，在他的價值論中的確存留着幾個沒有解決的大問題。就在建築物全體上，許多的大問題也留而未決。他所

●卡爾：政治經濟學批判，參看中譯本四六頁。

想到的，只有用地租的形態來研究剩餘價值這一點是確切的。

傑姆斯·斯圖亞特曾企圖作出經濟學之體系的講義。但是第一，他的價值論就在他的全「講義」中也是最弱的方面，第二，他的全體系不外是重商主義復興起來的東西。

這就是說，在重商主義的解體期，經濟學的體系還沒有造出，而供給爲這種體系的多數要素的事實，都不能活動。蒐集豐富的事實的材料，發表含有很多有價值的許多的思想，而參加關於經濟學之最重要的諸問題的論爭。

至此，我們已經在年代上結束了從著作家到著作家的敘述。其次關於從重商主義的解體期所得到的一般的遺產，有加以考察的必要。我們所應注意的事，在此時代，不僅是古典經濟學的諸要素，而俗流經濟學的諸要素也被形成了。我們正確的在這一時代中尋求種種俗流學派的祖先，也不是很適宜的嗎？

把這遺產的概觀分爲各個問題來考察，是實現我們所期望的任務之最好的方法吧。於此，先從價值論開始。

### 各種的價值論

在勞動價值論的發展上，培蒂以後顯著的前進，乃由有名的美國政治學家，大學者班札曼·福

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年) 做出了。

「把交換價值還元於勞動時間之最初有意識的詳細入微的分析——卡爾說：——我們可從新大陸的人物身上看到，在那裏，隨着其負荷者一同輸入的布爾喬亞的生產諸關係，在補償歷史的傳統之缺乏的饒沃的土壤上，急速的從事發展。所謂這新大陸的人物，即是班札曼·福蘭克林。他在1719年脫稿，1721年出版的最初著作中，把近世經濟學的根本法則表式化了。」<sup>①</sup>

福蘭克林使用與培蒂同一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命題（以至所用的話都幾乎不變）。在他看來，穀物和銀子也是對立的，但培蒂說銀子是形成穀物的自然價格，反之，福蘭克林則恰如和培蒂論爭似的說：「穀物和銀子相互地形成其他的自然價格」（旁點是洛森堡加的）。由福蘭克林看去，銀子并不只是穀物的自然價格，反而穀物價格也是銀子的自然價格，從而福蘭克林并不把商品之交換價值和爲其貨幣之表現的價格同一看待，不他力說着這樣的事：「和一切其他物品的價值完全同樣，銀子的價值也得由勞動去測量。」

又如依據福蘭克林來說，決定價值的并不是「常採取金銀時所用的現實的勞動之特別種類」（參看論究培蒂的各章），而是一切勞動決定價值。穀物生產者的勞動決定價值，這并不是因其生

①同上旁點是洛森堡加的。中譯本四三頁。

產物的穀物被轉化為貨幣的緣故，而是因此種勞動和一切勞動同樣決定着價值。由此，福蘭克林本身并未這樣去意識，已經近於抽象的勞動的理解了。「福蘭克林並沒有意識到：由於『依據勞動』去評價一切物品的價值，表現着實際所交換的諸勞動的差異。所以把它歸還到同一的人類勞動。如果不是這樣，那他應該如下的說吧：靴和几的交換，不外是靴匠勞動和小木匠勞動的交換。所以靴的價值會由小木匠的勞動得到最好的測量吧！他是由於僅使用所謂『勞動』的名詞表現出不同的諸勞動之有用的性質和具體的形態。」●

所以福蘭克林無論在交換價值的理解上，無論在勞動製造價值的理解上，都前進一步；他已從重商主義的幻想中解放出來了。但另一方面，他和培蒂相比較，甚至又後退一步。（一）在他看來，穀物和銀子之間的，或商品和貨幣之間的一切差異都消失掉，因為那都是由勞動所造成的，所以都有價值；（二）他並且抹殺勞動形成價值的布爾喬亞的性質，當把勞動從其具體的諸形態中抽象化的時候，并不理解在這為客觀過程的抽象化中確實表現出布爾喬亞社會之勞動的社會的性質；（三）在他看來，全部注意力應集中到作為價值尺度的勞動，他甚至沒有提出下面的問題：為什麼這尺度在貨幣上表現出來呢？為什麼貨幣是價值之外部的尺度呢？「但因為他（福蘭克林——洛森

（堡）沒有把交換價值中所包含的勞動，作為從諸個人之勞動的普遍的推銷中發生的，抽象的一般社會勞動而展開，所以必然的他不理解這貨幣作為被推銷的勞動之直接存在形態的意義。所以在他看來，貨幣與製造交換價值的勞動之間，絲毫也沒有內部的關聯，而貨幣反是為技術的方便起見在交換中由外部帶來的工具。」<sup>①</sup>

「在這時代，其他的價值論也發展了。英人尼古拉斯·巴哈（一六四〇——一六九八年）是以醫為業而兼研究經濟上的諸問題而成名的人，他從其使用價值中引出商品的交換價值。」<sup>②</sup>但是這并不妨碍巴哈在諸商品的交換價值中看出那些東西之同質性的表現。卡爾從巴哈的著作中引用如下的命題：「某種類的商品和他種類的商品，如其交換價值的大小相等，則都是相同的。在具有同樣大小的交換價值的物品間，沒有何等的差異，也沒有何等的區別。」<sup>③</sup>

巴哈不理解下面的事：作為商品之同質性的表現的商品的交換價值，同時又是其使用價值的

① 卡爾政治經濟學批判。旁點是洛蘇堡加的。中譯本四五頁。

② 為研究經濟問題而成名的一個醫生，卡爾舉出巴哈之名。巴哈並且和培蒂同樣，在投機上也大顯身手而成功了。他是

十七世紀以非常的力量強制推行本源蓄積的一個英雄。

③ 卡爾資本論第一卷。



表現，這是不能有的。作為使用價值的諸商品，是真正相互不同的。

依據使用價值的商品交換價值的決定，由意大利的僧侶加連尼 (Galvani) (一七二八——一七九七年) 加以進一步的發展。加連尼已經承認界限效用說的萌芽，他不只是區別着種種使用價值，並且在同一欲望的界限上也區別着種種的階段。①

有名的法蘭西的哲學家裴迪拉 (Condillac) (一七一五——一七八〇年) 也展開了主觀的價值論。他提示出如下的格言說：「物品並不是因為它充用某種東西才有價值，而是因其已有價值（使用價值——洛森堡），所以才充用（勞動或貨幣）。」② 裴迪拉立脚於這種價值論，也樹立了其利潤學說。但關於此將於後面再述。

在主觀的價值學說之外，當時的經濟學者們又展開了生產費用的理論和需要供給的理論。常常同一著者同時提出這兩種理論。以最完全的形式把需要供給說表式化了的是陸克，生產費用的理論，則由斯圖亞特所提出的（但是他又由勞動時間去規定價值。）

① 加連尼他反對重主農義，而是後來出現的重商主義者。

② 關於加連尼之價值論，德密特著經濟學概論第三部寫得很詳細。

③ 卡爾資本論第一卷。

## 諸種貨幣學說

在初期重商主義者的貨幣中，存在了這樣貴重的東西：即布爾喬亞的財富並沒有認為在布爾喬亞的形態之外，換句話說，並沒有認為在貨幣形態之外。然而因為對形式與內容同一的看待，所以對貨幣與財富也變為同一看待了。只是這樣的理解貨幣及財富，則並未理解獨立的貨幣問題，而且不能理解。在重商主義的解體期，完成了一步前進，即是：貨幣和財富被分離，貨幣的和財富的問題作為特別的問題而處理。但同時也後退了一步，即是：開始在抽象上，換句話說，在歷史上所制約的形態之外，去處理財富。財富之抽象的理解，產生了貨幣之機械論的理解，如依此來說，則貨幣是對於生產及流通之外部的某種東西，它不過是使使用價值的交換較為容易的一種必要手段而已。

兩種貨幣觀產生出來了（雖然在各個內部有形形色色的變相）。這就是名目論和金屬論。對於名目論者，貨幣的價值是條件的想像的東西。對於金屬論者，它是和任何商品的價值相同的。但貨幣無論對於二者的那一個，都如我們所說，是外部的某種東西；它不是從商品的生產及流通之性質自體中發生出來的東西。這兩種貨幣觀的不同，只在於下列一點，即是：如從名目論的見地來說，為了媒介財富的交換起見，便造出條件的價值；如從金屬論的見地來說，為了此種目的，選出了諸商品的一種——貴金屬。

但是我們不得不力說：在當前我們所考察的時代，名目論和金屬論都還沒有展開完成的理論。他們不過是抱了斷片的思想，還未到達加以究極的考察，不過述說了斷片的命題而已。名目論和金屬論在各個獨立的理論上結晶的，這是最後來的事。此外，在重商主義的解體期，有同一著作家一面倡名目論的精神，同時又倡金屬論的精神的現象。而且許多著作家，甚至有意識的「綜合」名目論和金屬論。例如，勞氏認為銀子（一）有作為銀子的即作為金屬的價值；并且（二）具有作為貨幣附加的價值。勞氏可以視為名目論之一變形的所謂貨幣機能說的創始者。依於此說，貨幣是有價值的，所以沒有機能；而也因沒有機能所以有價值。

名目論的其他變形的萌芽也出現了。例如，最近克那伯（Georg Friedrich Knapp）予以精細展開的所謂貨幣國定說是也。巴哈曾確言：政府甚至能提高貨幣的價值，或把價值付與其自身沒有價值的物品。他說：「使金屬成為貨幣，這是政府的權威。」●他的主要論據是磨滅的鑄貨和重量完全的鑄貨有同樣的通用力。

關於貨幣數量說反復的論爭，以前曾述及了。

總之，重商主義的解體期，關於貨幣問題的文獻是豐富的。在此時代，關於貨幣流通的各種問題，

雖大被研究，而且加以正確的觀察，但並不一定常有正確的解釋。加連尼正當的確認如下的事實：觀念的貨幣盡了價值尺度的機能，現實的貨幣盡了流通手段的機能。但是他在這觀察上予以錯誤的解釋，他說：「貨幣有兩種，一是觀念的，一是實質的；且被適用於不同的兩個用途：規定物品的價值和購買物品，為評價的目的起見，觀念的貨幣並不劣於實質的貨幣，或者反之。至於優勝。貨幣的另一用途，在於購買其所評價的物品……價格及契約以觀念的貨幣來評價，以實質的貨幣來實行。」<sup>(1)</sup> 哈不理解：担任着價值尺度的機能的貨幣常常是觀念的，以及這不得不如此的情形，是不外乎把商品和想像的金或銀相等價時，所以才有此機能之意義。我們的重商主義者認為商品的價值就用他所認為觀念的貨幣之重量不足之鑄貨也能去測定。因此，為了商品的購買，就要他所名為實質的貨幣之重量完全的鑄貨。於此，他和傑姆斯·斯圖亞特陷於同樣的謬誤。即是，他把價值尺度的機能和流通手段的機能分離。關於此，以前曾述及了。

最後，要指摘出的是：加連尼把爲着流通而存於必要的貨幣量和鑄貨的流通速度之間的反比例的關係，加以確適的表式化。說：「以少量的鑄貨而足用，這是託鑄貨流通的福，而非有賴於金屬的分量。」<sup>(2)</sup>

① 卡爾政治經濟學批判，中譯本九一頁，旁點是洛林堡加的。

② 同上。

## 利潤學說的發展

嚴格的說來，在重商主義者中，所謂利潤學說，完全沒有存在。由他們看來，現象是表現在表面上的本來姿態，利潤是商品和販賣價格的差額。約言之，他們以為利潤是賣價比買價高而得到的。只有傑姆斯·斯圖亞特企圖予以利潤學說。如我們所知道，他把利潤分為積極的利潤和相對的利潤。他把相對的利潤（曾如所述，這是他的主要問題）視為商品之實質的價值以外的超過分，所以由斯圖亞特的見解，利潤也是流通的結果，只不過他由於使用理論的名詞企圖使重商主義的利潤觀理論化而已。

「在重農主義者以前——卡爾說——剩餘價值（當時牠完全以利潤的現象而被考察）從單純的流通中引出來，由於商品在價值以外去販賣而說明。撒·傑姆斯·斯圖亞特，如作為總體來看，也沒有從此偏狹性中拯救出來，勿寧說是其科學的再生產者，更確切吧。」

其次，要注意的，是古諾不同意於卡爾，責難他過小的評價了傑姆斯·斯圖亞特。古諾說：「從我們現在更深奧的見解來看時，因讀他（斯圖亞特——洛森堡）的著作我們常常感到的，是他的結論達到某點以上對於他失却特色的首尾一貫性。雖然如此，但他的諸結論指示出卡爾沒有充分的

●卡爾剩餘價值學說史。

評價斯圖亞特之積極的利潤的意義。蓋卡爾認為斯圖亞特的所謂「積極的利潤」不外乎依靠生產性的向上而增大的「使用價值的增量」；但實際上，斯圖亞特在此名稱之下所理解的，是在生產上所取得了剩餘收入，它以出於生產費用以上的生產收入之超過分的資格一部分再被充用於社會的生產過程，而去擴大此過程。」<sup>①</sup>

第一，古諾的表現是極不明瞭的，詳細讀來，到底他論駁誰呢？卡爾把斯圖亞特之作爲積極的利潤的內容的使用價值，這不能夠命名爲收入嗎？卡爾說它否定「被充用於社會的生產過程而去擴大此過程」嗎？於此無須論究。卡爾如下的說道：「斯圖亞特並沒有要說明它（積極的利潤——洛森堡）怎樣由此增大（勞動之生產性的增大——洛森堡）所造出「社會的福祉」（古諾實以此句爲典據——洛森堡）之增大和向上，是此利潤之結果和附記着的事，這表示出如下的事情：斯圖亞特把它簡直理解爲勞動生產力發展的結果所造出來的使用價值量的增大，把這積極的利潤常和以交換價值之增加爲前提的資本家的利潤完全分離而理解。」<sup>②</sup>所以古諾如依斯圖亞特來說，則得出積極的利潤是收入，而在社會的生產上被利用，去從事擴大等。當然，積極的利

① 古諾：剩餘價值論第二版，二七七頁。此論文收錄在德烏拉基及魯濱編纂的經濟學，根本問題之中。

② 卡爾：剩餘價值學說史。

潤是收入，得被利用，但斯圖亞特對於由誰怎樣去生產的問題，並沒有解答，卡爾實在說明了這一點。卡爾把自己解釋的正確性由於斯圖亞特所指示出在商品價格中看到兩個部分——實質的價格和利潤——的事而確證，「在財貨的價格之中——斯圖亞特說——我區別出在現實中存在的，而且相互全然不同的兩個物品，即是：商品之實質的價值和由其推銷所獲得的利潤。」

由此引用文，我們曉得所謂利潤對斯圖亞特是實質的價值以外的超過分，而不是其一部。但古諾這一點也不同意——從而那裏是古諾所未咀嚼的地方。他反對卡爾如下的斷言着：如依斯圖亞特說來，所謂利潤不過是生產費用以外的超過分，並不是實質的價值以外的超過分，他（斯圖亞特）把實質的價值只由勞動時間去規定（我們看到了先前勞動的時間對於斯圖亞特不過是實質的價值之一要因。）換句話說，古諾由於立脚於「我們現在更深奧的見解，」即從卡爾借用來的見解，忽然氣餒高漲，給予斯圖亞特以提倡和卡爾的利潤學說同一學說的名譽；依此，利潤遂為價值和生產費用之間的，商品現實的價值和其在資本家所「要費」的東西之間的差異。卡爾批評家們不去探求從誰盜來了自己的學說，而想擊中卡爾，雖然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也是不成功的。古諾後來和他們耳語，那是可憐的傑姆斯·斯圖亞特。

●同上。

古諾由於擁護被卡爾「侮辱」了的可憐的傑姆斯·斯圖亞特的事至少把其被保護者薰陶成支離破碎的著述家。如果傑姆斯以積極的利潤解釋爲由勞動時間所決定的實質的價值和生產費用，換句話說，商品在資本家所要費的東西之間的關鍵，那爲什麼此外對於他（斯圖亞特），相對的利潤，「推銷利潤」的確有必要呢？它只爲了作出混亂才有必要嗎？

要之，斯圖亞特不過是重商主義的利潤觀之「科學的再生產者」，他的積極的利潤，不外所謂勞動的生產性使用價值量增大的這種事實的確認。但在這事實和資本家的利潤二者之間，他什麼橋梁也不能架。

就當時其他經濟學者們來說，會如我們見到似的，培蒂把地租作爲剩餘價值之一般的形態而加以研究，從地租中引出利息。培蒂的後繼者們（陸克及其他），雖然曾在利息之中看到了獨立的範疇，但是作爲獨立的範疇之利潤，在他們看來，還沒有存在。從馬希到他的繼承者休謨，雖開始把利息和利潤加以結合，但利潤的性質并未由他們加以研究。

雖然利潤的性質并未由他們加以研究，但他們却很好的明白利潤的意義。王德林特簡單明瞭的表式化出：「利潤是營業上唯一的目的。」



## 人口論及工資論

重商主義者是人口增殖的贊成者。它甚至是重商業主義的一塊基石。在人口的密度之中，他們看到了「國民的力量。」但對於新興資本主義成爲必要的，並不是人口的一般，而是被掠奪了生產手段，從爲掠奪了生活資料的人口。約言之，對他們成爲必要的，是過剩人口。只此，才是事實上的「國民的力量。」換句話說，才是抬頭着的布爾喬亞的力量。

組織工場制手工業型之事業的商人，遇到了工匠組織（基爾特）的抵抗；重要的事，是把工匠轉化爲工錢勞動者並不是容易的。反之，過剩的工匠人口，容易能夠作爲雇傭勞動力而使用的。確，所謂「本源的蓄積」雖然大量的造出普羅列塔利亞，但爲馬爾薩斯的理論所成立的地盤，當時還不存在。

人口的一部分爲由王朝政府形成大傭兵軍隊所利用而發生了效果，就中爲使握有自己的親衛兵的封建領主服屬起見，更爲和外國戰爭起見，那是必要的。最後，過剩人口爲向遠隔重洋的遠國組織半商業的，半軍事的遠征，有着必要；這種遠征，在成功的場合，是很有利的，因爲它能使「國富」增大。

由是觀之，重商主義者們對於人口增大的獎勵的態度，並不是他們體系中的偶然的要素，乃至

也不是異質的要素。但布爾喬亞的經濟學史家們不想承認這種事實。茵格萊姆完全同意於羅協 (Roscher) 所主張的在給予重商主義者們的「特徵中，與其說無論他們那一個都作着共通的經濟學的命題，勿寧說他們行着諸種理論的努力之集積及組合，最爲便利。」這種「努力結果有四，從而其一是想給予作爲國民力之稠密的人口以非常大影響的努力。」<sup>①</sup>

實際上，此種「努力」和其他的諸努力合併而形成單一的全體，同時由來於同一的本質；多量的金銀對於資本家及主權是必要的，而且使國外貿易發展的事，從而使向外輸出的工業加以發展的事，是重要的。最後，他們需要武裝完備的大軍隊，從而這一切的一切，歸根到底都需要稠密的人口。資本主義發展，重商主義走進解體期，得到了「新的發見」，即發見了過剩人口和低工資之間的關聯。<sup>②</sup>這是真正字面上順使的發見。爲什麼呢？因爲和發見這事情的人的意思縱使如何沒有關係，但這發見畢竟意味着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向理解接近的緣故。

① 茵格萊姆：經濟學史四八頁。

② 某匿名的著者，在出現於一六八〇年的著作商業論：(“*Britanis languen or a discours of trade*”)，簡直

如下的說道：「在國中，人口多工，資便低，從而人口少工，資便騰貴，生產費趨大，國民工業和外國的競爭變爲不可能。」

(見前揭華爾那的著作三七頁。)

從而，這種發見和當時經濟學家們的一般的目標密接的結合。隨着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世界市場的競爭日形激劇，當時成爲重要鬥爭手段的，是所謂被輸出商品的低廉。正由於此，遂發生了兩種要求：廉價的原料和廉價的勞動。所以把廉價的勞動拿到手中，在人口過剩的場合，是最容易的事。我們已經知道了工資在法律上加以限制的事，即確定了不允許接受或支付其以外的工資之最高限度。但在自然的法則和人爲的法則相對立，內部的規制者和外部的規制者相對立的這種重商主義的解體期，與其說人口過剩的方面由於國家機關的作用，毋寧認爲工資低落的結果。就中以爲是更合理的要因，這是不足爲異的。

這所謂人口過程之要因的「便利」乃在立脚於此而樹立自然的工資理論發生容易的這一點。所以此理論的本質在於自然的工資由勞動者及其家族之最少生活資料所決定的這一點上。此理論完成終極之發展的，乃是後世的事，是由蓋斯內 (Francis Quesnay)、杜爾閣 (Turgot)、李加圖所完成的。但就我們現在所考察的時代，也已經盡了爲終極地樹立此理論的很大努力。

培蒂已把自然的工資還元於最少的生活資料。仍和陸克所主張的：「如果他（勞動者——洛森堡）的全食料、衣服、什器比以前約高四分之一，則他的工資也必須隨着商品的價格而騰貴，給予他生存的可能性。不然，則他恐不能由其勞動繼續養活自己及其家族」●站在同樣的立場。王德林

特給予如下的簡潔的表式化說「勞動價格常由生活必需品的價格所決定。」<sup>①</sup>

並且在傑姆斯·斯圖亞特方面，甚至可以使我們看到最少生活資料的概念之極完全的展開。他把這最少限度分爲生理上必要的最少限度和政治上必要的最少限度（他所說的政治的最少限度，相當於今日所謂文化的最少限度）。但此種區別對於作爲重商主義者的斯圖亞特，爲使工資法則表式化起見，換句話說，在現實上爲指示出它如何被決定起見，並不是必要的；爲了對於「爲政者」給予應規制工資的標準起見，才是必要的。<sup>②</sup>斯圖亞特又在動態上，即在和社會發展之密接的關聯上，考察工資，只是這種問題的設定，在當時已經是偉大的科學的功績了。但最重要的是在此問題的解決上，斯圖亞特比李加圖佔了先步。斯圖亞特主張：隨着社會的發展，工資不得作爲農業生產物之高漲的結果而騰貴，但對於爲什麼後者的高漲不得不發生的問題，他並未給予明瞭的解答；

① 引自華爾庫那前揭書，三七頁。

② 同上，三九頁。

③ 斯圖亞特說：「第一，在爲生理的必需品而勤勞着的人們中，什麼競爭也不應該獎勵。第二，在依靠國外貿易而繁榮着的國家中，競爭者們直到相互（把其所得）退出生理的必需品，在輸出的各部門中，必須獎勵競爭。」（華爾庫那前揭書七八頁。）

他只是說「農業的發展需要更大的費用，此費用一到生活資料的價格不能以從來的姿態由自然生產物所補償時，農業的發展便馬上停止。」<sup>①</sup>這不得不引起生活資料之價格的高漲，從而後者由前者給予如下的結果：「生活資料之價格的這種高漲，必然的不得不使一切勞動價格高漲。」<sup>②</sup>華爾庫那基於如上的引用文而說道：「由此很明白的，斯圖亞特已經明瞭地認識了收穫遞減的法則。」但斯圖亞特正如華爾庫那所認識的，在什麼地方也沒有把此「法則」加以表式化。從而所謂斯圖亞特「明瞭地認識了收穫遞減的法則」至少是無根據的主張，此其一。第二，此「法則」的全意義，在於其普遍性，換句話說，即在於如下一點：土地收穫遞減的「法則」為資本主義的現實之最決定的諸現象，就在於說明低度實質工資之必然性，與正當化的基本的法則而形式化的一點上。所以斯圖亞特正如華爾庫那自身所認識的，是「把收穫遞減的影響作為經驗之直接的教訓」而分析。換句話說，斯圖亞特是確認着資本之最後的支出，是較少效果的場合之各種事實，而把此加以分析。但對於所謂技術在不變的場合收穫率低落的各個事實，誰也不應有異議。

伊里奇整個的批判了「收穫遞減法的則」之後，到達如下的結論。「它（此種法則）——洛森

①同上，八〇頁。

②同上。

堡)在技術不變的場合,不過表現出極相對的而且條件的適用」<sup>①</sup>

斯圖亞特并没有認爲收獲的遞減是「極相對的而且條件的」東西,在華爾庫那這樣說的主張中,有什麼根據呢?什麼根據也沒有。華爾庫那那是想把後世才產生出來的布爾喬亞的辯護論,急忙的推到重商主義解體期之堂皇的經濟學家身上。

x

x

x

當時的經濟學家們依於確立人口數和工資大小之間的關聯,作了種種有興味的觀察。他們也確立了人口的運動和工資的運動之間的相反的依存關係。即是低度工資喚起勞動者的國外移住,高度工資把他們招致到國內。

此問題被東印度公司的會員重商主義者的卡依爾特(一六三〇——一六九九年)最完全的究明了。在本問題上,卡依爾特甚至違背了自己的重商主義的原則,從而反對禁止勞動者之國外移住;因爲依據他的主張時,移住於國外的,只是絕對過剩的人口,卽不願操作或找不到職業的人們,如果國外移住有不由於希望的這種人數的增大,便可以由工資的提高而抑止之。卡依爾特到後來(一八六三年)——當恐慌期——在被稱爲「工場主的宣言」之一個工場主的信中所說似

①伊里奇全集第四卷,第三版,一八一頁。

的思想裏，還未想到，在此宣言中說：「對於綿布工業的勞動者們，他們的勞動供給非常過多時，大概就要有裁員三分之一的必要；這就是說，由於這樣的做法，就可以對於其餘的三分之二確立起健全的需要來……主人（即綿布工場主）并非能默視勞動供給被除去的，而是他抱着那是不正而且不當的見解。」●

所以重商主義者們便一步一步的去接近工資運動和勞動人口增大之間的依存關係。這些思想後來由馬爾薩斯及其他的僧侶們所利用，被轉化為他們的俗流的辯護論之人口論的支柱。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 第五章 重農主義者

前幾章幾乎完全是論述英國經濟思想的發展。在本章我們不得不暫時離開英國，移到重農主義發源地的法蘭西。但雖如此，而重農主義并不是所謂某個國家的現象，并不是法蘭西人的「民族精神」的產物。重農主義是一般經濟學史上最重要的幾章，跳過這幾章是不行的。重農主義的思想及某些重農主義者所用的方法，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隨着從商業資本向產業資本之霸權的推移，從而又隨着經濟思想本體的發展，便漸次在醞釀中了。另一方面，重農主義給予了全經濟思想的發展以影響；但在其純粹的形式上，它的影響差不多是僅表現在法蘭西。

重農主義對於我們的興味，可以佔據全經濟學史的一章。卡爾在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一卷中，以及在資本論中評述此經濟學派時，曾稱他們為「經濟學的真正父親」。

## 一、十七世紀後半及十八世紀前半的法蘭西

### 階級鬥爭和社會的政治的構造

如果說第十七世紀的英國是議會主義發展到革命的時代，那相反的，在法蘭西此期間却是由王權的鞏固化，轉化為絕對主義。在路易十四的統治之下，這現象到達了最高頂。

貴族爲了處理法國經濟的發展，不能像英國一樣的去「布爾喬亞化」，商工業布爾喬亞不能成長爲獨立的勢力。以無組織的騷擾和叛亂的形式對於王權鞏固化的抵抗，曾被人嘲笑過，說它是一種兒戲。牠沒有使王權削弱，甚而反把王權鞏固了。

在路易十四統治下，大貴族完全變成了宮廷貴族。他們雖然得向民衆剝削，但在政治上却是完全聽命君主的。因此，君主開始由貴族之中間層，有時甚至在第三身分組成的中央集權的官僚機構的協助下統治着國家。最高的貴族，在宮中地位最高，俸給也最多。在這種組織體制下，大量的資金是必要的；因爲這是使王權管制工商業發展的不得已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這種政策，當然把工商業布爾喬亞從屬於權力方面了；不必說，他們還沒有成長到獨自執掌政權的地步，然而，也已經成爲很可觀的經濟勢力了。把此勢力確保於絕對主義方面，這對於絕對主義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條件。

以剛果決然和乾脆的手段實行此種經濟政策的是路易十四的財政部長哥白爾（Colbert）  
一六一九——一六八三年。法國的重商主義，曾被人稱為哥白爾主義。

哥白爾主義最重要的一個特徵，是對農村經濟的蔑視。農村雖是貴族、僧侶、國庫等——一切人的剝削的標的，却從沒有一個人為農村着想過。所有的貢納大都改成了金納制，農業生產物的價格用人為方法抑制到低下水準，原料及穀物禁止輸出，但輸入則自由。這一方面是為以輸出為活動中心的工業供給廉價勞動力和廉價原料的必要所促使，另一方面，也是由於保證不十分寧靜的巴黎和王宮所在地凡爾塞的食料之必要所促使。①

路易十四雖然誇張過「朕即國家」，但為了要使由諸種身分組成的法國變作他一人的附屬物起見，以對外的戰勝麻醉國民是必要的。法國之絕對主義的綱領，在於創設（一）鐵血軍隊，（二）模範的輸出工業。當初，這兩個部分曾有過若干的成功，但其中已隱藏着內部的矛盾。輸出工業的發展雖然使商業——金融布爾喬亞出生，但他們不喜把其獲得的「由於推銷而來的利潤」聽任官

① 路易十四不大信任巴黎的住民，因此特別建築了「宮城都市」的新都市凡爾塞。她以輝煌豪華祝宴馳名全歐。凡爾塞給路易王的統治添加了許多榮譽，歐洲大小的專制君主對於凡爾塞是羨望和模仿的對象。

② 'L'Etat C'est Moi'

僚的無統制的管理。并且當時所創的互古未聞的龐大軍隊中，大量的資金也是必要的。此外，戰爭也需要莫大的資金，因此在路易十四的統治下，法國便發動了四個破滅的大戰爭。

商業布爾喬亞和最高貴族及僧侶之間的矛盾，愈來愈益尖銳了。前者代表貨幣的財富，後者代表「消費的」財富。前者渴望蓄積，後者渴望消費。最初的時候，絕對主義竭力想使布爾喬亞和貴族都滿足。對於前者創造了在國外市場上有利於商業的條件；對於後者則建設了豪華的凡爾塞。但無論那一個都是建築在無權利的民衆的負擔上。就中歸屬於農民負擔的，其結果是農村經濟的完全衰頹。租稅和貢納以及各種隨着封建義務，現在全然變成了使農民難堪的東西，他們成羣的拋離了住慣的鄉土，因為鄉土除了飢餓與隸屬之外什麼也沒有給他們！

據統計學家喬奈斯說，農民從田間收穫的四束穀物中，一束交納領主，一束交納僧侶或鄰近的修道院，一束作租稅的支付，最後的一束才得爲生產費的補償。「我們的農村住民——其他的著者寫道——在可怕的窮乏中生活着，既無床舖，也無什物，大多數人一年中有半年吃着大麥和燕麥，但就是這樣的食物，也不得不把其一部從自己及自己的孩子們의嘴裏節省下來，以作交納租稅之用。」

路易十四及其宰相所造的體系，并未安置在堅固的基礎之上，不，此體系反漸次的越益侵蝕了

自己的基礎。路易十四和哥伯爾的承繼者們，雖曾努力想去繼續他們的政策，但是一點也沒有成功。我們知道，法國的執政者在約翰·勞的計畫中發見救援的錨而急忙的把牠加以採用，以及財政的鍊金術師於法國絕對主義的窠臼中把絕望的狀態更加惡化的經過。

法國的絕對主義以急忙的步調使自己必然的趨於毀滅。商業政策以及侵略政策在十七世紀後半的成功，到了十八世紀的前半，却都已消滅了。所有的收獲被人奪回，所開拓的諸殖民地，也給更幸運的競爭者——英國——搶去了。在對外政策上，號稱最多的軍隊的力量，顯然是衰弱下去了。資本主義在封建制度的桎梏中不能完成其發展，雖然工業只在國內市場存在着的時候能完成進一步的發展，但牠已不存在了。

絕對主義和封建制度的破產，在當時的情況之下，也就是重商主義的破產。經濟思想探求了新的道路。

在當時經濟學者們的意識中，農業經濟和工商業相對立——而且在當時的諸條件之下，是不得不如此的。這是因為工商業以農業為犧牲而發展的緣故。經濟學者們開始要求以農業居於第一位，宣言農業對於工商業之優勢的這種個別方針。

然而經濟學者們從政府的方策是萬能的妄信的睡夢中醒來之後，希望以農業保護主義來代

替工業保護主義是不成的了。他們的思想開始在找其他的道路，雖然此種道路是由生活之現實自體所開拓的。

農民的窮乏和落魄，也就是他們的階層分化，即是富裕分子、農村富民、大農民的分化——雖說其數目并不怎樣多。此種過程在法國產生了。農業中的資本主義，開始在封建制度的庇護下發展了，但資本主義開始在於有利的條件下改造了封建制度。換句話說，是使封建的土地所有開始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土地所有，在地租上所實現的土地所有了。這指示了經濟學者們探求農業發展的道路，及建築在此基礎上的國民經濟全體的發展的道路。這就是所謂經過農業的發展而使資本主義發展的方法。

布爾喬亞社會從法國的封建社會中分化出來的歷史過程，是帶有許多特殊性的，其跡象在重農主義時代的法國經濟思想上還保存着。重農主義實在此全世界的歷史過程之法國的表現。

以上的事情，豫先決定着重農主義者的全部理論的成果的內容，並給與它以國際的性質。因為對於重農主義者成爲必要的，不是論駁重商主義的彼此的種類，或重商主義之彼此的錯誤；而是在於駁倒重商主義本身，所以他們對於農業的關心，使經濟思想轉換了新的方向，使研究從流通部門轉移到生產部門。把財富的源泉不求之於流通而求之生產，使以農業爲主的法國的經濟學者們，將

他們的研究集中於農業。卡爾說：「在證明所謂剩餘價值產生于生產部門的場合，首先剩餘價值的生產必須復歸於在流通過程中獨立表現的生產部門，即農業。所以新學說的創立，出現在以農業爲主的國家。」①

重農主義的創唱者雖然是弗朗沙·蓋斯內，但在他以前并非沒有前輩。重農主義在英國的解體，前章已經說過，在重農主義時代，幾乎是完結了的過程。甚至在重農主義者所導進的特別的，新的思想的展開上，也有他們的前輩——最初在法國本身。關於這些前輩們，我們不得不暫且加以論究。

### 法國的經濟思想的發展

法國重商主義的解體和古典經濟學的成立，比英國較晚。其開始是在路易十四當權哥白爾做宰相的時代；在此時代，法國的重商主義已到達了最高峯了。

哥白爾是傑出的政治家，具有豐富的行政才幹，其意志如鐵，爲對君主獻身的忠臣。●他曾執着二十年以上（一六六一——一六八二年）法國的政權並做着財政部長。他所實行的重農主義政策，很顯著的是從屬於絕對主義一般的利益（牠是以絕對主義的鞏固化爲目的的）而且是從路

①卡爾剩餘價值學說史。

易十四所完成的政策。

法國的重商主義，所以有哥白爾主義的名稱，是因為法國古典經濟學的發端，正和此哥白爾主義的批判相結合着。

作為重商主義的特別變種的哥白爾主義有種種特質。

第一個特徵，前已指出，是農村經濟的完全被忽略。的確，農業的忽略是一般重商主義固有的東西，因此，英國的重商主義者們，我們知道，就認商業是優於農業生產的；但哥白爾主義者的這種農業的蔑視，却簡直到達了極度。

第二個特徵，是重商主義政策實施上的極度的官僚主義。哥白爾常常乞靈于商人及產業家的「輿論」，為了此種目的，曾召集他們會議，但這種會議與其說是審議機關勿寧說是情報機關，更加切適。在這種會議席上，因為有時參加人長時間沈默着；哥白爾於是問他們「諸位，你們是啞叭嗎？」的時候，便回答道：「我們拋棄不合於閣下之意的不注意的話是惟恐有傷閣下之寬大的心情耳。」

●哥白爾在將死之前開始和路易十四發生爭執了。就在臨終的床上，哥白爾接到了國王的信，都拒絕把他開封如下的叫

道：「如果我託你的保佑縱然能再活一輩子，爲了這個人（指路易——洛森堡）什麼也不作了，所以我的命已無特別之必要了！」



第三，法國的重商主義，較之其他諸國，在經濟上和國庫的利害，在政治上和絕對主義的利害，是非常密切的。商業和財政——租稅政策，極緊密的結合着，要分離這兩者是很困難的。

哥白爾主義的批評，加添在所謂形形色色的河床上而被施行了，大有某著作家在其甲的方面放下批評的刀刃，別的著作家在乙的方面放下批評的刀刃之風度。這些批評家誰也都能在某種程度上被稱爲重農主義的先驅者，爲什麼呢？因爲他們使其體系在一般上與重商主義對立，在特別上與哥白爾主義對立的緣故。但是我們要論究當時最有名的著作家們，就中從以哥白爾主義爲主的經濟學的見地來批評而使其他的經濟學原則和它對置的人們。

茲論述最能代表這一派的人，被娃居伯、阿爾貞遜、及闕梯龍。

一、被娃居伯 (Pierre Boignolant 一六四六——一七一四年) 是里昂高等裁判所推事。他在處理當地各種形形色色訴訟事件上，親身接觸到了農民的悲慘生活，於是他就把牠以憂鬱的筆調描寫出來。他自命爲農村經濟的辯護者。

●的確根據某種傳說，某會議席上(一六八〇年)一個商人金德曾鼓起勇氣如下的說道：對「商業必要的事是國家把它應作爲索斯而去處理的事，是豫想到有名的表式「放任主義」似的。

卡爾把被娃居伯數作古典經濟學派之最初的法國的一個經濟學家，古典經濟學始於「英之培蒂，法之被娃居伯。」於此，卡爾附加如下的註解，「把培蒂和被娃居伯的著作及其性格加以比較研究時，那麼十七世紀末葉及十八世紀初頭英國和法國之社會的不同，不但明顯的映照出來，而且能根本的曉得英國經濟學和法國經濟學之國別的對照。」

英國在此時代已為議會制度而鬥爭了，法國還在絕對主義的掌握之中。在英國資本主義已浸透了農村經濟，在法國則農村經濟還是極度的衰頹。英國已經走入大資本主義的強國的途徑，而法國的確不得不從此途徑掃清積了數世紀的封建的塵埃之堆積。然則法國的經濟思想所應解決的問題和英國的經濟思想所應解決的問題不是相同的，理由是很簡單的。培蒂以解決土地或貨幣「租金的祕密」為其任務，反之，被娃居伯則以農村經濟的辯護者自任。他認為必要的，是把社會的注意集中於農村經濟，理論上證明它在國民經濟全體的意思。農村經濟和農村人口，和其後的重農主義者一樣，是被娃居伯思想的中心。」

被娃居伯否認都布住民是一國力量和財富的基礎，他因為都市住民的奢侈於是就說他們是陷於神經衰弱的人們。他認為只有健全的農村住民，才是一國的力量和財富的基礎。他對於忽略

農村經濟的路易十四的時代和爲蒲泊王朝初期之國王的亨利第四的時代（從十六世紀末到十七世紀初頭）對立着；這個國王是作爲述說「每當禮拜日任何農民的湯裏也好像浮着牠鷄肉似的」這種僞善者的章句的人而於世間上所傳說着的人。又對於哥白爾、被娃居伯使和亨利第四的宰相蕭里相對立；這個宰相據說曾說過：「耕作和牧畜是國家的兩個乳頭，和白爾的礦山的價錢完全相同。」其次要說的是，重農主義者們仍然把亨利第四的時代，作爲模範的昇平世界而讚美着，並把蕭里視爲他們的先驅者。

耕作和牧畜與白爾的礦山有相同的價錢，培蒂及其在英國的後繼者們，是想不到的。培蒂如前所說，認爲只有在勞動生產物和銀交換的範圍內，勞動才生產交換價值，所以被娃居伯以不同的方法去理解交換價值。可是被娃居伯「當他看諸個人的勞動時間由於被分配在各個產業諸部門中之真正比例去規定「真的價值」(In juste nature)以自由競爭爲造出這真正比例的社會過程時，」事實上也把交換價值還元於勞動時間了。因此，便產生了他對於競爭妨礙着確立這「真正比例」的，即妨礙着確立商品的交換價值或其「真正價值」的重商主義之理論的反對。但是培蒂沒有從其貨幣的形態中抽象交換價值，反之，被娃居伯完全無視着貨幣形態。商品生產被他認爲貨幣，「被娃居伯——伊里奇說——不理解貨幣和商品交換之不可分離的、自然的關聯，他理解使

布爾喬亞的勞動之兩個形態相互作爲絕緣的要素而對立的事。」<sup>①</sup>加之，他在貨幣中看到了不平等的根原及一切社會罪惡的原因。在這一點上，他變成了謳歌「非貨幣」商品生產的小布爾喬亞的經濟學者們，如蒲魯東之流的先驅者。<sup>②</sup>

某商品的「真正價值」，如依被娃居伯來說，是以被支出了的勞動時間爲比例而和此商品所交換的別的商品。只有貨幣才破壞了這種比例。他好像是把所謂貨幣的財富之代表者由於榨取販賣者及購買者而破壞交換之等價性的事放在念頭上的。卡爾把對於貨幣的這種理解認爲是和英國經濟學不同的法國經濟學的諸特性之一。<sup>③</sup>培蒂以對於金銀的渴望和追求視爲促進產業的發展和世界市場之征服的強大刺激；反之，被娃居伯則以對於金銀的渴望和追求，認爲促使廣汎的國民大衆之收奪的強大刺激，被娃居伯時代之法國的生活，豐富的給予了包含這種見解之正當性似的經驗的材料。建設歐洲唯一堂皇王宮的路易十四，并未以莫大的貨幣爲生產的目的而支出。是爲了無限的消費支出的。

① 卡爾政治經濟學批判，旁點是洛森堡加的。

② 伊里奇全集，第二卷，一九三一年，六二頁。

③ 卡爾政治經濟學批判。

被娃娃伯知道他所視為自然的正常的生產之商品生產是交換價值的生產，但無視了貨幣的，同時也認為此生產的目的在於使用價值的生產。

當結束被娃娃伯之交換價值說的特徵時，卡爾如下的寫道：「勞動時間可以作為商品價值的尺度，被娃娃伯是替我們證明了，雖然在商品之交換價值中所具體化的，由時間測量的勞動，不免和個人們之直接的自然的操作混同了。」●

如依於被娃娃伯之商品的交換價值的理論來說，他認為穀物價高和穀物價低那一個也不好，這是因為都破壞着交換之平衡的緣故。

「諸商品的價格——他說——必須相互保持比例，因為只有這相互的調和，才給予這些商品在各瞬間不斷再生產的可能性……所謂財富，因為它不外乎是人與人間的事業與事業之間的不斷的交換着的東西，所以把貧乏的原因不求之於由於從諸價格在比例的關係上的背離所引起的這種交換之中，而求於其某一個以外的東西，這必然是會弄糊塗的。」●

這就是說，為他的階級立場之特徵的事，是他希望高的穀物價格方面過於低的穀物價格；換句

●同上，中譯本四三頁。

●引自伊里奇全集第二卷，第三版五七頁。

話說，即是他認為前者是害小，所謂農產物之低度價格結果歸於農業的放棄，是他的立論中心，這很顯然的是以高價格為指導「原理」的農業布爾喬亞的意見。

的確，被娃居伯當擁護穀物之高價格時，甚至不提切合自己本身的原理，這是應當注意的。即他雖然是重商主義的死敵，却要求着農村經濟的保護，農產物輸出的自由，和其輸入的禁止的確，被娃居伯被列入於後來在曾博得了著名的「放任主義」(「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的口號所要求的經濟自由之最初的一個擁護者，這是得當的。

的確，他還未到達於使用這口號，但是，如依抗根的話來說，牠是「攔在他的喉中的東西。」  
 被娃居伯在如下的意味上是重農主義者的先驅者。第一，他以布爾喬亞的形態上的經濟的諸關係作為自然的諸關係而處理，所以接近了在重農主義者之思想上有重要地位的「自然的秩序」之觀念。第二，他展開了在經濟的自由主義和「放任主義」(「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的表式中所包含着的思想，因之這種表式是他想要說出口的，這也是重農主義之基本原理之一。第三，他所注意的是農村經濟，他以農村人口視為國家的財富及力量的基礎，由此攷察，這和只有農業的勞動才是生產的之重農主義者的思想，相差不遠。最後，第四，被娃居伯忽略價值之貨幣的形態，把

W—G—W 還元於 W—W，把商品的生產還元於單純的使用價值的生產，在這幾點上，也近乎重農主義者。但是他却認識了使用價值採取布爾喬亞的形態，所謂交換價值的形態。

不錯，關於被娃居伯的工資理論，不得不加以攷察，因為這有特別提出來攷察的價值的緣故。他和當時英國的經濟學者們同樣，也把工資還元於最少生活資料，但是他的工資論之特點，是他從農村布爾喬亞的立場上去處理。担任着農村經濟之辯護者的他，對於農業勞動者表現為森嚴的檢查官。「在穀物價格騰貴了似的場合，縱使這種騰貴是很有限的，他們（農業勞動者——洛森堡）也一定要以此機會而想得到工資的增加。後來穀物價格開始低下，或一切的農業者（以及與其相結合着的一切從事於職業的人）陷於破產的狀態，從而至於他們失掉從來所獲得的一切東西，在這種場合，勞動者之間對於正義的反抗精神，便澎湃的表現出來……」

對於勞動者的攻擊更加前進。「在他們（勞動者——洛森堡）之間也許有規約，那種東西成為文書。這種規約的大部分雖然是從外國輸入的東西（看吧，他訴諸於國民的感情！——洛森堡），但勞動者們都相互關照牠。就中，有這樣的規定：如果勞動者之中誰有同意於習慣的工資之低落，這樣的勞動者就要被禁止做其後的職業……」

被娃居伯把對於工資抹零之一切的鬥爭手段，作為汲汲於從勞動者搶奪的事。用他自己的話說，「規約」也只是勞動者中禁止「同意於習慣的工資之低落。」然而他只關於勞動者，把其愛好的「原理」無條件的百分之百的作為妥當的東西而說教。翻譯為階級的用語時，這意味着在布爾喬亞范中，由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之內在的法則，必須給予榨取勞動的自由（從而這在農村經濟之保護的名下所要求的所在，曾如所述，是被娃居伯的立場之特徵之一。）因此，阻害這自由似的一切的一切，不得不加以廢棄。

被娃居伯反復着培蒂反對高工資的論旨，說：如果以一週間之一的勞動不能支持全一週間的生活，想是勞動者只此而外沒有去勞動。但被娃居伯并未要求工資之法律的規制，因為他曉得了無國家的干涉而降低工資的方策。他充分的理解了穀物價值的騰貴可以容易使實質工資低落，換句話說，即自然可以幫助「規制經濟的秩序」的事。

二、阿爾貞遜伯爵（D. Argenson）其次要移到以前我們所舉出的三個著作家中的第二個人物，阿爾貞遜（一六九四——一七五七年）他是貴族出身，曾經一度當過路易十五的外務大臣。他無論在其政治見解上，抑或在經濟的見解上，都是比被娃居伯為急進。他抱着共和思想及聯邦



思想。在經濟方面，他既不附於保留也不附於例外，已經完全的明確的以「放任主義」爲自己的信條了；他不只在國內商業上，就在國外貿易上，也要求了完全的自由……全世界必須變成單一的市場；因此，是所謂最堂皇的生產着的東西無不同於獲得最大的利益，他以如下的話表式化其一般的原則，「雖然功名心和利慾指導着各個人，但由此生出了一個一般大小的全體……牠是在國家的管理之下絕對生不出來的。」●

阿爾貞遜對於國家只有這樣的要求，「良好的裁判所，獨占的制裁，對於住民之無偏頗的保護，以及價值不變的貨幣……」●其餘的事應委諸各個人的自發性，爲熱烈的貿易均衡之擁護者的意大利的重商主義者，當向銀行家伯洛尼論戰時，他這樣的說道：「把經濟的機構全歸委之於伯洛尼所推薦的，而且在我們國家之實際生活上所見到的小心翼翼的管理，果然是得策不得策，這不是有吟味的必要嗎？毋寧使國家不只做平凡的保護，把經濟的機構就委之於其自身，不很好嗎？公的以及私的許多事情，只由自由之助而始成立和完成。」●

●抗根 濟學史二七九——二八〇頁

●同上二五〇頁

●同上二七九頁

的。  
阿爾貞遜把商品的流通和空氣的運動相比較，前者是無境界的，同樣，後者也是不應加以限制的。

在阿爾貞遜的見解中，刻上了小布爾喬亞的偏狹的痕跡。他反對大生產及大商業而擁護小生產及小商業，不理解後者——特別在完全的經濟自由之下——必然的不得不到達前者。他把經濟諸部門配列成所謂農業、手工業及商業的順序，斷言着一國民的幸福存於「良好的農業被廣泛的施行，無能力從事於農業的人從事於手工業，而且健全的國內商業被經營」的場合。

在此配列之中，沒有國外貿易；從而阿爾貞遜強調着國內商業的意義，但是這恐係依於被施行於普通大規模的國外貿易的事，這就是說，因為從阿爾貞遜的立場說，在國內商業和外國貿易之間，不應去說設立如何的區別之故。

三、關梯龍 (Richard Cantillon)。他也是重農主義者的一個先驅者。他雖生於愛爾蘭，但久住於巴黎；以法文寫成其主要著作（商業論）。他是大銀行家，管理着亡命到法國來的敗殘王朝斯圖亞特家的金錢出納。

卡爾很稱讚關梯龍。他從「蓋斯內、傑姆斯·斯圖亞特，以及亞丹·斯密借用了好多的東西。」

●七三四年，他爲了其一個家僕而被奪去財產和被殺了。

●關梯龍提出如下的提說，「土地是財富被引出來的源泉和材料，從而人類的勞動附與它以形態。」●重農主義者由於使此提說更加發展，遂不得不到達於所謂只有農業勞動才是生產的之主張，而且實際到達了。但是關梯龍自身還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不待說，他在許多問題上純粹立於重商主義的見地，他擁護着爲重商主義之基本原理的貿易均衡論。

其次應該注意的是：抗根并未完全理解上揭之提說的意義，他在所謂土地是財富的源泉的主張中攷察其意義。這樣的理解此提說時，就中實際上還一點也沒有重農主義的東西。何況宣言着以土地或自然爲財富的源泉的事，已經變成當時經濟學的文獻上之老生常談，對於其理解是很漠然的。前述之提說的意義使土地和勞動相對立，在於兩者之間配賦了所謂任務的一點，即是所謂財富之源的任務配賦給土地，所謂形態之變化的任務配賦給勞動，所以這已經純粹是重農主義的思想。不錯，雖然牠還沒有被充分的展開，但其核心已經確立了。

關梯龍在其方法上也是重農主義者的先驅者，他廣汎的運用抽象，努力於一般法則的定式化。

●卡爾資本論第一卷。

●上揭書之冠首以如下的語句而開始：「土地是源泉是材料換句話說即是源泉」(La terre est la source, la matière C'est-à-dire la richesse)

常常利用數學的計算和表格爲數理學派之創始者的吉溫斯 (Stanley Jevons) 以此爲根據，以關梯龍作爲近世經濟學之創始者，這當然是非常的誇張，關梯龍的方法已被他較前的威廉·培蒂應用於經濟學上了。雖然，關梯龍不列入於科學的方法之適用上，從而古典經濟學之建立上，加添了不少力量的一個經濟學者，他的任務特別在法國爲顯著，他久居那裏，貢獻了經濟思想的發展。

最後，要附帶說明的是：關梯龍是在人口問題，即在人口和工作人口爲比例而行增減上，加以很多注意的一個經濟學者。他說：「勞動者，手工業者，以及其他由本身高大的勞動力而生活着的人們，在對於都市及農村存在着的工作人口或他們的需要上，必須在量上去求適應，這是容易記錄的。」而且他指摘出，一切過剩的勞動者——例如那以四個勞動者就充分而出現了五個勞動者的場合所看到的——只在既存之勞動者的負擔上才能生活，即他降低了既存勞動者之生活水準。從而他把關於勞動者和對於他們的需要之適應的思想，加以很充分的展開。

關梯龍的這樣的思考方法，包含着重農主義者爲了此問題更加展開，而且又爲了工資理論，由

●我們認爲抗根把「英法人」關梯龍列入於從重商主義到重農主義之轉換期中的法國經濟學者之中是得當的。

(參看抗根前揭書二八〇——二八四頁) 但不能同意他關於關梯龍之意義的片面的解說。

●華爾庫那五二頁旁點是洛森堡加的。

許多經濟學者所利用了。

## 一一、重農主義的創始者——

弗朗沙·蓋斯內 (François Quesnay)

弗郎沙·蓋斯內生於一六九四年。他的父親雖然是地主，但非貴族。蓋斯內從小喪父，營着獨立的生活。他雖曾研究過各種的學問，但專門的是醫學，對於外科醫獲得很大的成功。他就在內科方面也成爲大專門家，獲得了醫學博士的稱號；著有關於醫學及生物學等書。

一七四九年蓋斯內被任命爲宮廷侍醫，受到了與路易十五權勢相埒的寵妾龐巴德伯爵夫人的保護。不久，在一七五二年他由國王授與以貴族的地位。

據傳記作者們說，蓋斯內開始研究經濟上的諸問題，是從一七五三年到一七五六年的時候，即是他已到六十歲的時候；當時世論大有被集中到經濟上的問題之感。雖然以前許多人們都不研究它，可是現在它却變成社會一切方面所關心的對象。顯明的情形，甚至使蓋斯內也轉到經濟學。當時成爲議論之焦點的，是穀物價格（它曾如我們所知似的，是由政府的政策維持低水準的）。

●此人雖然給予路易十五的內治外交政策以很大的努力，但該女是以其濫費而「有名」，據說曾達到了四千萬佛郎。

及使民衆荒廢了的租稅的問題。福祿特爾以其第一流的辛辣筆調在一七五〇年會如下的寫道：「國民因爲以詩、喜劇、悲劇、小說、道德論和神學論飽滿了，所以結果變成議論麵飽一樣了。」

蓋斯內似乎已經參與這種工作了，他發表在有名的「百科全書」上的最初的經濟論文，題名曰農業者（*Fermiers*）及穀物（*Grain*），在這些論文之中，蓋斯內證明農村經濟之困難的原因，在於難堪的租稅和低廉的穀物價格。

雖然最初蓋斯內是個人研究，但不久，就有追隨者出現而形成學派了。學派一半帶着閉鎖的性質，定期舉行集會。這種集會有的只爲了學派的人們而召開，但也有公開舉行的場合。

在重農學派的成立史上担任決定任務的，是法國大革命初期的主持者青年米拉波（*Mirabeau*）之父老米拉波伯爵和蓋斯內的會遇。重農主義者自身，以此會遇認爲是本學派成立的發端。

老米拉波（一七一五——一七八九年）在當時，還在重商主義的思想之影響下。他的姓名作爲許多精心著作的著作，就中作爲人類之友（別題人口論 *L'ami aux hommes ou traité la population*）的著者被習知了。這本著作發表於一七五七年的初頭，那恰好是蓋斯內的第三篇論文人類（*Hommes*）準備好了的時候。蓋斯內的結論和米拉波的結論正相反對。米拉波把所謂我們已

●抗根說米拉波占了阿爾貞遜和關梯龍之間的中間的地位（杭根前揭卷二八四頁）

知的那種人口形成國富<sup>①</sup>的重農主義的提說加以定式化。在米拉波的定式上，此命題被如下的表式着說：人口的增加行於財富之先。然而蓋斯內提出了與此相反對的提說：財富造出或喚起人口的增加。

蓋斯內和米拉波的會遇，對蓋斯內有利的解決了此論爭，從而使米拉波變成了熱心的重農主義者。米拉波把事情這樣的描寫着：他在長長的故事中，全然奇蹟似的處理着蓋斯內對於他的勝利。由此，他一定想強調着去克服一切障害重農主義的威力。他的全篇故事，當然現在應視為米拉波實際上到了開始崇拜蓋斯內之學說的一種宣傳文。奇怪的是許多經濟學家當反復米拉波的故事時，并未及到這一點思想，而說那所謂滿口說着重農主義財富必須先行於人口增加的蓋斯內的解決，並沒有作成其全部之內容的。從而假令米拉波在此問題上被打敗了，他也沒有不得不採用蓋斯內之全部學說的事情。

卡爾把蓋斯內對於米拉波的勝利，極簡明的說明着。在重農主義的體系上，封建制度採取着「布爾喬亞的姿態」，布爾喬亞社會被給予封建的外觀。這種不果敢的外觀——卡爾說明着——是欺騙了蓋斯內之貴族層的追隨者以及就中為家長主義的叛徒的老米拉波。」<sup>②</sup>封建機構之

●見前章。

日就沒落，特權階級之代表者們也感受到了，從而他們之中，不少的人公然走到第三身分的方面。「但家長主義的叛徒」米拉波沒有下過這樣的決心。布爾喬亞社會代替封建社會，造出不外乎前者之新版似的幻想之「不果敢的外觀」對於他是必要的。他在重農主義中看出了這種「不果敢的外觀」，因此，他僅能跳到這上面。

但布爾喬亞的諸關係，在蓋斯內的學說中呈現着的「不果敢的外觀」也是蓋斯內的特徵。不管其天才見解的廣大和多方面的教養，「封建的外觀」對於他仍然是必要的。雖然是第三身分的代表者，但得到所謂「有名譽」的稱號享有權勢煥赫的龐巴德的庇獲和國王的寵愛的宮廷侍從蓋斯內，他本身變成了這種外觀的俘虜。他是穿了封建外衣的布爾喬亞的化身。

蓋斯內在其政治的信念上，有如十八世紀之多數啓蒙學者一樣，是開明的絕對主義的同黨。他們基於從上的諸改革，即基於由開明的君主應實行的諸改革，而想預防改革。被其阿諛者們稱為「大王」的呼里德梨（Friedrich）亞力山大第二（Alexisvora II）以及此類專制君主是披上了所謂開明君主的外衣。

蓋斯內對於他的提案的諸改革上實現的事，抱着很大的希望。最初，此種希望寄託於路易十五，

●他對於其保護者感到深深的感謝之念，爲了該女子獻給其著作之一。



現在因為瞭解了這國王全然沒有變成「開明君主」似的氣概，而企圖使路易十五的世嗣成爲他的思想的歸依者。有趣的是在此問題上，甚至於「家長的叛徒」米拉波比出身於布爾喬亞之環境中的蓋斯內對於現實也非常的敏感；蓋斯內及雜誌的編輯者，因為感到重農主義的機關雜誌「年鑑公報」的發行的困難，而將雜誌捧到嗣君的面前，祈求着給以允許他所謂希望殿下之保護的希望，這雖然得過皇太子的同意，但米拉波斷然的拒絕參加在皇太子的保護之下所發行的雜誌。其理由是這樣：惟其是支配者才應該得到雜誌的承認，并非雜誌應得支配者的承認。

蓋斯內激烈地反對立憲君主制及三權分立制的贊成者，孟德斯鳩他對於君主制的見解如下：的表式化，「它的希望只是求唯一的最高權力的存在……在政府中的勢力均衡（Contratours）的制度是有害的，它只會造成強者之間的軋軋和弱者之被抑壓。」

蓋斯內在其世界觀上，和唯物論熱烈的反對着，他到了「百科全書」在狄洛特（Diderot）的影響之下明白的帶着唯物論的色彩時，甚至拒絕了對它的參加。爲蓋斯內之最重要的思想之一的「自然的秩序」他給它披上了宗教的外衣。此種秩序是由神所創造，隨後又委之於其自身。

蓋斯內承認兩個實體——精神與物質，兩者彼此之間完全獨立，甚至相互間也不發生作用。這

兩個實體本身是被動的，它營着運動、活動和相互作用。這是由於第三個的、自動的創造的實體，這第三個的實體就是神。由此產生出二種認識：（一）立腳於經驗的認識——在此處，蓋斯內和陸克爲夥，和他一同反對本有觀念的存在；（二）立腳於信仰的認識。第一種認識的對象，是物質的世界和社會的世界。第二種認識的對象，是神和彼岸的生活。

在一切這樣思考的方法中，一點也沒有新奇獨創的東西；如果要勉強尋求新的所在，那恐怕就是蓋斯內會拾起其當時落伍的諸思想家之體系中的弱點和腐朽的方面，把它加以整理並用一個體系的形式提示出來的地方吧。要之，蓋斯內在所謂世界觀的諸問題上，是抱了即在當時也是舊式的落伍的思想。蓋因爲他所處的時代已經不是狄洛特（Diderot）德爾巴克（D. Holbach）赫威秀士（Helvetius）的時代了。他不是唯物論者，甚至比之於啓蒙哲學者還落後。他還是埋沒在封建的偏見之中。

但是蓋斯內在經濟學上，則表現爲開拓新的進路。大胆的天才的革新者，他有許多的先驅者，從他們那裏借用了好多的東西；雖然如此，但他的體系在偉大的獨創性和深刻性上是傑出的，就中刻着他的天才的烙印。

他和那與之同享經濟學之創立人的名譽的，其天才的先驅者威廉·培蒂不同，蓋斯內是堅守

原則的靜態的人物，甚至有獨斷主義及理論拘泥主義之嫌的。無論什麼時候都是極真摯的態度，生活方式和舉動都尊大的宮廷侍醫蓋斯內，和輕佻的耽沈於永久的歡樂和淫蕩的凡爾塞成了尖銳的對照。在社交中有的視之爲賢人，有的視之爲宗派的領袖蓋斯內所創造的體系，收到了盛大的，但是短命的成功。一時它——雖非全部也是部份的——也有見諸實現的。但因爲法國諸事件開始很急速而且深刻的展開了，所以不久重農主義便被時代遺落下去，經過長時間之後，布爾喬亞就忘却了曾在總體的姿態上把握着固有的生產方式而成功了他們的最天才的嘗試之一的，他們的偉大的代表者了。

弗朗沙·蓋斯內死於一七七四年，即革命開始的十五年前。

### 蓋斯內的方法論

曾被培蒂搬進經濟學中的自然科學的方法，蓋斯內完成了進一步的發展，這種方法在社會科學上的正當性，被給予極廣大的原則的基礎，同樣，又由此方法把非常大的各種現象收集在視野之中了。當培蒂適用此方法時，還在摸索着，嘗試着，在建立言詞之真正意味的體系中，還沒有成功。反之，蓋斯內握有在其手中所使慣了的兩腳規，完全以自信而進行了；在此種意味上，只有他才是體系的

創造者。從而這一點也沒有什麼稀奇，因為在培蒂和蓋斯內之間，橫置着經濟思想之發展所適應着的經濟自體發展之一大階段的緣故。

物理的世界和社會之區別，蓋斯內認為並不是重要的東西；從而這由他把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之方法的統一性給予了帶着極深的基礎的可能性。被娃居伯所說經濟的機構必須委於其自身的要求，在蓋斯內的「自然的秩序」的觀念中，表現出進一步的發展，這無論在物理界或社會中，都是支配着的。

醫師蓋斯內把社會作為活生生的有機體而處理，區別其中的兩種狀態，那是健全而正常的狀態和病態的不正常的狀態。因此，衛生和療治使施諸社會，前者施用於社會是常態，並處於均衡狀態的場合，後者施用於社會發生病態，並脫離了均衡的場合。動學的見地，發展的見地，是我們的改革者所不知的。●他的有名的「經濟表」(Tableau économique)所說明的，是均衡狀態。

自然的秩序之觀念使蓋斯內到達了把經濟的過程作為具有內部的全理性的自然的過程理解着——在這一點上，他有着最大的科學的功績，但是他的超歷史的（在原則上是反歷史的）見

●蓋斯內對於歷史抱着蔑視的態度，就他的見地說，所謂歷史是滿足好奇心的東西，而非滿足知識慾的東西。在他這種思

考方法之中，反映着啓蒙時代的「精神」，因為啓蒙哲學者們在原則上是反歷史主義者。

地使他不得不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視爲自然的，生產方式，而且事實上他是這樣去看了，並且這種見地使他走入了兩重的自然的主義，卽他和被拜居伯同樣（但動機不同），不注意力集中於生產過程的社會的方面，却致全力於自然的方面。社會的方面，這也和被拜居伯同樣，作爲什麼自然的東西，作爲和使用價值難以分離的東西而加以容受了。

採用這種方法的蓋斯內，把其研究從這種一切處於動搖不定的狀態，市場的暴風雨襲來，觀察自然的秩序困難的流通部門移到生產部門，而且移到比其他的生產諸部門依存於市場最少的生產部門，這是不得已的。所以相當於這種部門的，就是農業。●把研究移到生產部門的事，是蓋斯內的最大的科學的功績；全古典經濟學繼承着他。但是以生產只還元於農業的生產，這是法國之社會的——經濟的條件所使然；在方法論上，它被表現在蓋斯內之兩重的自然主義之中，蓋依於此，則所謂生產是物質的增大，它在農業上產生的。●

●到了使蓋斯內把農業居於國民經濟之首位的原因，當不只此。於此，我們不過是說明農業的優越性對國民經濟之宣言的方法論的特徵而已。

●無論何處，物質也不增加，自然也在如蓋斯內所說的意味上而行生產這種有名的羅阿澤的主張，是蓋斯內還未學到的地方。

向農業經濟部門之研究的移動，事實上已經由被娃居伯做過了，但是在他看來還沒有方法論的原理，從而這是由蓋斯內所完成的。階級的立場，無論是重農主義的創始者也好，無論是其先驅者也好；但被娃居伯如較之於蓋斯內，則還是實際家。階級的、實際的動機，他還沒有去充分的處理，沒有以普遍的原理之形式表現出來。這普遍的原理，被置在蓋斯內之自然的秩序之中，惟其如此，才把其經濟的見解形成單一的體系的原理。在他看來，研究的對象，是自然的秩序。蓋斯內的一個追隨者，杜鵬·德奈穆耳（Du Pont de Nemour）把重商主義規定為「自然的秩序之學」①。從而由這種研究所發見了的諸法則，是可以適用於一切時代及一切國民的普遍的法則。特別明瞭的表明此種思想的，是杜爾閣；但他雖然不是蓋斯內之正統的後繼者（關於此後面再說），可是在當前之根本問題上，他的立場完全和蓋斯內的立場一致。杜爾閣寫道：「不忘記那被相互分離，以不同的方法所組織了的政治的諸國家存在着的人，去把握經濟學之任意的問題之優越的處理方法的事，恐怕絕對不可能。」②

實際上，如果國家不同從而自然的秩序互異，那恐怕已經說不上自然的秩序了，但是爲什麼種

① 季德及李斯特經濟學史，第二版，一九一八年，三頁。

② 同上，五頁，旁點是洛森堡加的。

種的國家，沒有同一的組織呢？對此可以如下的解答：蓋斯內的解說，社會狀態分爲正常的與不正常的之外，至於國家組織的不同，是由其狀態之正常性的程度之不同所引起的。所以對於重農主義者，自然的秩序，是必須向它去努力的理想的秩序；從而此理想的秩序，如果承認他們的學說，就中把它置諸開明的君主及有勢力的爲政者之實際的基礎上時，是能見諸實現的（如更確實的說，則是得以實施，）這是重農主義者們給予其思想之宣傳和煽動那樣大意義的所以然。

自然的秩序，曾如所述，在「經濟表」中是被顯明的描寫着，從而在這一點上，有同表的方法論的意義。雖然蓋斯內常常重視所謂「明晰」，但是這「明晰」是藉他的表的幫助的。所以這個表便被其同派的人們視爲一種大發見了。「經濟表」使下列的事弄「明晰」了，（一）農業上的生產物被分配在全社會中的情狀；（二）這被自然的而且自發的去施行的次第；（三）經濟之一切部門及國民之一切集團相互聯繫，形成一個全體；（四）只有農業才爲一切東西之基礎的所以然（蓋因爲僅只農業才生產純收入的緣故，）這第四點，對於重農主義者是特別重要的。

不待說，「經濟表」對其製作者是論證了被要求論證的地方。但是其方法論的意義是莫大的。爲什麼呢？因爲它是要把社會的生產及流通在全體的資態上去描寫的最初的天才的嘗試之故。蓋斯內把各個的交換行爲，不作爲其自身去處理，換句話說，不在現象的表面上不在它原樣呈現在混

混亂雜的姿態上去處理，却從社會的再生產的見地去攷察。所以引起蓋斯內關心的，並不是各個農業者們和工業者們締結的交易，而是把農業和工業相互結合的交易，爲什麼呢？因爲只有這樣，才能施行農業及工業兩部門中的再生產。

的確，重農主義者們不能真正理解工業和農業的關係，認爲前者是「不生產的」，但是這件事并未抹殺上述方法論的原則之意義。他們在適用此原則的場合，只不過是立於不正確的前提之上而已。

而且重農主義者們，并未從社會之一定的階級構造中把再生產加以抽象，這當然是完全正當的處理方法。●這是他們在再生產之分析中，把地主及其他的階級間之流通的分析也包含起來的，所以，其結果，再生產的分析遂帶有資本主義的再生產之分析的性質了。但如就外面上看，重農主義者的體系是以封建的色彩塗飾着的，那使他們自身及他們多數之支持者陷於錯誤；但這件事，當然沒有變更事態的本質。「一個體系的標記 (Taster)——卡爾以銳利的智慧述說着——不僅是欺瞞購買者，而且也常常欺瞞販賣者，特別這一點是和其他諸物品之標記不同的地方。蓋斯內本身及

●他們并没有真正的考察社會階級的構造，但在此處，問題只是方法論的原則。

●卡爾資本論第二卷。



其直系弟子們，把信念置諸他們的封建的招牌上；那是和我們的學者們直到目前還是這樣置信是相同的。但在實際上，重農主義者的體系是關於資本主義的生產之最初的體系的說明。①

在重農主義者看來，所謂「自然的」概念有兩種意義：（一）它是和依存於人們的意志及願望之主觀的東西相對立的；（二）它是和那作爲什麼不變地保持永久的歷史的東西相對立的。第一個命題是正確的，經濟的諸範疇及經濟的諸法則是客觀的東西，是物質的東西。第二個命題是錯誤的，因爲經濟的諸範疇及經濟的諸法則是歷史的範疇，是歷史的法則。牠隨着從一定的生產方式中生出來的這生產方式之消滅而消滅。對所謂「自然的」一語的這種理解，重農主義還沒有達到——從而這又是實際上，在布爾喬亞的視野的限界內不可能的。的確，從經濟學中驅逐出了如下的思考方法的功績，由主觀主義即經濟的發展由於意志、自覺、「理性」，更由於現世之強者的「理性」和意志能去說明的思考方法——是他們的。關於重農主義者如何考察強者的任務，暫待後述。卡爾把這件事強調着正確地；把客觀的東西理解爲被歷史所制約的東西，他同時關於重農主義也給予了唯一的正確的分析。他說：「生產的布爾喬亞的諸形態，對於他們，必然的變成其自然的諸形態。重農主義者之偉大的功績，在於把這些形態理解爲社會之生理的形態。即理解爲從生產之自然的必然性中發生的，脫離意志和政治等等獨立了的形態，這對於他們是物質的法則，他們的謬誤在

於把在社會之歷史的一定階段上的物質的法則看做了一樣的支配着所有的社會的形態之抽象的法則。」<sup>①</sup>

自然的秩序，依蓋斯內說來，不依存人們的意志及自覺。但的確也有積極的秩序（Order Position）這如果也有接近於自然的秩序時（我們恐未忘記自然的秩序又是理性的秩序），則也有和它背離的事情。現世之強者們——其第一是開明君主——的登場，正在此處。蓋斯內對於他們課授着教師或醫者的任務，即他們（一）必須學得在國民的意識中關於自然秩序之真正的概念；（二）社會在陷於病的狀態時必須療治它使還於自然的秩序。<sup>②</sup>

在這糊糊塗塗的提案之中，也包含着健全的核心，那就是蓋斯內的客觀主義並不是宿命論。更正確的說，即用伊里奇的話說，蓋斯內的客觀主義是不排斥黨派性的東西。重農主義之創始者的黨

●卡爾·剩餘價值學說史

●在蓋斯內的思想中，最荒唐的，是他把中國及其皇帝加以理想化。蓋斯內把中國停滯不動的事實，認為是社會的構造最固，安定的證據，即他主張在該處自然的秩序被實現着——或者將要實現；從而在中國的皇帝中，他看到了不僅保護農業而且還親身參加農耕的「作為牧人的國王」。但大概這該要視為把在什麼地方不得不有和歐洲及法國相彷彿的國家存在着（當時關於中國的知識是貧弱的，大半是造作的）的事寫出來的簡單的宣傳吧。

派性在於擁護只在特殊的法國諸條件之下「從封建社會中孵化出來的」發展階段上的布爾喬亞社會。但適用於布爾喬亞經濟學者，他仍然隱蔽起自己的黨派性（多半是無意識的——因為不能把蓋斯內加入有意識的辯護者的夥裏）從而把農業布爾喬亞的利益提示為全國民的利益。

### 蓋斯內的「純收入」(Product Net)

其次，要說到蓋斯內之經濟學體系的自身。其體系的中心是關於純收入的學說。財富的學說——所謂如何、由誰和在何處來生產它的問題——蓋斯內便從此學說中找到了解決。他基於此而出發，企圖進行資本、剩餘價值（事實上）生產的及不生產的勞動，社會之各人民間的地位和意義（社會之階級的構造）等等的分析。

蓋斯內區別（一）財富的累積（Multiplication）和（二）財富的增加（Addition）。前者施諸農業，後者施諸其餘的生產諸部門。在農業上如果物質自體增加，或者表現在經濟學上，則發生使用價值的增大。在其餘的經濟諸部門中，僅只施行着物質之既存的諸要素之結合，相異的種類之諸使用價值雖然由於結合的事發生新種類的使用價值，但其量不但不增大，甚至常常減少（例如把原料加工為製品或半製品的場合）。農業和其餘的經濟諸部門之間的這種不同，在農業上自然自

已活動着去行「創造」反之，在其餘的經濟諸部門中——不待說商業縱然在一切加工工業上也——由於所謂自然不活動去說明。

新創造出來的生產物對於消費去的生產物的超過部分是純收入。但怎樣來算定它呢？我們在物質界的範圍內，不能算定它。當然收穫的穀物比播種的穀物較多，但種子之外不是還有其他的支出嗎？但能夠把一切的支出只由穀物來計算，這是普通的辦法，但這不外是在形式論理學上所說的 *Petio piniipi*，即是可以解決的問題，被作為已解決了的事物之前提。其原因，是當把農業者的其他諸支出約歸還為穀物時，恐怕人們並未歸還它是和穀物共通的東西吧？然則所謂這共通的東西是什麼呢？這個問題甚至連蓋斯內也沒有提出。

對於蓋斯內，也沒有什麼疑問。因為他認為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同樣是自然的東西。生產物 and 商品是同一物，從而新製造出來的生產物 and 為了其生產的支出，在他看來，從最初就在其價值之表現上現示出來。純收入也在價值的表現上——仍然從最初，即作為什麼自然的東西——就現示出來。

所謂純收入，不外是新生產出來的商品價值對於生產費用之超過分。所以蓋斯內的功績，在於使價值及剩餘價值從重商主義者那樣流通的範疇（重商主義解體期的經濟學者們也不能脫離

這樣的思考方法）轉化到生產的範疇的。確，他沒有把價值還元爲勞動，把剩餘價值還元爲剩餘勞動。他的價值論是生產費用論；在這一點上，他不但比培蒂，就是比被娃居伯的價值論，也退後一步。雖然如此，但所謂純收入（這會如所述，在他看來，從最初就在價值的表現上顯示出來）在生產上被造出的事實，是難以動搖的。從而價值也在生產上被造出，而且所謂自然製造新的東西，勞動只是組合變更造出來的東西之形態，他這種錯誤了的思考方法自身，把所謂價值（依據他的思考方法時，它和使用價值不可分離的連結着的）只是生產的產物的確更加確認。他沒有將價值還元爲勞動，雖然如此，但它却和生產連結着，作爲生產的結果而發生的。剩餘價值也和生產連結着，即在生產上發生的。但在此處，如現在所見，事態更加複雜。

卡爾寫道：「重農主義者把剩餘價值發生的問題從流通的領域移到直接的生產領域，由此奠定了資本主義的生產之分析的基礎。」<sup>①</sup>初讀此說的人要發生這樣的疑問也未可知，到底重農主義者在什麼地方處理着資本主義的生產呢？在他們看來，製造純收入的，不是自然嗎？

把問題更深刻的加以研究吧。重農主義者的純收入不外乎生產物對於生產費用價值的超過分，這是我們所曾見到的。只要生產費用的大小能一定，則純收入的大小也便一定。然而在農業中的

①下兩：剩餘價值學說史。

生產費用，根本上成自種子和勞動者的生活費（關於重農主義怎樣處理資本要在後面論究）所以純收入可以說是倚賴於工資，即是純收入的大小依存於工資的大小。蓋斯內用科學的直觀把工資看做被給予了的大小，即固定了的大小——他是把它還元到最低的生活資料。●

其結果怎樣呢？所謂純收入，并非自然之「純」生產物，而是依存於工資的東西，即如果工資高漲時純收入就減少，反之則不然。蓋斯內還沒有到達於李加圖關於利潤和工資之對立的提說。在他看來，純收入和工資都是從自然的秩序中產生的東西，但此提說不得不到達於蓋斯內自己的歸結。但是它還被封建的神學的外衣深深的包裹着的，確，應該注意的事，在於如據蓋斯內自身所說，純收入只存在於大農場（他名之曰大耕作——*Grandle Culture*）而不存在於他稱為大耕作——*Petite Culture*——的小農場，結果純收入只存在於工資勞動存在的地方。

所以卡爾很正確的說，重農主義者「奠定了資本主義的生產之分析的基礎。」所謂把封建的以及具有布爾喬亞之由來的種種雜多的堆積物從此基礎中清除去的大事業，那是其次的工作。古典經濟學，由於生活在更加發展的資本主義的諸關係之下的亞丹·斯密及李加圖之手，而由此清

●在蓋斯內方面以及就中在杜爾閣方面，雖然把工資之「鐵律」的理論更加展開，但在此處重要的是它變成了純收入

的理論之一構成部分

除了封建的塵埃但古典經濟學也不能從布爾喬亞的視野的限界中脫離。直到最後能深入資本主義的生產之分析的，只有唯一的普羅列塔利亞的理論家——卡爾其人。

蓋斯內之純收入的理論和培蒂的租金的理論之間，有好多的共通物。如（土地）租金之對於培蒂似的，純收入對於蓋斯內是剩餘價值之基本的形態；利子無論對於那一個也是地租中的派生物。而且無論對於那一個也不顯示為特別範疇的企業收入。工業經營利潤，在蓋斯內看來，是對於勞動的報酬，是對於熟練勞動的工資——在此問題上，他的立場比培蒂的立場更加斷定，更加明瞭。所以商業利潤，無論如何，他認為在正常的諸條件之下，即在自然的秩序之存立下是不可能的，它只作為欺瞞和投機的結果才產生的——在這一點上，他和培蒂完全分離。蓋斯內雖然贊成商業，但反對商人，他雖然贊成商品流通（通過牠而且由之施行使用價值的交換），但認媒介者為無用而有害。於此，我們便看出依據被娃居伯的大商業和小商業之區別的（在原則上是比较進一步的首尾一貫）進一步的發展，同時復看出關於商品流通產生商業及商業資本的完全同樣的無理解。

但是蓋斯內和培蒂之間的不同，不盡於上列所指示的諸契機，那些東西是更原則的不同的表現。

培蒂是高度發展了的布爾喬亞派的代表者，他的理論也是高度發展了的經濟的諸關係之所

產。他不把農業看做財富的唯一源泉，反而把工業和商業（特別後者）置諸農業的上位。地租對於坎蒂是需要解決的謎，他借其勞動價值說的力量來解決這個謎，他由於解決它，也看出爲了解釋利子的關鍵。

蓋斯內是極落後的甚至還披着封建的外衣的法國布爾喬亞的代表者。所謂地租是什麼？這樣的事引不起他的關心——他於此也看不出什麼理論的問題。他對於爲什麼地主收取地租的問題的解答，是非常簡單明瞭的。地主收取地租，這是因爲他們的祖先……救了羅馬的緣故，換句話說是因爲他們的祖先最初使土地適於農業耕作似的，依次（如果已經附加在一個以上）此神話的祖先之子孫爲了土地改良歷代繼續資本投下而來的緣故。正由於此，蓋斯內所提起的任務是和培蒂的任務不同；他是想去證明作爲純收入的地租，只有在農業上才可能；在其他的經濟諸部門中，純收入不存在，而且不能存在。

所以經濟學在法國的創始者之全體系，也在其階級的內容及論理的構造上，是和他在英國之同派的經濟學的見解極不同的。●

●在第一章中，我們曾論究了培蒂在如何的意味上是經濟學的創始者又蓋斯內在如何的意味上是那樣呢？



## 蓋斯內的資本理論

純收入的分析，曾如所見，雖然使蓋斯內必然走到生產費用的分析，但生產費用的分析，又使他走到資本之種種構成部分的區別。他區別着每年被預先借貸的部分（用他的話語來說，是預先借貸部分）和數年分一次被預先借貸的資本部分；他把前者名曰「年次預先借貸」，把後者名曰「原始預先借貸」。蓋斯內說：「所謂年次預先借貸是每年在耕作上所需要的諸費用，它需要與農業經營之組織基金的原始預先借貸加以區別的。」●年次預先借貸全部進入生產費用之中，原始預先借貸部分的分別投入其中。

在重農主義者間，還沒有所謂固定資本和流通資本的普遍的概念（這些概念是在亞丹·斯密以後產生的）。在依據重農主義者們資本向其諸構成部分的分割中，反映着他們關於生產之狹隘的見解。在生產的概念之下，不得不理解農業生產（這在包含着法國的大多數的歐洲諸國中每年施行一次）之外，流動資本即一年間完成完全的回轉的資本，常常是年次預借和資本的這一部份對立着數年間完成一回轉的其他部分，是原始預借即是以每年為目標的預借。

和重農主義者們之一的經濟學說相同，他們的固定資本及流動資本的理論，也如上述，還沒有從封建的軛轂中解放出來，還印着他們之視野的狹隘性的痕迹。但在此狹隘的視野之限界內，重農主義者們正確的規定了固有資本和流動資本（如照他們的用語來說，就是原始預借和年次預借），即他們正當的使牠關係於生產資本，而不使之關係於流通上的資本，這一點是他們對於經濟學的至大的科學的功績之一。

「所以——卡爾說——使貨幣從屬於原始預借或年次預借的事，是蓋斯內的思想所未到達的所在。因為此等預借作為生產上的預借——換句話說，生產資本——是和任何市場上的商品相對立，同時也和貨幣相對立。況且蓋斯內使生產資本的此等兩要素間的區別歸結到下列的差異，那是得當的。那就是所謂此等要素被轉移到完成生產物的價值之方式的差異，換言之，此等要素的價值和生產物的價值為一體而流通着的方式的差異，更換句話說，一方面的要素之價值每年全部更新，別方面之要素的價值經過較長期間被斷片的更新，是所謂代置上或再生產上之方式的差異。」

貨幣，蓋斯內認為是流動資本而非固定資本，這完全是正確的。因為所謂流動資本和所謂固定

●卡爾資本論第二卷旁點是洛森堡加的

資本的範疇，只在生產資本中才有分別的緣故。亞丹·斯密當於該章要見到似的，由於把流動資本和流通上的資本加以混同，遂顯著的退却了，但是蓋斯內把貨幣從流動資本及固定資本排除出去，這雖然是正確的，但同時他却暴露了對於作為資本之貨幣形態的貨幣的完全無知。這基於兩個契機。第一對於蓋斯內，所謂資本是物品，是物質；流動資本是由於種子、食料品及其他的勞動者必要的生活資料而成，固定資本是由於勞動工具而成。不待說，在資本及其構成部分的這樣的理解之下，貨幣不能成為資本的形態，因為依據此種見解，則資本一定必須具有物質的形態和物質的內容的緣故。第二——這是可以為第一個契機的基礎的——蓋斯內由於把交換價值看做什麼自然的東西，和使用價值不可分離的東西，結局不能理解貨幣的性質。他不得已而把貨幣一方面視為流通工具，別方面視為商品流通之媒介上必要的什麼便宜上的東西。

蓋斯內和其前輩同樣，把「Q——還元到W——」由此遂產生了所謂「一切的販賣同時又是購買」的提說。

●下附資本論第一卷

其次，所謂「商品用商品去買的」塞依的提說（他的俗流的實現論即立脚於此），不過是把上面引用了的蓋斯內的提說加以解釋而已。

當然， $\text{M} - \text{G} - \text{M}$  只被還元為  $\text{M} - \text{M}$ ，或者事實上是同一事情，但在於不理解使一個商品的販賣和別個商品之購買各自分離的這種貨幣的任務的範圍內，一切的販賣才實際上同時也是購買。

事實上蓋斯內把資本還元到不過是資本之諸形態之一的生產資本。但由於不正確的重農主義的資本觀念，以之和同樣由於不正確的重商主義的資本觀念相比較時，則具有非常的長處。重商主義者也仍然把資本還元到為其諸形態之一的貨幣資本。但資本之貨幣形態是從資本之生產的形態中派生出來的。貨幣雖然被利用為只在資本循環中的資本，但在此循環中之決定的階段是生產。所以可以說蓋斯內感覺到了資本之根本的決定的形態，重商主義者只不過感覺到了其派生的形態而已。

蓋斯內把資本還元為生產資本，不待說，他不能理解商業資本，而且沒有理解。商業資本他認為什麼不生產的東西，認為商業利潤是欺詐或獨占的結果。他把無論那一個都看做侵害自然的秩序的東西。從所謂真的生產只是農業的見解出發的蓋斯內，不得不到達於這樣的結論：工業資本即被充用為加工工業的資本也仍然是不生產的，工業利潤如曾指示出的，不過是事業家對於勞動的報酬。所以他把年次的及原始「預借」（他這樣的理解着資本）只適用於農業。於此，反映着他的「農

業的偏向」及純生產物的理論。

有趣的是對於商業資本及商業利潤那樣激烈反對的蓋斯內，對於借貸資本及利子抱着完全不同的態度。如從他之主要理論來說，應該認為只有對借貸資本施行最熱烈的攻擊，宣言牠為「不生產的」，「宣言利子為不法的」。所以他甚至和把低利看做國民福祉的標幟的著述家們論爭。就他的意見說，當然只有高利子才是這種標幟。這當然是蓋斯內的體系中之諸矛盾（關於此，後面特別加以論究）之一，要去否認牠，這是無用的嘗試。在社會——政治上，牠由於所謂地租是私的土地所有之經濟的實現形態，同樣，利子是貨幣所有之經濟的實現形態而被說明。認為擁護一種類的所有否認他種類的所有的事，不僅是不可能而且是危險的——這是核心。後來布爾喬亞汜雖然自覺了所謂私的土地所有妨礙着資本主義之發展，但不能斷然施行土地國有者，也仍然基於同樣的原因。蓋斯內對於貨幣，特別對於大貨幣財產所有者雖然抱着強烈的反感，但仍然不能否認貨幣財產的合法性。他認為高利子較低利子有希望的這種異說中所表現的態度，實基於此。他在低利子之

●關於此，參看抗根前揭書三七九頁三八〇頁以下。

●此件事，抗根雖也曾指示出來，但他不理解所謂雖然這樣說，而蓋斯內體系中的矛盾并未被廢棄它只是偶然的使重農

主義之創始者的階級的立場明瞭的呈露出來而已。

中見到貨幣財產之潤澤的徵候，在高利子中見到其缺乏的徵候，這是正確的。●所以在認為高利子比低利子有希望的場合，蓋斯內也是厭看貨幣資本家的增加忠實於他的階級的立場的。

### 蓋斯內關於社會及階級的學說

依照蓋斯內說來，如我們所已知的一樣，社會狀態有健全的有病的、自然的秩序支配着，自然法被施行着的時候，社會是健全的。自然的秩序及自然法的觀念雖然不是蓋斯內獨創的，但在這些東西的處理方法及適用的方法上，是其獨特的東西。為立憲君主制及三權（行政、立法、司法）分立的理論家的孟德斯鳩也仍從這種觀念出發。自此之後，盧梭也從同樣的觀念出發，從而他把原始的狀態認為理想的，把文明只看做罪原。總之，這些觀念是無論以任何形態也都為十八世紀一切的啓蒙哲學者固有了。

當然蓋斯內不能認為當時法國的狀態是健全的。法國是病態的，從而有治療她的必要。但怎樣去治療呢？被提示出來了形形色色的手段，法國是真正處於革命的前夜了。為大外科醫的蓋斯內不欲採取外科手段，而且不能夠，從半農奴的環境中出身靠着刻苦勉勵和天才的才幹而獲得比較高的地位和貴族的稱號的蓋斯內，換句話說，在舊社會中有本領地立身處世的蓋斯內，忽一轉念，把能

佔快適的首席的船，即使正在要沈沒，也不能夠不管。施以怎樣的大修理都可以，非救這將要沈沒的船不可，但是，此時有一個條件，就是船的外觀和揭旗，無論如何，不能改變。

直至該時王權還是把都市的工商業布爾喬亞作爲支柱之一，用一切方法庇護了教皇，但不久都市布爾喬亞遂變成了不可倚賴的支柱了，現在，它開始轉化爲王權的掘墓人了。要求別的支柱成爲必要，從而在當時法國的情況之下，這支柱能由於佃作農業者的普及於農村而產生，因爲他們不去提示如都市布爾喬亞那樣的政治的要求的緣故，在經濟上佃作農業者具有極鞏固的根基——蓋斯內認爲是這樣，他的生長教給他以此事。

新的支柱沒有防止布爾喬亞的生產方式的勝利，而且沒有籌算蓋斯內本身這樣的事，毋寧說他是布爾喬亞的生產方式的贊成者，因此只是他願意它在封建的被服之下生根，藉此把封建制度「返老還童」。故他所描寫似的，產生了社會之理想的構造，成爲這社會之基礎的，不能不是農業布爾喬亞，即佃作農業者，從而他們如果爲數愈大便愈好。佃作農業者被稱爲唯一的生產階級，農業被宣布爲唯一的生產的經濟部門。位於蓋斯內所配列的第二號的階級是地主，其中，僧侶、貴族，以及國王自身（也包含着其從臣及大小各樣的多數的官吏）等均屬之。這些複雜的分子，誰也是「純收入」即純所得的取得者，而被結合爲單一的階級。作爲第三個階級的其他的一切人，即總括着從業

於農業以外的經濟諸部門的一切人。此階級不生產「純收入」，因為只爲了維持自己的生活而支出之外不去生產的原故，故名之曰「不生產的」(Sterile)。此階級由於自己的勞動，由於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生活資料的價值附加於農業生產物的價值上。所以蓋斯內把第三個階級常常描寫爲第一個階級，即描寫生產者的階級支付給他們的工資。

蓋斯內在所描寫的社會中，不能萬事亨通。如果蓋斯內在理論上首尾一貫時，那麼他或能把先前的社會分爲生產的和不生生產的兩階級，因爲地主也仍然是不生生產的階級之故。其次或能把不生生產的階級分爲兩個「次階級」：一是從業於其他經濟諸部門，至少生產着自己的生活資料之價值的人們，一是甚至連自己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也不生產的地主們。但是我們曉得了蓋斯內的階級的立場和當時一般的社會——經濟的諸條件，也就能了解他這理論的首尾不一貫性了。把社會分爲兩個階級，使地主們屬於不生生產的階級的事，是披着封建的外衣的布爾喬亞汜之觀念的代表者的。他不能到達的所在。這種分類，意味着在理論上準備作爲階級的地主之解消；然而蓋斯內要這樣去做，當在新的基礎之上，簡直不去保存他們。不錯，蓋斯內在其單一租稅案（依於此時，租稅應專是地主的負擔）上，想沒收從土地所有中之所得的顯著的部分，這是事實。但所謂地主層之完全的廢棄，并未那樣確切的進入附于那「封建的外觀」的蓋斯內的綱領之中。這是蓋斯內不得不把他們



分類爲特別的階級之所在。

的確，也不能把地主置於第一位，換句話說，稱他們爲生產的階級——雖然牠是適於他們有名譽的社會的地位。這和重農主義的全部學說——純收入，生產的勞動和不生產的勞動，關於農業的優劣等等學說——也非常矛盾的。蓋斯內講求妥協的方策，替地主提供特別的地位；做了這樣的事，冷眼看來，好像他們居於生產的階級和「不生產的」階級之雙方的上位。

在蓋斯內的社會中，普羅列塔利亞并不存在，這當然是因爲當時他們并未存在，或者是因爲蓋斯內故意不去認識他們。爲大農業者之觀念的代表者的他，不應該忽視工資勞動者；實際上，在他的純收入的原理中，甚至包含着作爲其一構成部分的一定的工資理論。但關於蓋斯內不把工資勞動者作爲特別階級拿出來，這有着理論的理由和社會的——政治的動機。理論的理由——作爲生產的及不生產的勞動之質的規定，如果是由當該勞動被充用在何處所規定時，則這在工資勞動上也應該適合的；工資勞動只在農業上是生產的，在其他一切的經濟部門中是不生產的。從而不能把一切的工資勞動者概括爲單一的階級，如從重農學派的見地說來，工資勞動者隨着他們的主人構成一個階級，即農業勞動者隨着佃作農業者構成一個階級，工業勞動者隨着工業經營者構成一個階級。社會的——政治的動機——雖然工資勞動者在當時的法國是有了，但還沒有變成與其他諸

階級對立的獨特的階級。他們遠和第三身分的其他的諸構成部分相融和，構成了被稱爲第三身分中所謂貧民的部分。總之，蓋斯內論究工資勞動者的場合，他把它看做貧民，臨以慈善的態度，甚至要求國家對他們關心。●

其次，要提出這樣的問題：蓋斯內使所描寫着的社會之均衡狀態得以維持的力量和法則（在經濟的意味上）是什麼呢？（蓋斯內實在以此均衡狀態認爲理想的狀態。）我們要想起蓋斯內是重商主義之原則的反對者了，從而他不能從所謂均衡能被重商主義的方策來維持的事出發。但蓋斯內在其實際的經濟政策上，不一定排除重商主義的方策，例如爲了在一定的水準上維持穀物價格，以及爲了和極度的高利子相鬥爭的種種場合。但是蓋斯內把重商主義的方策加以許容的，只是社會在病的狀態的場合。所以他所理想的，是在沒有實施此種方策之必要的狀態中的社會。●

要之，蓋斯內認爲在自然的秩序支配着的場合，社會無重商主義的必要。但返過來問，保持社會

●抗權前揭書，三七一頁。蓋斯內把工資勞動者有時作爲「賤民」(Bas peuple) 而論究有時作爲「下民」(Peuple) 而論究。

●蓋斯內反對利子之法律的規制，但在利子率非常高漲，甚至到了大有吞食全純收入的場合，蓋斯內爲着使利子低落起見，勸導應採取法律的手段。

均衡的力量是什麼呢？競爭、經濟的自由、「放任」及「不拘」的實現——這是重農主義者的解答。在自由競爭之下——蓋斯內這樣說——施行等價的交換，使用價值最正確的被分配在一切社會階層之間。在等價交換之下沒有利潤（一點也沒有）。在這種社會之下，只產生純收入，從而它全部歸諸地主之占有。

依蓋斯內說來，只有自由競爭才給自然的秩序添加力量，所謂一切的獨占，抑制人們的創造性，把他們置諸不平等的關係上，那不用去問，獨占又不只使「不生產的」流通上的費用增大，如依蓋斯內來說，也仍然使爲不生產的加工工業上的費用增大。「依據重農主義者們的意見——卡爾說——工業什麼也未製造出來，只不過使農業所給予它的價值轉化爲它的形態而已。所以工業又沒有以如何新的價值附與這些價值，只不過由於變更移交給自己的價值形態在等價形態上償還之

●下爾剩餘價值學說史

蓋斯內關於工商利潤的思想，完全是重農主義的，這不得不加以強調，和重農主義不同的，只是此利潤之評價的方法。二者都把利潤視爲讓渡的結果。

重農主義者認爲在等價交換之下，利潤不存在，但他們從不等價交換出發，重農主義者排擊不等價交換，認爲只有自由競爭是廢棄它的東西，他還未理解所謂競爭必然的發生獨占，從而獨占不是廢棄競爭的東西。

而已。所以——此過程以不妨害最廉價的方法去施行，這是當然願意的。從而這件事，只由於自由競爭，即只在資本主義生產行放任的狀態之下，才得完成。」●

在蓋斯內的社會及階級論中，封建制度的臭味還強烈的殘存着；雖然如此，但在此學說中，有值得法目的一個長處。就是：蓋斯內從社會的經濟中引出社會之階級的構造。但經濟自身的處理方法不正確，同樣，從經濟中引出階級的構造的辦法也不得當。可是他所採用的原則自身是正確的。更正確的說，即是理出了爲階級之特徵的正確原則的端緒。

說純收入，就是剩餘生產物，從而只有生產剩餘價值的階級是生產的，這也是正確的。在布爾喬亞社會中，實際上只有生產剩餘價值的勞動是生產的，從而不得不承認只有這種階級才是生產的。但在此處蓋斯內處理失當，即是他忽略了成爲真正生產階級的工資勞動者。雖然如此，但他置諸基礎的原則本身仍然是正確的。

最後，要關於蓋斯內之體系中的單一稅加以簡單的論究。於此，作爲布爾喬亞經濟學者的蓋斯內，壓倒作爲宮廷體醫的蓋斯內。租稅負擔的全部重壓，如照蓋斯內說來，只有地主必須承擔。在理論上，蓋斯內由於所謂全純收入歸於地主所有而根據之。卡爾說：「一切的租稅，被轉嫁到地租，或者換句話說，土地所有部分的被沒收；這雖然是萊德列及其他人們的抗議，但這是企圖法國革命的立法

完成的所在。而且成爲李加圖所完成的近世經濟學之終極的結論之處。租稅被完全轉嫁到地租這因爲它是唯一的剩餘價值，從而對其他的收入形態之一切課稅，經過曲折的路徑以在經濟上有害的障害生產似的方法，結局歸結到對於土地所有的課稅的緣故。然而在專去課稅土地所有的場合，租稅負擔，從而一切國家的干涉，遂變成不涉及工業的事，所以工業便完全從國家的干涉中解放出來，而且牠不是在工業的利益上，而是在被行諸農業的利益上似的外觀之下施行的。」●

### 蓋斯內的經濟表

我們已經述及了「經濟表」的方法論的意義。其次要考察一下蓋斯內在此表中如何地要約論證其意見。

蓋斯內的經濟表，給予其弟子及追隨者以深刻的感銘。依據米拉波的話來說：「自世界創造以來，有三個大發見；第一是文字的發生；第二是貨幣的導出；第三是經濟表的發見，這是前二者的結果，是前二者的完成。」雖然如此，但長期的去理解此「第三個發見」，只有卡爾才解明蓋斯內之表的真正意義。「無數個別的流通行爲，從最初就被概括在爲其特徵的社會的大量運動中，爲機能之一

●卡爾剩餘價值學說史

定的大的經濟的社會諸階級間之流通中。」●

在各個人間所行的無量多數的買賣行為，在經濟表中，作為社會生產物在諸階級間的流通而表示出來。在這一點上，即在（一）各個的交換行為「被概括在為其特徵的社會的大量運動中」，（二）各個人「被概括在為機能之一定的經濟的諸階級中」之中，有着有名的這表之最大的理論的意義。所以於此，社會的總資本之再生產及流通的被給予，完成了所想要提示出作為全體之社會資本之循環的最初的天才的賞試。

在此表中，提着下列的事：（一）價格的不變性（蓋因為在此，等價交換所行的自然的秩序被描寫着），（二）單純再生產，（三）國外市場的捨象。一切這些諸契機，是把蓋斯內之偉大的科學的才能附與特徵的。市場價格從自然價格中的背離，有捨象它的必要；因為這種背離，什麼也無所得，反而使研究複雜。而且蓋斯內集中注意力於單純再生產，這也是正確的。因為問題的困難，正在於此。但依蓋斯內的見解來說，擴大再生產的分析是不可能的。因為純收入全部歸於地主的手中了。雖然如此，但這件事并未減殺蓋斯內首先在單純再生產之下想要解決社會資本之再生產及流通之問題的意義。

「主要的諸困難——其大部分雖然會以至此的說明加以解決——不是當考察蓄積時事是當考察單純再生產時而出現。這，無論在亞丹·斯密（國富論第二部）也無論在以前的蓋斯內（經濟表）都是由社會之年生產物的運動和流通所媒介的這生產物的再生產成爲問題，和單純再生產成爲出發點的所以。」●

最後蓋斯內捨象着國外市場，這也是偉大的功績。因爲它對於社會的資本之循環的分析什麼也未給予的緣故。關於使蓋斯內捨象了國外市場，這無疑的是多半論爭上的動機也有給予的力量；他對於對國外貿易附與了那樣大的意義的重商主義，想表示出社會資本之再生產及流通，無國外貿易而如何好的進行着。

蓋斯內在其表中，以收獲的完了爲循環的開始點，即他置諸其表之基礎的，是商品資本的循環

——W

以年農業生產物的價值作爲五十億里烏（重農學派時代的法國的貨幣單位），其中四十億相當於食料品，十億相當於原料。此商品量以二十億里烏（現金）爲媒介被導入於運動。這二十

●下附資本論第二卷，英譯本三七二頁。

●蓋斯內雖然認爲以上揭商品量之流通起見，三十億的里烏是必要的，但下爾却指示出以二十億里烏就夠了。

億里烏也仍然屬於佃作農業者之手。年農業生產物的價值，是三個部分的合成：（一）流通資本（「年次預借」）的價值（二十億），（二）固定資本（「原始預借」）的損耗部分的價值（十億），（三）剩餘生產物（「純生產物」）的價值。此外，「不生產」階級握有相當於二十億的製造品。

當流通開始時，二十億的貨幣已在地主的手中，他們已經用佃租的形式從佃農中取得了它。從商品的流通及貨幣的流通中而成的流通自體，能把它分解為五種交易：（一）地主以十億的貨幣向佃農買入食料品，所以施行着從地主向佃農之貨幣的運動，和從佃農向地主的商品的運動。（二）地主以第二個十億從工業家買入製造品，此次是貨幣從地主向工業家，和商品從工業家向地主而運動。（三）工業家以其得到了的十億向佃農購買食料品，所以從地主所得到了的第二個十億，現在從工業家向佃農，和商品從佃農向工業家而運動。（四）佃農以十億向工業家購買由於工具及其他的勞動手段而成的製造品，現在貨幣反過來從佃農向工業家，和商品從工業家向佃農而運動。（五）工業家以此同一十億向佃農購買原料，貨幣重新從工業家向佃農，和商品從佃農向工業家而運動。

作爲上揭五個交換行爲之結果的：（一）地主獲得了那「屬於權利」的剩餘生產物，其一部



由於工業生產物而成；雖然如此，但爲了購買它起見所支出的是借地農的貨幣，從而借地農把這些貨幣只作爲適應於此的食料品量的代價，由工業家獲得了。所以地主所獲得的工業生產物，形成在農業所生產的食料品之等價。（二）工業家獲得與其生產物交換的原料以及食料品，所以現在能重新開始生產，即是流通保證着生產的連續性。（三）佃農獲得爲其必要的勞動手段，二十億的食料品存留在其手邊，所以他們能夠去更新再生產過程。而且他們收回了二十億的貨幣，這是應該作爲佃租再支付給地主的，所以一切都重新開始了。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 第六章 重農主義者（續）

### 三 重農學派

此學派的簡單特徵

對於蓋斯內及其支持者們使用所謂「學派」一語的場合，和普通的場合例如所謂斯密學派，李加圖學派的場合，其意味不相同。重農學派理論的諸任務（新學派的一層展開）同時復以實際的諸任務爲自己的任務。即是由於政治的變更使實現自己的思想。——在此意味上，這學派寧是近於政黨。總之，重農學派形成一個緊密的政治的結社，有由規約所規定的組織，從事會員的募集，特別在上層部，以給予一般的政治以影響爲目的，和爲政者之間，連合了一種連絡。結社又努力於其會員在政府機構中去占得有勢力的地位似的，由此準備下在自己的思想之精神上可以改變全政治的地盤。

蓋斯內的學派，由反對者方面加以綽號曰「宗派」。會員本身雖然自命爲經濟學者，但不久重

農主義者這個稱呼便至被一般化了。此學派的一個會員杜鵬雖然在「(Physiology)——別題。最適合於人性的政府之自然的構造」的題名下，刊行了體系的敘述新學說的選集，但此書的題名就好像變成了用爲全學派一般的稱呼了。●

學派的歷史可以分爲下列諸時期：(一)一七五八——一七六七年，(二)一七六一——一七七四年，(三)一七七四——一七七六年。一七五八年發表了有名的「經濟表」，以此爲契機，在蓋斯內的周圍結集着有文才的人們，他的思想被推敲、宣傳，而開始形成了體系。一七六七年，蓋斯內的學說，雖然在上揭之杜鵬的選集中加以極完全的體系的敘述，但主要還是其後，才開始作爲一個決定的思想的政治潮流而生機能。但那學派收到最大成功的，乃在一七七四——一七七六年的期間。在此期間，於蓋斯內的支持者之中最傑出的杜爾閣（但他不是十足的支持者）變成了路易十六的財政部長。杜爾閣是開始熱心實施重農主義的思想的（關於後面特別論究。）

一七七六年以來，即杜爾閣死後，重農學派及全部重農主義的學說開始崩壞了。但在革命的初

●同選集被刊行於一七六七年，其次，抗根反對此說，提出這樣的意見所謂「(Physiology)」的稱呼是蓋斯內自身作的東西即是蓋斯內組合起意味着自然之支配的兩個希臘語，而作成了此種稱呼。

期，重農主義者之若干思想雖被實現，可是隨着革命的展開，重農主義便被放棄，長時期之後遂被遺棄了。卡爾開始把重農主義再作為研究的對象，並且只有他才予以真正的特徵。

布爾喬亞的經濟學者在十九世紀最後的四半期，開始研究重農主義，發表了大部貴重的新材料，而且發現了關於重農學派以及各個會員的許多文獻。但是卡爾所給予的特徵，依然是確乎不拔的（卡爾雖然未能利用今日存在着的豐富的事實的材料。）因為重農主義的本質，由卡爾的科學的方法被完全闡明了。反之，重農主義由於布爾喬亞經濟學者們的評價，沒有劃一的地方。可以說有多少研究重農主義的經濟學者，就有多少不同的見解。

蓋斯內的追隨者們，除去杜爾閣，沒有對他的學說附加上很多的東西。他們從事於此學說的宣傳和體系化，而且從反對者的攻擊中去擁護它。雖然如此，但在當時所施行激烈的論戰<sup>●</sup>之間，事實上仍有許多的命題被詳細的而且銳利的確立起來。

和重農學派同時的其他的學派，有顧爾奈學派。在這兩學派之間有好多的共通點，但正確的說，在根本點上，兩者并不一致。顧爾奈及其支持者否認農業是唯一的生產的經濟部門。從而又否認爲

●翁肯說：蓋斯內的弟子們歪曲了俗化了乃師的學說，因此，他努力想設立蓋斯內和其學派之間的不同，但這是見樹不見

林之觀的。他費盡心力於細目和副次的契機，而忽略了全體。

重農主義的台柱之一的蓋斯內關於純收入的學說，所以英國的經濟學家茵格拉姆把顧爾奈算作一個重農主義之創始者，●這是不正確的。但是，由於顧爾奈及其學派是貿易均衡的擁護者的理由，事實上便把顧爾奈列入重農主義者之中的抗根也是錯誤的。的確，貿易均衡的觀念是重農主義的中心思想，甚至於是基本的教理，這是事實。但在此觀念之中，無論插入了如何的內容，也不失為重要的問題。抗根把這件事忽視了。

顧爾奈（一七一二——一七五九年）是眼鏡商人之子，從十七歲時就開始從事於商業活動。預先變成了大地主的他，一七五一年又變成了巴黎的商業監督官。（與其這樣說，毋寧說購買了此地位較為正確，因為當時的官職是一種買賣品。）所以顧爾奈無論從其出身來說，或從其地位來說，都和商業界密接的結合着，如果蓋斯內把君主制的支柱求於農村布爾喬亞時，則顧爾奈便把此支柱求於工商業布爾喬亞。這雖然顧爾奈是不亞於蓋斯內的重農主義之斷然的反對者，但兩者

●的確只在蓋斯內及顧爾奈的著作中——他寫道——重農主義學說被立下體系的形態，所以它出於成爲一羣思想

家及實際家的信念而變成公衆的財產，得到了影響力。（茵格拉姆經濟學史一八九一年，七八頁。）茵格拉姆根據杜

爾奈的顧爾奈的哀悼辭寫成顧爾奈哀思錄在其中舉出作爲重農主義的思想之創始者的顧爾奈的名字，叫于抗根

是應該信賴此記錄還有疑問，他本身陷入於另一極端（參看前揭書，二八七頁以下）

之間起顯著的不同，顧爾奈學派的格言也仍然是「放任不拘」而且同學派要求應行有利於農業政策的變更，拒絕如從來的農業忽視政策。但是同學派曾如所述，對於把重農主義者似的農業作為財富的唯一源泉的處理方法，未加以組織。以此點為中心的同學派和重農主義者之間，施行了鬥爭。

不待說，對於認為在重農主義中之根本的而且決定的東西是經濟的自由主義的人，是不能認識蓋斯內學派和顧爾奈學派之間的本質的差異，後者以不亞於前者的熱心也唱導了經濟的自由主義。但是蓋斯內的（經濟的）自由主義和顧爾奈的自由主義之間，表現了不同的階級立場。由此，發生出不同的理論。●重農主義者們在和顧爾奈學派的鬥爭中，并未對於經濟的自由一般——對於此就在其敵方之間也沒有異論——而是對於自己學說上的獨特的方面不得不集中注意。

重農主義者們也不得不知識階級（*Intelligentsia*）最先進的部分施行激烈的鬥爭，蓋後者把重農主義者一方面看做舊式的尊大的空論家，另一方面，認為是古物的擁護者——不破壞它

●當然顧爾奈和其支持者們多數是帶着自由主義的傾向的官吏，他們是只在他們的職務的必要上，從事於理論的研

而想去修繕它的人們。例如盧梭對開明的絕對主義的思想抱着難以寬容的敵意，對之刻上了所謂「合法的專制主義」的烙印，對於米拉波有着乞求重農主義的刊物之輸送的中止。重農主義又是福祿特爾嘲笑的對象。

蓋斯內在封建的社會層之間找到了自己的支持者，而這種封建層一方面認為路易十五的 (*Après Nous e déinge*) 這種箴言，對於自己是難以容受的東西，別方面認為照樣的完全維持古時的「神聖的不可侵犯性」為不可能。舊式的封建分子和反動家們對蓋斯內加以敵視，甚至於路易十五都只以為他的侍醫的經濟學的見解是一種反覆不定的玩意兒。恐怕在「貴婦人的水性楊花」的保護中的龐巴德，也認為他大概是比任何都要忠義的大國手。

所以重農主義者的左右及中央（顧爾奈學派之穩和自由主義者）都受到攻擊。●他們自身在本質上，當時也處於薩捲法國的大運動的圈外了。雖然如此，但他們的基本思想——雖以不合理的形式表現出來——是正接近於究極的勝利的布爾喬亞的組織（他們之所謂「自然的秩序」和此相當）之最深刻的表現。

●重農主義者也受到了近乎如朗格的社會主義的著述家和如馬布里的共產主義的代表者的批評。但關於他們，後面當特別加以論究。



「同時——卡爾寫道——我們又理解了這體系之封建的外表和啓蒙運動之貴族的調子，樣，不得不使一羣封建的領主們成爲本質上在封建的生產方式之廢墟上，宣言了布爾喬亞的生產方式的體系之熱烈的贊成者和宣傳者。」

重農學派中有許多的著述家從屬之，他們實不僅擊退了敵人的攻擊，他們自身還向敵人施行攻擊（在此鬥爭中蓋斯內也參加了。）對於他們，我們不得不加以簡單的考察。

屬於重農學派的主要著述家

老米拉波 (Victor Mirabeau) (一七一五——一七八九年) 關於米拉波已經論及了。他不僅是蓋斯內的追隨者，而且和他有非常深厚的交情。他是結社的中心人物，是其主要的組織者。在此意味上，蓋斯內是爲理論家之學派的指導者，反之，他也可以視爲學派的首領。（抗根雖然把米拉波看做一般的此學派的首領，但他所出發的見地，在同學派和蓋斯內之間有很大的差異。）

米拉波是重農主義之「封建的外觀」發生出來的象徵。雖然就出身及地位來說他是貴族，但具有着教養和開明的思想（即「中毒」了時代的布爾喬亞之開明思想的毒素）不錯，雖然他沒有創造過獨自之體系的獨創的創造之思想，但以確知蓋斯內的學說，於此正是表現出了他之能容

物。但是他把蓋斯內的學說不能作爲自己的——此體系之布爾喬亞的本質，根本上他認爲是難以理解的東西。

另一方面，在一串的問題上，米拉波比蓋斯內也更加急進。就中他對於所謂「放任」及「不拘」的魔術的表式，也比乃師更感到強烈的魅力。●但這基於米拉波皮面的把握了蓋斯內的學說，即他雖然賞識了它，而未能到達其核心。重農主義之「不果敢的外觀」（卡爾的表現）「欺騙」了他，惟其如此，他才能急進地去做。他由於不理解重農主義的本質，才甚至沒有預感到他所讚美的學說之實現，這恐係必然到達的（對於他喜愛的家長制的世界）諸結果。米拉波如他自己所自稱似的，是重農主義的「長子」，蓋斯內其餘的追隨者是「次子」以下。我們試述後者的若干人吧。

杜鵬德奈穆耳 (Du Pont de Nemour) (一七三九——一八一七年) 杜鵬因是屬於重農學派的評論家。由他發刊過極重要的著述和記錄。他是由政府所創刊的「農業商業及財政雜誌」(一七六五年) 的編輯人。在此雜誌中雖然顯爾奈向支持者也參加了，但以編輯人爲杜鵬的關係，蓋斯內派的勢力佔着優勢。在同雜誌中掲載出來的，註釋「經濟表」的杜鵬的論文，喚起激烈的論爭。工商業布爾喬亞的代表者們對於在此表中給予工商業家的特徵爲「不生產的」階級 (Classe

●如依抗根的引證，蓋斯內僅只一次，但非直接，而是間接的使用這些表式（前揭書，三四三頁）

(Stevie) 加以激烈的反對，蓋斯內也參加入論戰之中。他多方的釋解在所謂「不生產的」術語中一點也沒有包含着非難或侮辱商人和工業家的意味；這句話只是表現出工商業不生產純收入而已。但是不能以甜言蜜語使階級的本能入睡。工商業布爾喬亞很好的理解了這樣的點：關於工商業之不生產性的提說，是很適合於他們的。問題并不在於是否侮辱了他們的所在——新學說要求着新方向——而是立脚於農村布爾喬亞，這事情使他們感到不安。

學派的首領自相撫慰的釋明，也不能撫慰他們。論戰可以說越益熾烈起來。出現了幾本小冊子，政府當局也不能不關心於此了。

於是杜鵬不得已於一七六六年之末而辭去了雜誌編輯者的地位。但自一七六七年初頭之後，重農主義者把獨自的機關雜誌「年鑑公報」拿到手裏了，此雜誌仍然在杜鵬的編輯之下直存續到一七七二年。其後，杜鵬爲了雜誌的發行，幾乎蕩盡了全部財產。但是「年鑑公報」也不能安穩無事。其結果，雜誌陷於廢刊的運命，這是爲了重農主義者們不同意於在政府要對「年鑑公報」加上課罰似的新的狹隘的條件之下去繼續刊行。

在重農主義者所刊行的諸雜誌上，也包含着蓋斯內的重要論文；他們的許多重要論文被揭載了。但更重要的事，是這些雜誌以評論的形式，即以所謂從他們之原則的立場去議論當前的政治上

的諸問題的形式，給予他們以宣傳自說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重農主義思想這種宣傳的形態，喚起對於重農主義的熱烈的鬥爭。因為很明顯的重農主義全然不是所謂什麼畸人的嗜好之類的東西，而是希求成爲現實的力量緣故。我們不是曾經看到把工商業作爲不生產的經濟部門而處理的事，惹起了如何的風波嗎？

杜鵬的諸論文，在只有農業才是生產的提說的真意義上，打開了人們的眼界，而且在一七六四年被政府發布了；決定了穀物之國外輸出的法律（這樣的法律雖然在比此很早以前就被發布了，但直到一七六四年還爲空文）精神的鼓吹者，使人們覺醒去爲重農主義者。此種法律招致了業布爾僑亞的大不滿，於是重農主義者變成了強烈的攻擊的焦點。

當然，重農主義并不胆怯，他們應戰了；以許多的小冊子和著作回答小冊子，由此他們努力把自說更加普及，更加體系化。就中，特別頑強的是杜鵬。

厲佛爾 (Mercier de la Riviere) (一七二〇——一七九三年) 厲佛爾是把蓋斯內的思想體系化，通俗化了的人，一六六七年發表其所著自然的秩序和諸政治社會的本質 (L'ordre Naturel et essentiel des Sociétés Politiques)。在此著作中，對蓋斯內的學說加以最有體系的敘述。亞丹·斯密非常推賞這本書。當時本書顯示了非常的暢銷。

厲佛爾把絕對主義之必要給予如下的基礎：「人類由於可以被決定生活在社會中，同時他也可以被決定生活在絕對主義之下。」●結果，絕對主義是「自然的秩序」之必然的產物。盧梭之以對重農主義者感到那樣的反感和憎惡，并非不可思議的。因為盧梭從自然的秩序的觀念中引出了完全相反的東西，即民主的共和國之自然性。

重農主義者在某種意味上，是國際主義者；他們想在國外尋求支持者，想在全世界上去實現重農主義。如巴黎駐俄大使柯里鑫公爵，就是這樣的一個支持者，由他看來，好像一瞬間的運命，也對重農主義者表示好感。基於柯里鑫的勸告，厲佛爾由於變成「開明的」絕對主義之代表者的亞力山大第二爲着參加其「改革」事業，招聘到了伯台爾堡。重農主義者們熱烈地歡迎這招聘——「開明的絕對主義」是要實現他們的思想。這不是大勝利是什麼！但歡喜沒有長久的繼續。我們的重農主義者又返歸巴黎了。從而北方的塞米拉米德（崇拜者們這樣的讚美着亞力山大第二，）在給福祿特爾的書信中，以非常諷刺的口吻寫着厲佛爾說：他以為在俄國要找出匍匐而行的人類，從而把先前鄭重地援助他們成立的事，看做了自己的義務。

重農主義者們看到厲佛爾的使命終於失敗了，遂使勁的加以臭罵。從而重農主義者之歷史的

●下兩剩餘價值學說史

布爾喬亞的研究者們，直到今日為止，都汲汲於做出各自任意的假說稱讚着闡明這失敗的原因。例如抗根認為失敗的第一個原因，在於亞力山大第二處於孟德斯鳩的影響之下（奉告給我們可尊敬的歷史家，孟法斯鳩的思想也和重農主義者的思想同樣，並沒有「開明」女帝所實現的地方）第二個原因，在於「對於聰明的女皇，不滿意於從他人借用着自己的思想的學者。」●所以如果例如不是「從別人借用了自己的思想」的蓋斯內本身來到伯台爾堡時，則「聰明的女皇」一定無疑的會變成重農主義者了。

這是布爾喬亞的經濟學史家研究的一般（從而無疑的抗根是以自己研究的對象為心得的一個歷史家。）

如果重農主義者在當時的俄國能被實現時，則無疑的它在當時的中國也能被實現。（我們已經知道不只是弟子就是先生本身也把中國及其皇帝加以理想化了。）但認為實現於中國，這也就等於認為實現於月亮的世界。其創始者們第一還極想以為着布爾喬亞的生產方式之如何的條件也不存在似的事情去實現布爾喬亞的體系。第二他們想用專制君主之手去實現之。北方的塞米拉米德沒有實現重農主義的能力，和中國的皇帝或法國路易王沒有實現牠的能力同樣。

不僅是腐佛爾一人，所有的重農主義者都是空論家，但這不是因為他們的體系的本質是牽強附會的貨物，而是因為他們以封建的衣裳裝飾其體系，把它呈獻給世界上所有的專制君主之手的緣故。縱使在這樣的專制君主之中有被此體系引動了的人，那也不過是因為此體系被視為最近的「巴黎的時髦」而已。①

勒曹申 (Le Trosne) (一七一八——一七八〇年) 勒曹申次於杜爾閣 (對他特別加以論究) 是蓋斯內追隨者中之最大的理論家。他和哲學者龔迪拉 (Condillac) 當時喧鬧着的論爭，與他的名字相結合着。

出入於重農主義者的團體，在他們之間被認為吾黨之士的龔迪拉 (一七一五——一七八〇年) 於一七七六年發表了顯名為商業和政府的相互關係 (Le Commerce et le Gouvernement Considerés relativement l'un à l'autre) 的大著。

在此著作中，重農學派的兩個最決定的提說被加以全面的批判。即是(一)關於等價的提說，

①在德國的一個亨君和登方伯和重農主義者之間結合了「戀愛」關係。方伯為了更好地了解新學說起見，親身微行到

巴黎，此次承擔這費人教育的是杜鵑 (他以口頭和書面對此主副開始教授重農主義) 但結果和在伯台爾堡中同樣，是不名譽，不成功。」

和(二)只有農業才是生產的提說。龔迪拉曾如前章所見似的，展開主觀的價值論，由此引出了在任何場合交換也不等價的結論。他的結論是這樣：「在商品交換中，視為等價值和等價值的相互交換，這是錯誤的。寧是相反的，兩契約者的各個常常可以得到較大的價值而提供出較小的價值……實際上雙方都獲得利益，或者至少可以獲得。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所謂物品的價值，只存在於該物品對於我們的欲望有關係之中。對於某方面的人是較多的物品，對於他方面則是較少的物品，否則不然。」●

龔迪拉關於第二個提說的論述，較之於關於第一個提說的論述，有不堪比擬的深刻。他同意於土地是財富的源泉，但他說此財富不能不是勞動。從而勞動也是生產的。所以如果農業上的勞動是生產的時，則工業（如依龔迪拉來說——以及商業）上的勞動，更是生產的。因為於此勞動是占着第一位的緣故。

龔迪拉的主要的反對者是勒曹申。他企圖由反擊去粉碎敵手，在價值的問題上，龔迪拉第一把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加以混同。第二把發展的商品經濟和只販賣過剩分的經濟加以混同。龔迪拉說：「兩當事者都是以這樣的事為問題；不以剩餘的物品和需要的物品行交換嗎？」●如卡爾所指

●下爾資本論第一卷英譯本一六六頁。



摘似的。勒曹申適切的指責龔迪拉不理解商品經濟的性質。他主張「總之——勒曹申說——在發展了的社會（商品——資本主義社會——洛森堡）中，沒有過剩的物品。」<sup>①</sup>同時又主張工商業也仍然是生產的，這也是對龔迪拉而發的。「如果交換者的雙方對於同樣較少的物品，獲得同樣較多的物品時，則他們的所得不應該有差異。」<sup>②</sup>從而沒有利潤——所以在於工商業都不是生產的。

關於龔迪拉把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加以混同的事，勒曹申未去理會；這就是說，因為他也如全重農學派似的，混同着兩者。

關於價值和利潤的問題，勒曹申在論證這樣事情的意味上奏了凱歌；即兩者任何一個也不能從不同的使用價值的交換中產生。但他也和他的師同樣，沒有建立真正的價值論，從而工商業利潤只作為不法的現像而被他否定了。另一方面，龔迪拉的議論——這裏議論是適合於重農主義的理論的，即只有農業才是生產的——是勒曹申無論如何也不能咬破的堅硬的胡桃。總之，在重農主義者看來，勞動在農業上的任務不明顯。如果自然，其創造力，使其物質增加的能力是全部的話，則勞動自

①同上，一三〇頁。

②同上，一三一頁。

③同上，一三一頁。

身縱然在農業上也是不生產的。農業者和社會其餘的諸階級同樣是不生產的。其原因是因為自然對於他們（農業者）比對於其他的勞動者會給予較多東西的這個事情，沒有理由只把他們變成生產的階級之故，如果因為在勞動中什麼東西也得不到，而說農業中的勞動是生產的，以其餘經濟部門中的勞動是不生產的，這樣的理由什麼地方也不會存在。

這樣的事，是重農主義者們面前所提出了的絕境。從而他們對於這絕境只不過是回避其解決而已。

x  
x  
x  
x

重農主義者遇到了更強的敵人，即曾為我們所知的加連尼。卡爾稱他為新重農主義者。●

加連尼曾於一七五〇年著了一本貨幣論，其中他不僅描寫着消費本國的全部穀物，而且描寫着從別的國家輸入穀物的工業國家之理想。從而加連尼所描寫的國家，對於蓋斯內的農業國家成為對立物，後者的主要任務是使歸屬於農業布爾喬亞；前者的主要任務是使歸屬於工商業布爾喬亞。

加連尼提出「有等一之處無利潤」的提說，即和龔迪拉同樣，他提出和重農主義者之等價

●卡爾資本論第一卷，英譯本一六五頁

交換的提說相對立的提說。

加連尼雖係意大利人，但住於巴黎，服務於奈阿霍里特公使館，在法國經濟學者和政治家之間有很大的勢力。他甚至參與過法國的「國內」問題。即在因穀價及穀物輸出的問題而發生的論戰中，他也參加了。一七七〇年，他寫了一篇富於諧謔性的關於穀物貿易的對話（*Dialogues Sur l'Commerce des Bleds*）的論文，就中他激烈的而且辛辣的嘲笑重農主義者，批評決定了穀物之國外輸出的政府的法律。①

加連尼以諧謔的調子寫出來的辛辣的論文，喚起非常的反響，使重農主義者大感困難。他把他們描寫為空論家，理論上的絕對主義，換句話說，為鼓吹絕對的真理而忽視現實的事實的人們。而且他把他們描寫為危險的空論家，而提出這樣的命題：所有的空論家，如果他們愈廉潔，則愈危險。

在「對話」之中，於假想的總長和騎士之間進行會話。總長問：「爲什麼你對於這些經濟學的著作採取那樣否定的態度呢？」騎士答道：「因爲那些著作的筆者是廉潔的人們，是對社會人類的運命煩惱着的人們之故。」其次，他如下的說明着，「請想想看，哄騙人欺詐人，恐怕一點也沒有必要。

①參看第二章，在同章述及他的價值論。

②他爲了這種多嘴不得已被迫離去法國。

因爲他們馬上就會暴露出自己的原形的。但廉潔的人浸沒在昏迷中時，請注意，他不知所謂疑惑，只是一心一意的努力向善……」

加連尼主要的使砲火浴於重農主義之外部的特徵，卽其形態方面的特徵中。他又指摘出蓋斯內學說中的獨斷的契機，把它供諸人們的展覽。但學說的真髓他沒有看到，對此沒有予以深刻的批判；而且因他的「新重商主義的」立場之故，是不能予以那樣批判的。

對於重商主義之反布爾喬亞的批判

由顯爾奈、加連尼、裴迪拉等學派所形成的對於重農學派的鬥爭，是布爾喬亞內部的鬥爭，是布爾喬亞的一翼對於另一翼的鬥爭。但是的確，由於批判重農主義，也有批判作爲全體布爾喬亞的諸關係的著述家。卽是他們由於攻擊重農主義，沒有攻擊布爾喬亞之特殊的意識形態，而攻擊了布爾喬亞之意識形態的一般。

伴隨裏作爲布爾喬亞的諸關係以及這些諸關係之理論的表現的經濟學（狹義的）之發展，我們命名曰反布爾喬亞的方向發展了。這不得不名之爲反布爾喬亞者，並不是因爲此方向之代表者們被什麼單一的體系結合着，只是因爲由於對布爾喬亞的體制之否定的態度結合着而已，在他們之間，如果有社會主義者，則也有非社會主義者，但任何一個都以重農主義者爲一般的布爾喬亞

的體制之擁護者，以此而攻擊之。

朗格 (Simon Nicolas Henry Linguet) (一七三六——一七九八年) 朗格以大律師及大評論家而博得聲名。他對於重農主義者寫出來的小冊子，廣泛地普及，在布爾喬亞之間，就中在對於重農主義的「宗派」敵對着的羽翼間，收到了極大的成功。的確，朗格攻擊了全體的布爾喬亞。但只在他的小冊子之直接的標的是此「宗派」的範圍內，才牠獲得了一般的重農主義者的同情。卡爾對於朗格提示如下的簡約的特徵。

「朗格不是社會主義者，他對於和他同時代之啓蒙學者的布爾喬亞的——自由主義的理想或者對於當時所開始的布爾喬亞的支配之論戰，以一半真實一半譏刺的調子，用反動的布幕包裹起來了。他反對那文明的歐洲的形態擁護專制主義，同樣反對工資勞動擁護奴隸制度。」●

卡爾續說道：「朗格以為和自己相對的唯一的經濟學者們，是重農主義者。」他為欲論破此學派起見，便呈獻出其精妙的諸論文。

蓋斯內認為私有財產是經濟的構造之基礎。在以簡單的提說之形式所述說着的他的「格言集」中，有如下的一節（提說第四）：「對於不動產及動產的所有權，必須對其法律上的所有者加

●下附剩餘價值學說史。

以保證。因為所謂所有權的保證是成為社會經濟之構造的基石的緣故。」然而朗格說：「社會從暴力中發生，財產從暴力的取得中發生。」●

在重農主義者看來，社會立於三個支柱之上：私有財產，法律和自由。朗格以一半真實一半譏刺的調子，批評此等重農主義的支柱。特別是他嘲弄着自由。他認為那從奴隸制中的解放而由工資勞動的代替是對於勞動者的不幸。「問題——他說——在於研究奴隸制的廢止給予他們的利益在現實上是什麼東西？我忍受着心的苦痛馬上回答，他們所受到的全部利益，在於他們常常受到餓死的恐怖。這樣的不幸，至少是在人類社會之低度的諸階段之下的他們的前輩，未至於陷入的。」

「諸君說他是自由。嗚呼，正惟其如此才有他的不幸啊！雖然他沒有關心任何的事情之必要，但是也沒有誰來關心他。如果在人們需要他的場合，便在可能的廉價中僱傭他，人們約束着他的僅少的工資，是和他對於在交換中給予的勞動日而給他的生活資料的價格相等。」●人們對於他是為急速的強制實行他的任務的監督者，人們驅使他，刺戟他，巧妙的是他如果有可以辯解似的怠惰，

●朗格的文章，都引自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一卷中，本引用文中之旁點是洛森堡加的。

●筆者雖然沒有特別以給予工資勞動的理論為任務，但在我（洛森堡）加點的一節中，工資的「鐵則」明瞭的被格盡式了。他以所謂確認事實的形式述之。

願有是否沒有使其勞動力的一半隱匿的恐懼。人們而且擔憂着：比較長時間去從事同一勞動的希望，不會使他的手的器用性癱瘓，和他的工具笨鈍嗎？可卑的吝嗇不絕地以不安的眼光追求着他，縱然在允許他的最少的休息時間內，他也浴於罵聲中，在所有的瞬間，休息也被認為是偷盜的。如果他把工作終結，則他和被僱用時同樣，乃以最冷酷的漠視解僱下來，如果他在翌日還未找到什麼工作，則一點也未顧慮這樣的事：他對於苛酷的勞動日所得到的二〇蘇（古幣名）或三〇蘇夠養活他嗎？怎麼辦呢？等等。」

「的確，他是自由的。正因此之故，我才憐憫他。正因此之故，他在他被使用的工作比從來所到達的地方才非常的少。正因為如此，他的生命才非常的不被尊重。奴隸所有者把奴隸當做大事，因為他在買他時不得不支付金錢的緣故。反之，勞動者對於僱他的象養家，不需要什麼費用。在奴隸制的時代，人類的血具有價錢。他們至少具有在市場上被賣出時的價格。所以自他們的買賣被中止以來，現在他們已沒有什麼實質的價值了。在軍隊中，土工兵的價值比戰馬還要少。為什麼呢？因為馬需要極高的價錢而土工兵則隨便就能得到的緣故。」

馬——在別的地方他又諷刺的說——是沒有給予它以自由的人，有的乃在大事上處處顧慮它們的主人。

他認為社會之主要的基礎是奴隸制；在布爾喬亞的社會中，它雖然被加上更穩和的名稱，但是代之更殘酷而困難的東西了。

重農主義者謳歌了自然給予農業上的純收入之「寬大」。於朗格，重農主義者的「農業的偏向」惹不起他的關心。而且如方才所見的，他雖然採用着和他們所謂財富是自然的贈品的見解相同的見解，但他却把注意力針向其他的方向。他說：「成了俘虜的自然，對其小孩子們不去努力其生活資料，而停止提供所獲得的手段。人爲着獲得自然的恩惠起見，不倦地支付努力，爲着獲得其贈品起見，不得不孜孜去支付勞動。對於自然獲得了獨占的所有權的富者，只容許支付者收回這種價格。容許在社會的利用上收回自然財寶的一部。爲了容許參加這種財寶起見，人們爲了使它增加起見，不得不活動。」●

由此命題得出如何的結論呢？

●下爾對此附加着如下的評釋：於此，在所謂「自然的賜予」語句中，表現出重農主義的見解。朗格同意於自然實際「給予恩惠」，但據着社會的構造在此「寬大」中，不得不支付高昂的代價。可是此恩惠，沒有給予對之用自己的勞動去支付的人。



「所以人們不得不拋棄自由和獨立的幻想」——這是朗格的解答。他不向前喊而向後喊。蒙着假面具的奴隸制——工資勞動制——比公然的奴隸制還不好。所以不得不歸到公然的奴隸制。但強調着違反布爾喬亞之意，從來的奴隸社會的方面比現在的布爾喬亞的社會還有希望者，這并不是由論戰上的必要所完成，也不是表示論者之願望的。這是從朗格之一的理論中自然發生出來的。他說在人類中有兩個基本的傾向，即是：（一）要使自己的欲望滿足的努力，或用他的話來說，就是調達食料品的努力；（二）向怠惰的傾向。人在隸屬他人中，發見了使上列兩種努力滿足的階段。即富有食料，但能耽弱於怠惰，所以這種社會秩序，由於以極戰鬥的方法，強力的狩獵民征服了平和的農民而成立了，所以奴隸制度、財產及社會發生了。

如依朗格說來，奴隸制度難以和社會分離。在社會發生之前，有無秩序和自由。但朗格不願意復歸於無秩序。從而……社會和奴隸制存留着，所以在奴隸制的諸形態中，他以爲公然的奴隸制是最好的。當然，朗格的意義，不在於他的復古的、反動的思考方法之中，而在於他對工資勞動、布爾喬亞的自由及財產使當時完全輝煌的特徵之中。

最後，當加以注意的是，朗格加以發展或在作爲「自明」之事的暗默之中前提着的許多命題，被其後的布爾喬亞經濟學者及社會學者輕視和修改着。依朗格說來，社會和財產由於強力而發生

了。即在杜林很遠以前，他已經給予了由恩格斯加以極嚴格批判的所謂強力說的確，他對社會和國家同一看待。他正當的規定國家之階級的性質，把此規定也移於社會。——無產階級社會的事，是不能進入他的思考的所在（社會和國家的同一看待，廣汎的普及於布爾喬亞社會學者及經濟學者之間。）●而且他把原始狀態認為是無秩序狀態，此命題其後以「食料之個人的探索」之理論的形式被展開了。如依國民經濟概論的著者標黑爾說來，在原始狀態中，人們是單獨的分離的放浪着去探求食料。

僧院長馬布里 (Abbe Mably) (1703—1765年) 龔迪拉的兄弟馬布里是共產主義者。●由共產主義的見地批判了重農主義者和朗格相對立的馬布里的主張：原始社會是共產由義的，甚至

●這種同一看待，而且也被施行於社會法西斯蒂們之間，但是社會法西斯蒂和朗格所指示出的社會之階級的性質，努力由這種同一看待去否定國家之階級的性質相反。

●馬布里在四十五——八歲時變成了共產主義者，直到該時，他是當時之支配的制度之支持者，蓋他是為大臣秘書奉職於外交部可以期待着將來的出世。一七五七年他斷然地和過去分袂，隱遁，而專從事於文章活動了。在曾轉變成共產主義者的他所寫的諸論文中，雖然描寫着共產主義社會的理想，但在此理想的實現上，并未具有特別的信仰，認為即使某時它有被實現似的，那也是最遠的將來。

在向農業推移的時代的，確也維持着共產主義；至少農業共產主義，即土地之集團的所有存在着了。

一七六八年馬布里在「對於經濟哲學者們關於諸政治社會之自然的本質的秩序所提出的諸疑問」(Doutes proposés aux philosophes économistes sur l'ordre naturel et essentiel des Sociétés politiques) 的題名之下，特別發行了反駁重農主義者的著述。

他所說的經濟哲學者，是重農主義者（他們當時被這樣的稱呼着。）首先他對於他們常常以財產——但是土地財產——作為自然的秩序之發現，加以攻擊。不當然人類只在……下，才能幸福，才能有德。私有財產是一切悲慘和罪惡的原因。甚至於真的愛國心——他這樣的稱呼着關於全集團的必要和福祉的顧慮——也只在……才可能。在私有財產之下，誰也只管自己的事而已。

其次，馬布里論究重農主義的其他原理，以與對於私有財產的原理同樣的激烈攻擊之。我們已經述及了重農主義者的這樣的主張：個人的利益和個人的動機，只在它被真正的理解的範圍內才是和一般的利益相調和的東西。馬布里對此加以反對。第一，在私有財產支配着，社會分為富者和貧者的範圍內，個人的利害不能一致。●第二，作為各個的利害和一般的利害之一致的條件的重農主義者所提出的個人的利益之真正的理解，在此場合無所活動。如依馬布里的話起來，問題并不在於理性，而在於感情的緣故。支配着人類的，并非理性，而是感情（馬布里展開很獨創的感情論。）在私

有財產的支配之下，感情對於社會向有害的方向活動反之，在共產主義下，由於賢明的政治和適應它的道德教育（對於馬布里，政治和倫理是一致的），這些感情可以向著社會的福祉活動。

馬布里與由三個階級所形成的重農主義的社會相對抗，描寫着無階級的社會——就中，萬人勞動着。在這種社會中，「純收入」的問題被取消。因為一切生產出來的東西，都發送到社會的倉庫中去的緣故。由選舉選出來的官吏們，把生產物平等的分配給社會的全成員。

馬布里是貧民觀念的代表者。他的理想是共產主義的小共同社會。於此，人們不急不忙的勞動着就可以滿足自己所要求着的欲望。他鼓吹欲望有節度的滿足。他是奢侈的敵人，幸福不在於財富，而在於每日之必要的滿足。馬布里的共產主義社會，有如靜靜的修道院，牠是寂靜的境地，沒有可以使感情興奮的餘地。

描寫了這種理想之後，馬布里突然睜開眼睛，甜蜜的夢沒有消失，現在，一切都是不潔可厭。馬布里沒有力量也沒有手段可以實現自己的理想。嘗到了……，又不知在什麼時候；但是目前，私有財產，

①馬布里還未理解在階級社會中，無所謂一般的利害，只存在着階級利害及階級內之團體的利害

②馬布里述及伯拉圖，有着與馬布里其「國家」放逐了詩人可以說馬布里比較只是詩人哲學者及政治家更好的

理解着人性，特別理解着感情。

不平等地支配着，感情荒亂騷擾着，怎樣從這種事態中擺脫出呢！

在此處，馬布里表現爲既存事物的改革者（但是未握有爲了這種諸改革的力量和手段）於此，他還和重農主義者相背反。他們，特別蓋斯內是在資本主義的原則上所組織的大農業的支持者（甚至是支持了小農業的米拉波，也把牠認作商品生產了）。然而馬布里擁護小農業，可是牠越接近於共產主義的經濟越好。他而且企圖着把金納稅代之以勞動及現物貢納，要求奢侈的取締和人民的權利的限制。大概想由此使承繼人所應得的土地的分配漸漸成爲能滿足衣食之用的最低限度的東西。

馬布里與其說在經濟學史上毋寧說在社會主義及其產主義的歷史上，有着非常重大的意義。如威爾金所說似的，馬布里由於其共產主義的理論，「變成了革命時代之法國的社會主義者們的一個先生。」●但是社會主義思想史和經濟學史密切的結合着，當研究後者時不能忽視前者。

#### 四 杜爾閣(Anne Robert Turgot) (一七二七—一七八一年)

我們把杜爾閣加以特別研究。第一，不能把他放入所謂重農學派的桎梏中。雖然杜爾閣在其根

●威爾金社會主義通史，一九二三年，國立出版所，一〇六頁。

本的見解上是重農主義者，但他不是一般的蓋斯內的弟子。他幾乎沒有參與「學派」的生活。杜爾開維持獨立，甚至和以米拉波爲首領的重農主義團體的反對者們締結了親密的交誼。第二，杜爾開比別的重農主義者們，特別比貴族出身的重農主義者們，受重農主義之封建的外觀欺騙的事較少。「在重農主義者中，也有很大的知能的人們，特別在杜爾開，此欺瞞的外觀完全消失；在他們看來，重農主義體系成爲在封建制度的桎梏內去開拓自己的道路的新的資本主義社會之表現。」●

這由杜爾開使斯蓋內的學說加以改善，給予了使牠更加展開的可能性。

最後，第三，杜爾開完成了去實現重農主義的本來的企圖（他爲路易十六之財政部長的時代）。由此，他最完全的呈露了此學說之真正的本質。

杜爾開是大行政家兼大理論家的人物，他對行政上的諸方策和諸法律案等，加以各種的說明，但牠具有近乎學問上之論文的性質。所以他的行政的活動也是理論的興味之對象。

#### 杜爾開的略傳

杜爾開生於和大工商業布爾喬亞有密接的關係的貴族之家。他的父親是巴黎的市長（*Mayor of Paris*）當時在巴黎自治體中，担任過重要的任務。他是末子應供職僧侶。受了後年的

重農主義者及法國的宰相所定的教育之後，進入梭爾飽奴，於此繼續神學的努力。一七四九年，他被選為梭爾飽奴副院長，在一七五一年已經拋棄僧侶的職務轉為官職了。杜爾閣把這突然轉身的原由，以這樣的理由來說明：終身蒙着假面具是不應該的。但杜爾閣并未成為無神論者。而且他甚至認為國家裏面，國教能夠存在；但他所說的國教，係指國民的大多數所信奉着的宗教。對於少數者的宗教他要求寬容，僧侶之狂熱的信仰，是他所嫌忌的。

雖然他在其哲學的見解上，離唯物論很遠，但對於極端的唯心論也鬥爭了（他為論駁巴克萊起見，寫了特別的論文。）

他在其政治的見解上，是比蓋斯內及多數的重農主義者最為左傾。他反對「恣意的專制主義」（Despotisme arbitraire）使「法制的專制主義」（Despotisme legal）與之對立。「法制的專制主義」即由法律所限制了的專制主義，已比「開明的絕對主義」大加進步，它已經向立憲君主制進一步的接近。但作為政治家的杜爾閣的意義，比作為經濟學者的杜爾閣之意義較小。

他在經濟學的見解上，最初私淑顧爾奈，為其熱心的支持者，和顧爾奈同樣，共鳴於重商主義之若干的思想。在此時代，杜爾閣雖然在當時顧爾奈學派上去修養，但把外國的經濟學者特別英國的重商主義者的若干書籍翻譯成了法語，漸次的杜爾閣開始移到蓋斯內方面，變成了重農主義者。但

他還未斷絕了和顧爾奈之追隨者的關係

杜爾閣有着多方面的教養，在哲學、神學、語言學（語言之發生）、地理學、歷史、經濟學等種種方面都寫過文章。經濟現象的研究和他的官職生活密切的結合着。一七六一年杜爾閣被任命為利蒙（Limoges）的知事（Tendant）。直到他被任命為部長止，他都安處於此地位，在知事時代，雖然他還在地方的規模上，但已經努力去實行自己的思想了。此時代他的活動，雖被視為他的部長時代的序曲，但這正是一貫的。

精力的行政之活動，沒有把杜爾閣從文筆的學問的工作中分離。曾如所述，他是把前者和後者密切的結合着的，他的傳單和說明，是關於國民經濟之各個問題的論文，那時他還未忘却重農主義思想的宣傳。在其傳單中，他獎勵他的部下的人們去精讀當時在杜鵬的編輯之下所出的雜誌。而且當時他又寫了純粹理論的著作。就中最堪注目的是關於財富的形成及分配的考察（*Reflexions sur la formation et la distribution des richesses*）。

此書帶着經濟學教科書的性質，由百一十節而成。於此，說明着關於經濟學之所有問題的重農主義的學說。但並不僅是單單介紹此學說的東西，而且進而使之發展（關於此改在後面論述。）

杜爾閣和當時的一切知名之士有親密的交誼。即他和狄洛特及「百科全書派」的人們相識。



他自己協力於有名的「百科全書」，但曾如加以注意似的，他不但信仰唯物論，而且和一切宗教和哲學上的急進論都不一致。他和蓋斯內同樣，是經濟學領域中的大改革者。

一七七四年杜爾閣由於當時即位的路易十六被任命為部長，最初是海軍部長（在此地位他僅任了三四十天），其後轉為財政部長（依當時的名稱，係財政總檢閱官）。當初他得到青年國王的完全信任，開始大胆的實行了自己的改革案，即開始實地應用重農主義。由於這種改革，他造出許多敵人，不能友好。重農主義的敵手們看到他們所憎惡的學說實施起來，狂暴的向他迎及前來。他們說空論家由於其偏見消滅國家而開始騷動了。舊制度的支持者們感到了失望。他們雖然期待着挽狂瀾於既倒的奇蹟，但知此奇蹟不能完成之後，遂開始極口非難杜爾閣了。

在宮內官及路易的侍從們，對新財政部長的不滿，有特別的理由，因為他要求節約，戒止濫費，而在他們則金子是必要的。國民也不沉默了。忠實於重農主義的杜爾閣想由其諸改革去完成的事，在於拓清為着布爾喬亞的生產方式之發展的道路。但他不僅沒有除去橫在這道路上的最重大障害之一的絕對主義，反至想把牠鞏固化了。廣汎的國民大衆不認為他是革命家，認為他是去實行他們所不能理解的改革的陛下之部長，這是正確的。這種改革，實不僅沒有改善他們的生活，而且在開始的期間必然的會使他們犧牲。

杜爾開實際上是空論家，但非如反動的及自由主義的陣營中的敵手們所理解似的樣子。在其內容上，想使革命的諸方策成爲革命的，想使全歷史的舊東西投棄於窗外去實現之點上，有他爲空論家的所以。在這種事情之下，他實不僅不能得到國民大眾的同情，而且陷於使這些大眾來反撥的結果。總之，爲重農主義者及啓蒙哲學者的他，訴於「愚民」的辦法，是不可能的。因爲「愚民」是啓蒙着，可以學到重農主義的對象的緣故。

路易十六未曾理解其財政部長的思想，只不過對他期待着奇蹟而已；於是對杜爾開起了厭心，在職二年後，杜爾開就被免職了。在他免職以前，懼怕他倚勢想弄陰謀的同夥，現在從鎖鍊中解放出來而開始囂然騷動了，他開始被嘲笑、侮辱、中傷了。但是杜爾開總堅持自說到底而不動。自此以後，他和政治生活訣別，專埋頭於學問的活動。但此次，是從事於自然科學方面的研究。到一七八一年卒。

#### 杜爾開的經濟理論

「於杜爾開，我們看出最發展的形式之重農主義的學說。」 ● 卡爾這個見解抗根并不同意。

● 杜爾開在辭職的數日前寫給路易十六的信，很有意思，免職的文件已被決定，杜爾開雖然也感覺到這件事，但他不作爲敗北者，而以勝利者的態度寫的。即他責難國王的無定見，指示出英國國王查理士第一就因其無定見之故遂陷于死刑的命運。

他雖未指出卡爾的名字，但他如下的說：「在杜爾閣之「關於財富的形成及分配的諸考察」中，農主義所謂完成其最高發展的意見，被廣泛的普及。實際上，杜爾閣也仍然和全學派同樣，不得不說沒有理解過蓋斯內的學說之真精神。」●

所謂在米拉波和封建貴族出身的他的同僚們中，未能理解蓋斯內之學說的真精神，這是沒有議論之餘地的。曾如所述，他們被體系的封建的外觀所威壓，不能進入其本質。但關於杜爾閣無論如何不能不說只有其反對才是正確的。杜爾閣的功績，正是在於這一點：顯然的他把此學說之布爾喬亞的核心（雖然不是完全的）從其封建的外殼中引出來。

但重農主義體系之封建的外觀，並不是簡單的偶然的東西。它和體系的本質有機的結合着，從而這件事是基於所謂布爾喬亞的諸關係經過封建制度而開拓了道路。所以不能單純的拋棄此外觀，機械的把它「分離」。它只有在體系的內容更發展之下，才能被拋棄。開其端緒的是杜爾閣（此端緒在亞丹，斯密獲得了進一步的展開），抗根沒有理解這件事，因為抗根也不知道「蓋斯內的學說之真精神」。

●卡爾剩餘價值學說史。

●抗根前揭書，四六四頁。

杜爾閣也和蓋斯內同樣，從自然的秩序中出發了。但他和其師有所不同，自然的秩序從神祕的覆蓋中非常的進一步的解放出來，它是更透明的，換句話說，是更布爾喬亞的，因此之故，他引出更急進的結論，●而且更能把此根本原則更首尾一貫的適用於經濟學的全部。

杜爾閣把自然的秩序還元於所謂直接而且單純的沒有什麼修飾的，它恰如重農主義體系上的事實的東西，換句話說，還元到立腳於個人的創始性。個人的利害感情及自由競爭所樹立了的秩序。他把和這些原理相矛盾的一切的社會構造，毫不躊躇的宣言為錯語，歪曲。

從而在各個現象的研究上，引起了杜爾閣之興味的，不是這些現象的歷史，而是適應着根本的原理之自然的秩序而支配這些現象的法則，更正確的說，是可以支配這些現象的法則，他的方法專是演繹的。杜爾閣純粹施行着許多演繹，但演繹的性質，是全重農主義體系所固有的。杜爾閣的功績，在於他沒有想以面紗來遮蔽這演繹性（即使這樣做，其程度比別的人們也最少）沒有想以中世紀的濃霧來蒙罩它。

●這件事，抗根也承認，杜爾閣從所謂顧爾奈移到蓋斯內，但只有這種事實，即和顧爾奈也絕對沒有分手，杜爾閣才有力量去理解重農主義之真的意義。在杜爾閣的所謂余是顧爾奈及蓋斯內兩人的追隨者的話中，所以有深的真理，抗根說杜

爾閣的此話和現實不一致，道表示出完全的無理解。（前揭書四六四頁）

所謂杜爾閣沒有用封建制度及家長制度的眼鏡來看資本主義社會，使他更好的去理解布爾喬亞社會的階級構造爲可能。他把蓋斯內的三階級論，更由於向勞動者和資本家的分配加以補充。從而他由於在勞動者和事業家的關係上填進自由競爭的原理，當時給予了極堂皇的工資法則的表式化。他不止於僅主張勞動被還元到最少生活資料，而且說明爲什麼有這樣的事。

「僱傭者——杜爾閣說——因爲能從多數的勞動者之間加以選擇，所以選擇同意於以最賤的價格去勞動的人。因此，勞動者們不得不互相聯合降落對於自己的勞動的價格。在這種事態之下無論在如何種類的勞動中，也不得不成立這樣的秩序：勞動的工資被限制於生活上必要的最少的限度內，而且事實上是成立着的。」●

從上引用文中得到下列的事：對於此種理論決定的契機，是這樣的：僱傭者有選擇的自由，換句話說，在勞動者的市場中，沒有勞動者的不足，從而在勞動者之間施行競爭，結果勞動的價格被降落到上列之最低限度。關於爲什麼在勞動市場中，常常供給超過需要呢？杜爾閣還沒有說明。但是工資被還元到最少生活資料的機構，被他闡明了。

杜爾閣關於工資勞動者是什麼的問題給予正確的規定。「除却自己的手和職業上的技能而

●杜爾閣關於財富的形成及分配的請考察，俄譯版一九〇五年四頁。

外什麼東西也沒有。單純的勞動者，只在出賣自己的勞動而成功的範圍內，具有着什麼呢？<sup>①</sup>他又在其著作的別的地方，說明着「除却自己的手和職業上的技能而外」什麼東西也沒有的人們，從什麼地方發生的呢？「對於已經不能握有土地的人們，以不生產的階級的資格提供作為勞動者之自己的勞動，除却與它相交換得到地主的生產物之過剩部分而外，沒有逃避的道路。」<sup>②</sup>

所以工資勞動者發生的條件，是這樣的：為最重要的生產手段的土地，從勞動者中分離。從而這是完全正確的，但在此正確的命題之上，杜爾閣則予以不正確的解釋，這是他的重農主義的見解所使然的。依他看來，土地不是最重要的生產手段，而是財富的唯一源泉，所以僅只擁有財富的這種源泉的人，才是真正的資本家。其他的資本家，只在從地主取得純生產物之一部而成功的範圍內才成為資本家。

杜爾閣把布爾喬亞的諸關係的分析，從其成立的分析開始，這是正確的，牠只由於這種方法，才得以正確的理解。但因為布爾喬亞的近視眼，特別因為其為一變種的重農主義的見解之故，所以牠不能正確的描寫布爾喬亞社會成立之歷史的過程。第一，布爾喬亞的諸關係，在他看來，和一般的社

①同上，四頁旁點是洛森堡加的。

②同上，六頁。

會的諸關係同時發生的，換句話說，後者在他看來，從最初就是布爾喬亞的關係。第二，他由下列的事說明這些關係的成立。即是：（一）從不同的土地中拿到不同的生產物，從而拿到不同的純收入；

（二）因為土地在全體上被限制着的緣故，所以它只被國民的一部分獨占私有。他從第一件事導出生產物和生產物的交換，從第二件事導出生產物和勞動的交換。

杜爾閣把作為全體的過程如下的描寫着：最初人們占居於地上，換句話說，占有土地，所以有地主，同時有農業者。全純收入歸屬於握有土地而且耕種牠的人之手中。但沒有交換是不行的，因為在不同的土地中，生產着不同的生產物的緣故。

以上是全過程的第一個階段。在此階段中，只有生產物和生產物的交換。第二個階段，始於住民的勞動被分為農業的部分和非農業的部分的時候，兩者之間的交換，已經是勞動和生產物的交換。勞動由非農業者所給予，農業者給予生產物，前者對於後者在於有僱勤務者的關係。換句話說，杜爾閣把非農業住民作為農業的住民之工資勞動者而考察。第三個階段，開始於土地的所有和土地的利用被分離，結果農業者不得已而把其土地生產物和地主所有的時候。現在，農業者除却從事於其他經濟諸部門者而外，也不能得到好多的東西。為什麼呢？因為土地的所有者占有了必要的生活資料以上的超過分的全部之故。

爲什麼住民被分爲農業的部分和非農業的部分呢？爲什麼農業的部分被分爲地主和農業者呢？在此場合交換的發展担任什麼任務呢？——對於這些問題，杜爾開雖然想努力予以解答，但未作出明瞭的解答。他列舉許多的原因。就中舉出一方面的人們之節約、勤勉，別方面的人們之怠惰、濫費等。而且也述說着信用，大概是信用可能使一定的土地從債務者移到債權者。但是我們不要去論及這些原因吧，有更重大的事，正確的規定着所謂工資勞動者是什麼的杜爾開，如我們所見似的，因其關於布爾喬亞的諸關係的發生是重農主義的見解之故，所以不能繼續保持這種正確的規定。所謂「工資勞動者」的範疇，變成了茫然不固定的東西。他也把所有的非農業的住民及所有的農業者，放進了工資勞動者之中。留在後來作資本家的，只是地主。其結果，杜爾開陷於極度的混亂，依他的見地說來，則認爲全社會只應該分爲資本家（即地主）和工資勞動者的兩個階級，但杜爾開支持着蓋斯內的三階級論，同時，他又導入真正意味的工資勞動者和資本家——與地主不同的——的區別。

雖然這樣的混亂，但是的確，杜爾開給予資本主義的諸關係以正確的理解。杜爾開雖然使工資勞動成了極茫然的東西，但未須與忘却他是生產手段只作爲從生產者分離了的結果才產生的。所以因爲土地是最重要的生產手段之故，於是他集中全力注意於此。此其一。第二，他認爲純收入，即只爲內階級生產剩餘價值的勞動者才是生產的純收入的理論雖係蓋斯內的理論，但在杜爾開的



手中，純收入之階級的本質，更來得顯著和明確。

關於農業者和地主，杜爾閣如下的寫道：「因為他（地主——洛森堡）不去勞動，土地便什麼也不生產的這種物理的必然性之故，所以需要農業者，但農業者以地主為必要的，這是只由於人類相互的協助和民法上的諸規定之力。這對於最初的土地開墾者及其子孫，縱然他們在到達了停止自己去耕作之後，也保證着對其所占有的土地之所有權。」●

農業者和土地所有者之任務，被正確的規定着；前者對後者交付自己的勞動，後者具有由法律所保證着的所有權。但是杜爾閣把此權利和這種法律加以正當化，它是所謂土地所有者的祖先嘗把自己的土地作為耕種過的結果而發生的（像你所知道的，蓋斯內也完全予以同樣的說明。）但不能動搖這樣的事實：純收入向地主們的交付，如依杜爾閣說來，不外乎別的階級的勞動由一個階級的占有。

但地主以外的別的資本家從何處產生呢？杜爾閣不能否定其存在，而且他不想去否定。毋寧是他在描寫了為基本的資本家的地主之發生過程後，馬上努力想描寫所謂派生的資本家——工業、商業、借貸資本家們，如果地主把不動產集積到其手中，則地主以外的資本家羣便把動產集積到其

●杜爾閣前揭書，九頁，旁點是洛森堡加的。

手中，其中具有決定的意義的，是生產手段，在消費財貨的形態上存在着的貯藏品，以及貨幣。

此過程如何發生如何經過呢？如依重農主義的見地說來，它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嗎？實際上如果地主以外的一切的人只取得等於必要的生活資料之價值的工資，那在他們（非地主）之間新的階層分化——向勞動者和資本家的分化——如何能夠發生呢？

不錯，杜爾閣也感到了這樣的困難，所以他努力尋找逃避的道路。他寫道：「雖然從工業中得到利潤和從土地中得到的收入不是同樣的自然贈品，雖然工業勞動者對支給他工資的僱傭者只由自己的勞動去支付他所得到的價格，雖然所有的僱傭者努力想在支付工資的場合盡量地少給，而且雖然競爭使工業勞動者以所希望的價格中之最少的東西不得已而滿足，但雖然如此，而這樣的事情是很明顯的，縱然在如何的經濟部門中，也以敏捷，活潑，特別在節約着自己個人的消費的人，儲蓄那維持自己及自己的家族必要的東西以外完全不可能的程度上，沒有激烈的施行競爭。他由於保存這剩餘部分，能製造出小資本。」

從杜爾閣的立場上，一個一個不去但是，而在這多數的「雖然」之後，突然出現了莫明其妙的「雖然如此。」即是所謂資本雖然從什麼地方也不能發生，雖然如此，但牠是發生着的。勤勉的勞動

者之敏捷和節約從困難中救出來。這是「些少」的資本之「些少」的發生（怕人不懂，特爲說一說，杜爾閣氏關於小資本說明着——不過，導出大資本的事，並不是他所能決心的地方）然而一度小資本被產生之後，它已經——雖無節約和敏捷——產生大資本。爲什麼呢？因爲爲了價值，自己增殖的條件已經存在的緣故。一方面以種種勞動條件的形式，縱令是小的也是資本，另一方面有勞動和技能。和農業的場合同樣的事情發生，卽具有資本的人以「法律」和「權利」爲支柱，只具有勞動和技能的人，爲使他們的僱傭者得到利潤起見，不得不交付自己的勞動。

杜爾閣直到達了剩餘價值之問題的解決的門口。卽直到達了在生產手段從生產者分離出來的一切的場合上，剩餘生產物之創造的問題之解決的門口。但他從這樣的解答走向其傍邊去了，這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爲如果不這樣，則全重農主義就不得不陷於破滅瓦解的命運，如果在工業中仍然製造出剩餘生產物，如果工業勞動者不止於再生產自己的工資，而且也生產爲了資本家的利潤，則重從農主義中果何所存？

忠實於重農主義的杜爾閣，關於工商業利潤不得不尋求別的說明。正如方才所見，他事實上把它還元到利子，從而把利子從地租中引出。作爲交換發展的結果，（一）貨幣發生，而且被蓄積；（二）土地被引入商品交換之中。換句話說，土地變成買賣的對象。於此，一定金額的貨幣代表一部分的

土地，反之，則後者代表前者從而貨幣因此不得不給予和所買得的土地同程度的收入所以在貨幣不得不給予收入的事被證明而外，工商業不得不給予收入的事，已由此而明白。——因為在工商業之中，投下了貨幣的緣故。

此收入等於對投下資本的利子，對金融企業家之勞動的工資和對金錢危險的報償。

杜爾閣和其前輩同樣，只知道地租和利子；作為特別範疇的利潤，在他看來是不存在的，它在根本上，是成自利子及企業家的工資。

利子及為其變態的利潤（如依杜爾閣的意見說來，則利潤是從利子派生出來的東西，）是從純收入中的扣除。資本可以增大純收入，因此，它對於純收入的一部分具有要求權。所以杜爾閣不僅擁護利子的存在，而且也反對利子之法律的限制，作為借貸資本之價格的利子和任意的商品之價格同樣，作為自由競爭的結果而確立着，而且不得不確立着。於此，杜爾閣也表示出比蓋斯內更好的理解了布爾喬亞的諸關係。蓋斯內對於貨幣資本只停止於寬容的態度，所以他甚至於認為高利子比低利子還有希望，這不外乎因為把前者看做貨幣資本蓄積之不另的標識，把後者看做表示貨幣資本之潤澤的東西（蓋斯內又在利子率很高的時候，要求國家參與其限制，）杜爾閣是低利子的黨羽。所謂貨幣資本的潤澤，不使他感到不安，勿寧他把它認為是國民經濟繁榮的徵候。這不是和

重農主義非常吻合的想法，而是表示關於資本主義的現實之更加成熟的理解。

最後，關於杜爾閣的價值論及貨幣論加以若干論述吧。其價值論受到加連尼及龔迪拉之顯著的影響。他企圖着要在主觀的價值和客觀的價值之間設立區別，前者表現着交付自己之物品的人，對於自己這物品而去評價。「相互交換的人之各個——杜爾閣說——因為誰也是於交換中提供着物品的主人之故，所以他和想得到別的物品的人自己的願望相比較，他不得不決定對於拿去交換的物品之愛慕的程度。」●後者，即客觀的價值，或者對於他意味着同樣的事，但市場價格被確定於市場。「穀物及葡萄酒的價格——他繼續着說——在此場合（有多數的買者與多數的賣者的場合——洛森堡）依據相互的欲望及資力而在兩部類的人們之間去決定，它由於穀物的賣者之全體和葡萄酒之賣者的全體之間的欲望和資力的平衡所決定。」●換句話說，市場價格依據需要及供給所決定。

杜爾閣的價值論，不僅不是他的重農主義的見解中的產物，且寧是他的體系中的異物，即使看

作偏護，那也不過是想使難以調和的東西加以調和的嘗試，企圖着想使關於交換之等價性的重農

●同上。

●杜爾閣前揭書，一七頁，旁點是洛森堡加的。

主義者的提說和關於交換之不等價性的魏迪拉的提說加以調和而已（從而這樣的企圖是由其後的布爾喬亞經濟學者們曾經嘗試幾次都未完成的。）

杜爾閣使金和銀即金屬貨幣歸結到具有實質的價值的商品，和只把鑄貨視作價值符號的人們相論爭。「它（金銀——洛森堡）不是如許多的人們所承認的價值符號，它具有其自身的價值。它在得爲其他的諸價值的尺度和担保之外，在這種性質上，它和商業交易上具有價值的一切的商品是同一的。」

但杜爾閣不僅使貨幣歸着於商品，且相反的使商品歸着於貨幣。如依杜爾閣所理解的說來，一切的商品是貨幣。即他不理解作爲特殊之商品的，作爲絕對的商品之貨幣的特殊性。

這種錯誤，如我們所見似的，在杜爾閣的前輩們之間也存在着了。從而他們當和重農主義者們的、就中和他們之貿易均衡的理論論戰時，利用之而收到成功。重農主義者之反對者們說道：以貨幣買商品的事，雖是事實，但也能以商品買貨幣，所以在本國由於有利的貿易均衡之貨幣的收到超過，能看做新的財富。爲什麼呢？因爲在此財富和貨幣超過分的出現以前，商品超過分的形式已經是存在着了。

●所謂「担保」還有如從前後的關係來考察，在等價的意味上去使用。

當然在商品和貨幣的交換上新的財富未製造出來，是財富由於得到貨幣形態而實現出來。只有在此形態上，財富才取得作為布爾喬亞的財富之真正存在。重商主義不理解這件事，而且也沒有理解其反對者。前者過大評價轉形—— $\text{Q}$ ，後者過小評價了牠。

這過小評價，就在斯密、李加圖以及其追隨者的中間也還可以看到。